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congrentongdaoch00liyi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李怡・七十年代雜誌社

6367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李怡

七十年代雜誌社
一九八二年出版

For.
Wei-wei
+ Klaus.

LaYee
82/8.

一九八二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VELUT ARBOR ÆVO

Presented to the
LIBRAR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by
Mrs. Hsiao-wei Rupprecht

CHENG YU TUNG EAST ASIAN LIBRARY
APR 18 2006
UNIVERSITY OF TORONTO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著 者：李　　怡
出 版：**七十年代雜誌社**
香港汕頭街11－21號仁美大廈1A
電話：5-271836

定 價：HK$12.00　編號：001

是非混沌與誰評
回首十年悲喜驚
世事翻騰觀念改
今朝探索啓新程

——爲《七十年代》創刊十周年而作

自序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觀念崩解、混沌的十年……1
怎樣的言論對中國有利？……21
中國的文學創作將促進民主化和現代化……35
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的興起……39
文藝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國現實……69
建立新的精神支柱……89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101
愛國主義的呼喚……115
王希哲文章爲什麼能引起共鳴？……131
九七覺醒……141

自序

校讀完了收進這本書中的十篇文章，心中泛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在個人的寫作生涯中，這不是我的第一本書。而且即使是以自己的低標準來要求，這本書也算不上是得意之作。然而，這本書的出版跟我過去所出的書不一樣，它並沒有給我帶來愉快、欣慰的感覺。手裏捏着一把校稿，就像是捏着一團火一樣，炙手，傷痛，而且即使到了寫「自序」的這一刻還在矛盾：究竟要不要把它付印？

我想起，同一樣的問題幾乎在寫作這十篇文章的時刻都發生過。往往是寫到深夜，一方面為寫完了一篇文章的最後一個字而輕快，另方面又為自己寫出一些似乎不該寫的話而矛盾着。究竟要不要拿去發排呢？或者是不是應該再三斟酌呢？不過，儘管矛盾，這些文章終究在當時發表了。現在不過是收集成書，至少可以少一些考慮了吧。然而，我仍然在猶豫着。這也許同我的寡斷的性格弱點有關，但同時也是由於我想起了這些文章發表時，對我個人與我的事業所造成的不利局面。這本書的出版，很可能造成這種不利局面的延續或者加強。

不管怎麼矛盾吧，如果你看到這篇「自序」，那麼這本書總算出版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傳到香港，由於事出突然，在急迫中爲了應付自己担任總編輯的《七十年代》月刊的需要，於是臨時上馬，收集資料，連夜趕寫有關中國事態的分析。這類文章本非我所擅長，但一經上馬以後，因讀者對中國問題的關心，也就馬不停蹄地寫下去了。接連幾年，個人的主要工作，除了編雜誌和處理業務上的事之外，就是寫有關中國問題的文章。

因爲寫這類文章，也就不得不時刻反省自己對中國的認識和基本態度。作爲一個在香港的中國知識分子，我們的身份和處境自有特殊性。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希望中國社會不斷進步，人民生活走向民主、康樂、幸福。由於自小形成的民族感情，我甚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自覺或不自覺地爲中國護短。然而另一方面，我生活在香港這個目前仍由英國統治的地方。在這裏，我可以看到許多在大陸和台灣一般老百姓都看不到的資料，可以接觸到一些有親身經歷而又無須顧忌「講錯話」的人；在這裏，左右派的思想互相衝擊，言論自由，人們可以比較各種不同的報道，可以自由地與不同的人交換意見，作出自己的公正判斷；在這裏，一個知識分子可以憑良心講話而不會損及自身安全，可以自由地講出中國老百姓想說而不能說的話。這就是作爲一個香港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處境的特殊性。

對一個香港知識分子的處境的認識，以及對自己的基本態度的反省，常常使自己產生相當强

烈的感情活動。這種認識，這種反省，這種感情活動，促成我在最近這兩年內，除了分析中國問題之外，還寫下了這本書中所收集的十篇文章。因此，這本書不算是一本分析中國問題的書，而是一本關於一個香港知識分子在寫中國問題的文章時的心理活動，是我對世界、對中國的一些基本認識和基本態度。

書中有幾篇文章在刊物上發表時，曾引起海內外不少知識分子的議論，受到來自中共方面的公開批評，來自台北方面的贊揚，也得到一些好心人的忠告。我一向重視別人的意見，尤其是涉及人生態度和認識取向的大問題，更不敢自信個人的認識和反省一定正確。然而，如果「贊揚」是基於敵對政治勢力的「批評」，「批評」是基於敵對勢力的「贊揚」，「忠告」是基於個人利益的考慮，「議論」是基於勢利觀點的話，那麼這種種反應其實都與我的文章中的見解無關，因而也就既不足以支持、也不能使我改變我已醒悟到的基本認識和基本態度。

其後，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有了重大的壓力，使我一度既被「勸告」、也不得不考慮要把銷路廣闊的《七十年代》月刊停辦，並考慮自己從此沉默。但在事實不斷被謊言掩蓋的世界裏，我實在很難沉默。性格是決定命運的，於是寫作這些文章的這兩年，遂成爲我生命中最多矛盾和坎坷的日子。我不僅要否定自己以前的一些看法，而且要被迫放棄一些事業基礎和個人利益。我不否認這是痛苦和需要勇氣的。但極有限的眞話也必須要有人講出來。所以儘管這本書中的見解無甚高論，但對我來說，我珍惜在生命中有這麼兩年，憑勇氣，付出個人的代價，寫下了這十篇

文章，說出了極有限的眞話。

過去，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多用筆名寫作，而偏偏是這十篇較有爭論性的，寫時一再矛盾、猶豫的文章，發表時大都用了眞名。這是因爲，我旣決心忠於自己的認識，也就決心爲自己的言論負責到底。近幾個月來，有人用先栽後誣的手法對我進行人身攻擊，指責一些我從來沒有說過、寫過的「錯誤言論」。爲此，這本書的出版，相信還有一個用處，就是向一些想對我進行批評而又講道理的人，提供批評的依據。只要講得對，我是不會拒絕任何批評意見的。

趁這本書出版的機會，我願意在這裏向所有在過去一年裏給我鼓勵、支持、幫助以及誠意批評的我們的讀者，我的朋友，我的同事和助手，我的家人，表示我的衷心的感謝。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觀念崩解、混沌的十年

（當《七十年代》月刊跨進八十年代之際，編輯部同人與一些作者、朋友經多次討論後，決定以一篇編輯部署名的文章，總結剛成過去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此文雖由本人執筆寫成，但其實包括了許多其他人的意見。謹此說明。）

時光流轉，人類的歷史經過風雲變幻的十年，進入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一個十年過去、另一個十年伊始的日子裏，也許我們應該作一次總的回顧，看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整整十年的歷史，究竟有什麼特點。

在過去十年裏，世界上發生的大事太多，時局變化太大，這篇文章不可能把世界上各個地區的一切重要變化都寫進去。撰寫這十年的歷史，不是我們所能做到的，而且我們也不認爲是當前的要務。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是，怎樣把人類歷史在過去十年的主要變化，總結成觀念形態的東西。換言之，我們認爲當前需要探討的是：七十年代的世局，主要朝着怎樣的方向變

化？人們對世界、對社會、對人生產生了什麼新的觀念，改變了哪些舊的觀念？

不容否認，這確是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之所以敢於在這篇文章中作大胆的回答，是希望提供一個初步的意見，藉以引發出對這個大題目的更多更好的討論。

一、國際政治向多元化發展

要看十年的變遷，不能不先把眼光回望到六十年代末，那時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世界？當時，我們所看到的世界是單元化的結構——世界的政治力量可以簡單地劃分幾個勢力，它們彼此向着不同的趨勢發展，又在不同的層次進行着對抗。

那時候，一個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陣營，一個以蘇聯爲首的東方陣營，一個分別與美、蘇抗衡的民族獨立運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就是世界政治力量的粗略的劃分。這一劃分是繼續五十年代的架構而來的。但在六十年代發生了變化。變化之一是越南戰爭，它使美國泥足深陷，並引起了大量的國內問題，美國感到再也不容易推行它的「全球戰略」了；變化之二是中蘇關係的破裂，六九年的珍寶島事件，中共試爆核彈成功和文化大革命，使中共成爲脫離蘇聯陣營的獨樹一幟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它與阿爾巴尼亞聯結，在廣大中間地帶它又以支持越南與美國對抗而成爲一個重要的力量；變化之三是西歐各老大帝國已紛紛退出在亞非的殖民統治，而經濟又一蹶不振，在法國經歷了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風暴之後，正如美聯社一九六九年的年終特稿所說：

「舊的歐洲蹣跚地走過了六十年代」，它們在世界事務中的影響力急劇下降了；變化之四是一九六八年的蘇聯侵捷事件，使東歐國家對蘇聯也開始出現了離心力量；變化之五是其他民族獨立運動繼續蓬勃發展，非洲國家在覺醒，亞洲國家在努力，中東阿拉伯國家在經歷了對以色列戰爭的挫折後，開始尋求新的團結，這一努力導致七十年代初的埃及與蘇聯關係的破裂，以及打了一場「第四次中東戰爭」，儘管戰爭打成平手，但至少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挫敗的神話。

這一系列在七十年代初期所面臨的變化，說明原有的架構並無太大的改變，而趨勢是：美國和西方陣營的力量在衰退，蘇聯陣營在分裂，中共顯示了新的姿態，中間地帶國家的勢力在加强。

根據當時的局勢發展趨勢，中共提出了「帝國主義坐在火山口，社會主義道路越來越寬廣，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以及「一座座火山爆發，一個個皇冠落地」的形勢分析。這一分析一度為世界各國的左翼運動所接受。

到七十年代上半葉，中共提出了所謂「三分世界」的理論。這一理論改變了關於存在兩個對立陣營的看法，而從經濟着眼，分為發展中國家的第三世界，發達國家的第二世界，和在全球進行爭奪勢力範圍的第一世界。這一劃分的目的是在國際上結成一條反美蘇兩霸的統一戰綫。而所根據的局勢發展的現實，則是美、蘇各自在其勢力範圍內受到挑戰，令出不行，而第三世界從獨立運動到以能源、資源為武器的抗爭，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實力。

三分世界的理論固然多少改變了對六十年代架構的看法，但本身仍然是承接六十年代局勢發

展的另一種單元化架構的觀念。

七十年代以來，國際政治局勢的發展，不斷地向單元化架構的觀念衝擊。歷史的進程表明，七十年代國際政治局勢的特點，是向着多元化發展的。

從政治上來說，中美關係的突破，蘇聯陣營的進一步離析，中共與阿爾巴尼亞的破裂，越戰後發生越柬戰爭和中越戰爭，埃及和以色列戲劇性地和解，不結盟國家中的古巴的楔入，使原有的單元架構發生了互相滲透的情勢。七十年代初期以三股勢力爲標誌的架構消失了。

從經濟上來說，六十年代顯得越來越衰弱的西歐，在共同市場的組合中轉好，成爲七十年代最强大的經濟勢力；英國因北海油田的開採也帶來了經濟好景；能源問題的出現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建立，對世界經濟發生擧足輕重作用的影響；不少資源和原料出口國也成立了與石油輸出國相類似的組織；發展中國家由「七十七國集團」發展到九十多國集團；與石油輸出國組織相對應的，還有幾乎是定期會晤的西方七大工業國的經濟會議。各個不同組織內部又有着分化，分屬不同組織的某些國家又各自爲了本身的利益互相拉攏。以七九年伊朗挾持美國大使館人質爲例，儘管一般國家都不同意伊朗這種違反外交原則的做法，但許多國家却爲了石油而不願意與美國共同採取制裁伊朗的行動。

在中共提出三分世界的理論時，世界上就有第四世界、第五世界的說法。也就是說，在第三世界中有些國家因擁有石油資源而成爲全世界個人收入最高的富有國家，也有一些是既無工業技

術、又無資源可賣的最貧窮的國家。第三世界中還有像古巴、越南這樣的與蘇聯結盟而號稱「輸出革命」的國家。中共的反霸其後發展到集中反蘇的國際外交路綫，支持巴列維的伊朗、波爾布特的柬埔寨，甚至支持一度對蘇聯發點小脾氣的烏干達的阿明，反對在安哥拉解放戰爭中接受蘇援的解放力量，這些做法都顯示中共的反蘇統一戰綫過於簡單化，以至達到不理智的程度。這是把世界看成單元架構所犯的錯誤。

七十年代的國際政治向多元化發展的原因，是由於許多號稱不同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國家都要面對一些共同的問題，如能源、污染、資源、糧食、人口、通貨膨脹等等，它們不得不爲了求取本國的利益而放棄一貫堅持的原則，不得不採取曾經反對過的其他國家行之有效的辦法去解決困難。世界向着非意識形態化發展，固有的觀念變得模糊了，或變成只是口頭上的東西了。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在交叉滲透，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們對不同國家、不同國際政治力量的看法不再是非黑即白，非錯誤即正確，不再能夠眞正地堅持以過去的架構觀念看世界，而是漸趨於多元化的觀念。

二、科技進步導致社會變遷

七十年代的科技，在理論方面，並沒有像達爾文的進化論、量子力量和放射性元素的發現那樣，出現足以改變人類觀念的突破。也許遺傳工程是屬於突破性的，但它的發展和成熟尙要期待

八十年代。

然而，五、六十年代的科技上的突破，却帶來了七十年代的成熟與普及。美國太陽神計劃在六十年代末實現了登陸月球，到七十年代，這個計劃中所帶來的科技進展，幾乎已全部應用到地球上。大型集成電路（第四代）的成功，對人類的生活影響最大。工業更趨自動化了。商業和行政管理事業，也因電子計算機的普及而在資料儲存、流通和計算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電子工業的發展和在人們工作中、生活中的普及，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社會的結構，也改變了人們的一些舊有觀念。

知識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了。過去，發達國家只希望向落後地區推銷產品，而不願意把機器、生產綫或工廠出賣。這是由於担心落後地區買了母鷄就不買鷄蛋了。到七十年代，出賣先進機器、生產綫和工廠的交易普遍起來了。不但賣工廠、設備，而且還有進一步賣技術資料，賣管理方法，甚至賣招牌的。由於知識、技術、管理方法的儲存、研究、改進是如此重要，出賣這些東西的先進國家已不怕買家把這一套學去，而使賣家以後無生意可做，因爲賣家所儲存的技術資料及研究的系統絕非買家所能得到，因此今年賣了技術資料和管理方法，明年又會研究和綜合出新的資料來，可以繼續出賣。

知識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也說明掌握知識的人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了。電子工業的飛躍進展，使大量體力勞動被自動化的機器代替。有人稱此爲「第二次工業革命」。自動化的、電腦控制的

機器，需要知識水準較高的人去操作。他們不需要什麼體力，却需要知識。體力勞動者相對減少了，以腦力勞動爲主的技術人員大量增加。社會經濟越發展，則以技術人員爲主體的中產階級的人數就越多。甚至在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中，儘管最高層的人事有所變動，而實際執行工作的則是一大批不大會變動的技術官僚。他們懂得怎樣用電算機來處理檔案資料，知道怎樣根據國內外的先例提供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在處理一些涉及專門性的問題（如核能發電）時也知道如何找專家或研究單位作顧問。七十年代的世界政治問題大量地是同科學知識相聯繫的，使當政者如少了這些技術官僚，簡直就無法工作。

中產階級的增加，所產生的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是很難估計的。從經濟上來說，中產階級的收入在社會上居於中等，沒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馬克思主義認爲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使社會向兩極分化，工人階級的人數越來越多，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爲它本身的滅亡準備了掘墓人；但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使社會上佔人口大多數的是中產階級（如美國，中產階級就佔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就使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基礎大大減弱了。從意識形態來說，中產階級一般都受過高等教育，他們比較偏向於從知識的層次來研究實際的問題，較少基於不同的立場和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偏執。從政治上來說，中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大部分要付比例上較多的稅款，而享受較少的福利；在一些經濟逐漸上升的地區，中產階級又要求躋身政壇，或找自己的政治代表人物；而由於知識水平的普遍提高，中產階級總是要求較多的民主。在這十年裏，第三世界的國家和地

區，凡是經濟有較大發展的，民主的要求也就較强烈，其中一個因素是中產階級的增加使民主化有了深厚的社會基礎。台灣、南韓、伊朗、菲律賓等等都是如此。獨裁政治的不斷受衝擊，面臨着不作民主的變革就要垮台的局面，應是七十年代各國國內政治的一個特點。

與上述的變化相聯繫的一個七十年代的經驗是：在一個國家的獨立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倘不同時進行民主化，進行政治的現代化，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過去有一種意見認爲，國家要獨立，這是首要的任務；至於實行獨立運動的政體是否民主，獨立後會實施怎樣的政治，則是次要的問題，一切可以待獨立後再說。這種觀念在七十年代被否定了。以民族主義來喚起民衆進行獨立解放運動，並非難事；但是，獨立後出現越南，出現波爾布特的柬埔寨，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巴列維的伊朗，應該給人們以深刻的教訓。也許，中共的革命和建國三十年的政績，也可以提醒人們注意政治的現代化和民主化。

七十年代台灣的內部局勢，也出現了因經濟發展而帶來的民主的問題：經濟和科技發展，使中產階級大大增加，他們要有自己的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有民主的要求，而當權者始終不願意改革他們的不民主的制度——由三十多年前在大陸選出的民意代表繼續佔有大多數的國會席位，戒嚴法，等等，於是發生了激烈的矛盾和鬥爭。

在七十年代初期，不少人會認爲，台灣和大陸的統一，也許只憑民族主義的觀念就能夠實現。現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台灣海峽兩岸的民主問題，已被許多人認識到是統一的實際障礙了。

即使現在統一，也只不過是徒具形式的統一，或只是減少對抗，增加些聯繫而已。台灣和大陸的統一，只有在海峽兩岸的現代化和民主化的過程中，才能逐步實現。這當然不是短期的事。

三、兩種社會制度經受歷史的考驗

當資本主義進入成熟期，社會主義的思潮也就開始了。從空想社會主義，到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到列寧的付諸實踐的社會主義，再到六十年代，由於與蘇聯的修正路綫鬥爭而出現的毛澤東式社會主義，世界上關於社會發展的思潮一直集中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上。維護資本主義的人被稱爲保守的勢力，鼓吹社會主義思潮、促進社會主義運動的人則被稱爲激進的勢力。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儘管對這兩個概念詳加解釋要化不少篇幅，但在七十年代以前，一般人對這兩個概念都有大致明確的認識。簡而言之，在蘇聯十月革命以前，社會主義是人類一種追求平等的、從資本剝削中解放出來的社會理想，而資本主義則是一種建立在金錢關係上的自由競爭的剝削制度。從意識形態來說，社會主義是崇尚集體主義的，而資本主義則是發展個人主義的。

蘇聯十月革命以後，社會主義就不再只是一種理想，而是指向具體的國家了。二次大戰後，這一類的國家增多，於是連成同一社會制度的陣營，並與資本主義陣營相對峙。五、六十年代，兩個陣營的界綫是很分明的。即使對社會科學沒有什麼了解的人，也會間或談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因爲當人們這麼說的時候，他們的頭腦中所出現的是具體的國家。

六十年代發生了中蘇論戰，於是世界上的社會主義思潮就出現了兩家，一家是蘇聯，另一家是中共。許多人都看到，蘇聯逐漸有資本主義化的傾向；中共也從這方面對蘇聯作了有力的批評。另一方面，毛澤東發動了以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爲號召的文化大革命，顯示出要用一種有力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去挽救社會主義。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概念，在一般人的頭腦中仍然是比較明確的。多數人會認爲中共所搞的是眞正的社會主義，儘管有不少人並不同意這種東西。有些人會認爲社會主義應該照蘇聯那樣進行修正，但他們也不會否認中共所堅持的是社會主義的固有原則。

經過七十年代這十年的局勢變化，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觀念已有了改變。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理論上也許是好的，但在實踐上，却始終令人失望。十月革命後，西方進步的知識分子基於對資本主義現狀的反叛，曾把理想寄托在追求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上。蘇聯走修正路綫後，西方進步的知識分子又寄情於中共，而毛澤東也的確顯示出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氣魄。然而，中共不僅實際表現出了文革十年的失敗，而且近來更坦率承認了文革十年是「一場浩劫」。社會主義經過長期實踐，顯示出了這種制度所存在的問題——主要的是，無論蘇聯還是中國，都無法解決經濟效率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至今未有產生過經濟成長率較高的模式。而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社會制度的變革和進步應該是促進生產力的。社會主義國家，現在爲了解決急迫的經濟問題，不得不向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學習，甚至不惜犧牲固有的價值觀念。今天，經歷了七十年代的重

大變化以後，社會主義似乎又回到空洞的理想上去了。現在要說明哪一個具體的國家實行完全的、合乎理想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沒有意義。

按照馬列的理論，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工業生產的社會化，生產規模的越來越大，與佔有的私人化，是一個無法調和的矛盾，由此而造成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必然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使資本主義經濟幾乎走到了絕路。其後羅斯福以加强國家支配作用的辦法，克服了經濟危機。六十年代末，由於越戰的負荷，美元的外流，再加上一九七三年石油禁運的危機，美國的經濟又面臨崩潰的厄運。在七十年代初期，美國大學中的左派經濟學理論上升，一度且有囊括大學一年級課程的趨勢。但是，幾年之後，由於發揮了國家的支配作用，西方經濟又出現了新的平衡。而正統的西方經濟學又重佔了大學經濟研究的陣地。在七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困境是始終未有得到解決的，而且這種困難已不是周期性而是長期性的了。但是，西方正統經濟學中的均衡理論——即生產者和消費者由於看到經濟前景的訊號而自動作出調節，達到新的均衡——仍有一定的作用，羅斯福時代又的確找到了用加强國家資本主義來解決暫時困難、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辦法，因此可以說資本主義已經進行過一次改革，出現新資本主義，生命力是較以前强大了。一九七三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沒有把西方經濟搞垮，在八十年代西方也許仍然有能力應付另一次石油危機。

從資本主義的發展來看，它是在經過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之後，經受了磨煉，找到了對付的辦

法，產生了新的能力。在七十年代，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國家在艱難地但又一次一次地應付了經濟的震盪和種種社會難題。資本主義並沒有六十年代末所預兆的那樣迅速沒落。它還硬挺着。從社會主義的發展來看，經歷了五、六十年代蘇聯的蛻變和七十年代中國革命實踐的失敗，出現了像三十年代資本主義那樣的危機，產生了自救革命的要求。在八十年代，社會主義必須要尋找出一套解決經濟成長率低的辦法。

社會主義號稱消滅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從而消滅了剝削制度。從理論上說，這是較資本主義公平和合理的社會。無奈社會主義在實行過程中產生了享有特權的官僚階層，形成了新的剝削階級。從現代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來看，由於生產規模越來越大，國家支配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組織性越來越要求嚴密，因此，社會主義制度在這些方面的確比資本主義制度具有更大的優越性。問題是社會主義制度未能解決個人的積極性問題。資本主義國家在解決經濟危機時，採用了原爲社會主義制度所特有的國家支配的辦法。社會主義制度在解決個人積極性和官僚主義問題方面，有的國家也開始考慮借鑑資本主義的物質刺激和選擧任免官員的辦法。

七十年代的變化發展，在社會制度的思潮上，顯示出和十年前最大的不同觀念就是：沒有一種社會制度是完全正確或完全錯誤的，不同社會制度至少在方法上的互相借鑑、交叉滲透，應是通訊系統空前發達、時間空間的概念大大縮短的現代社會所不可避免的事。

七十年代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變化發展，又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在十年前不大會產生的疑問：

歷史的發展規律是否具有必然性？資本主義是否一定會被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本身的變化發展是否只朝着一個方向？歷史的發展、事物的發展是否是單一的？或者會有第二、第三條道路？科技的進步和人類所共同面對的生存問題，會否迫使人們不得不找尋一條新的道路？「歷史往何處去」這個問題，應該只根據一些歷史人物的現成結論來回答嗎？

這是值得人們思索的問題，還是留待讀者們去探索、討論吧。

四、理想主義失落，實用主義抬頭

在社會思潮方面，西方知識分子在五十年代興起了存在主義；到六十年代，伴隨着民權運動而出現了理想主義；進入七十年代，理想主義走向高峯，但發生了使理想破滅的現實，於是知識分子又從理想主義走向現實主義，或者，可以稱之爲新實用主義。

一切意識形態的產生，都是客觀存在的反映。資本主義世界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而導致的過度物質化，爲鞏固個人主義社會而趨於完善的制度化，使個人反而在制度中和物質中消失了，沒有了羣體，沒有了人情，個人主義的制度使許多人感到孤獨和疏離。存在主義的產生，是孤獨的知識分子要找尋個人存在的意義；民權運動的興起，是知識分子要找尋羣體意識。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國的民權運動，黑人運動，反越戰運動，法國的五月風暴，中國的文革，捷克的反蘇示威，激發起左翼的社會主義思潮，通過羣體力量（不惜使用暴力）去爲人民爭取權益、去實

現社會主義理想的意識形態，成爲一時風尚。在西方發達國家，包括日本，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許多大學已無法上課，「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人生態度，已相當普遍地受到鄙薄了。

理想主義者對事物有一定的價值觀念，有一定的是非標準。至少在十年前，許多人對自己所追求的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理想，並不認爲是無限遙遠的，或者認爲即使無限遙遠也值得去追求，或者認爲追求遙遠理想對於積極從事現實社會的工作有一定的推動力。

實用主義則重功利，一切以能否產生具體成果和是否得到眼前的實利爲處事準則。是非標準和價值觀念也服從這種功利的準則。沒有長遠的理想和長期奮鬥的目標。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中國，可說已把理想主義發揮到極致。拋開文革的權力鬥爭的實質不談，若以文革所提出的漂亮口號來衡量，中共爲追求革命的理想可說是不惜打破現存秩序，不惜犧牲既得的種種實利。這種高超的理想主義使中共成爲當時世界各國的左翼份子的信仰中心。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國家中，中共與蘇聯、美國的對抗，奉行獨立自主（甚至達到閉關自守程度）的對外政策，又成爲第三世界國家爭取在政治、經濟、外交上獨立的模式。中共支持越南的抗美戰爭，使中共同美國及世界各國的反戰勢力聯結起來。願意爲正義、理想而奮鬥的西方反越戰份子，也就把北京當成他們的耶路撒冷或者麥加了。

但是，其實在七十年代初期，中共的理想主義就已開始走向破滅了。到七十年代中期，這一

理想的破滅開始在世界上顯露。

個人主義的過份制度化使個人消失，與此相反的是，集體主義的沒有制度也使集體的力量消失了。中共的經驗適足以說明後者。多年來，中共過份强調集體主義，但由於沒有制度，或制度不健全，於是領導者個人的意志決定一切，有組織的集體受個人所控制、操縱，也就變成封建專制主義化了。

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後，印支半島局勢幾年來的發展，使當年拋棄個人利益從事反美侵越運動的進步分子，感到理想的破滅。一九七六年中國發生四人幫事件及隨後所揭露的一切，顯現了在美好的革命言詞掩蓋下的現實的醜惡，也就使世界上許多以毛澤東與中共作爲信仰中心的左翼分子，感到價值觀念的顚倒。整個七十年代，非洲國家與阿拉伯國家的紛亂，使許多致力於爭取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與進步的人，感到精神的失落。所有這些，都不停地打擊左翼進步分子的理想主義。

也有些信仰資本主義現成體制的有理想的人，他們從來不認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好的，他們相信資本主義制度有較充分的自由、民主甚至公正，他們認爲現成體制下可通過爲社會服務，通過個人的本着良知的努力，而達到更公平、更合理的境界。一九七三年的水門事件和七十年代以來的其他的西方政壇醜聞，也使這些信仰西方民主制度的人，感到什麼事情也不可信了。

七十年代開始時，不同信仰的理想主義者都有他們心目中的模式——當時現存的模式儘管還

未臻理想，但他們認爲現存模式是已具備可以達到理想的條件的。而十年的現實是：所有的模式都不爭氣。於是理想主義失落了。現在的世界，出現了人們紛紛對現存模式採取批判態度的時代，甚至可以說是撕破一切假面具、揭露人類一切弱點的時代，到處出現信任的危機。

理想主義的失落，帶來了新實用主義的抬頭。這裏說的新實用主義，並非已經成文的一種理論，而只是在現實世界發展起來的一種行爲標準。這種行爲標準是同理想主義的失落有關的。即當理想主義的價值標準混淆，人們失去了精神支柱和是非標準之後，人的行爲就受到了影響，從追求抽象的目標，變爲回到人間現實，從講求原則，變爲講求成果與功利。

從國際政治，到各國的經濟政策，到科技發展，七十年代以來趨向實用主義的例子，可說俯拾即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年前高度理想主義化的中共，近年的外交也在事實上改變了過去堅持三分世界的單元化的做法，同第二世界國家甚至同第一世界的美國的關係，都被放在優先於第三世界國家的地位；在中共的內政方面，引進外資，設立資本主義化的特區，以及發行外滙兌換券等等做法，都說明中共正在反省過去的太理想主義化。現在又似乎太現實了。

另一個許多人都會注意到的實用主義趨向，就是在大學的選科方面。過去，最優秀的學生除了選讀醫科之外，都依次選讀數、理、化、生，越抽象的學科，去學的人越多；現在，人們都希望多學點實用的知識，電腦、工商業管理等成爲最吃香的學科。不少有機會鑽研學問的人，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或搞文化事業的人，都有棄學棄文而從商的傾向。這都是從追求理想到追求實利

的轉變。

理想主義的失落，新實用主義的抬頭，可能會在許多人們沒有注意到的地方顯現出變化。例如在台灣，五、六十年代曾提出「二十一世紀是三民主義的世紀」這樣的理想主義的口號，强調反攻大陸，現在恐怕連當政者也不會眞正相信能夠實現這樣的目標了。從實用主義出發，在八十年代，台灣與大陸的對抗必定會轉弱。實際的接觸，或首先是通商的要求，恐怕不是國共對抗的意識所能阻止的了。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往往是交替出現、互爲功能的。最有動力的社會，也許是人們旣有長遠的理想，又有中、短距離的目標，並且知道在現實世界可以怎樣邁步的社會。

過於理想主義，脫離實際，是注定要失敗的。七十年代許多事實的發展，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但是，過於實際，樣樣講究實利的社會，又會使人們感到人生的無意義，使人欠缺深度。

社會主義是講求理想的，資本主義是講求實際的。從實際的經濟效果來衡量，在新實用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人們也許會較偏向於講求效率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人類社會是不能完全排除理想的。在實用主義支配下的美國社會，仍有許多人在孤獨、疏離的感覺中，無法從物質生活中得到滿足。他們不斷地找尋新的精神價值標準，找不到新的也要去懷戀舊的，找不到正的甚至找一個邪的，目的在塡補過於現實、沒有理想的精神空虛。七十年代的懷舊潮，瓊斯的人民神殿教事

件，以及七九年末教宗訪問美國所受到的熱烈歡迎，都說明許多人沒有理想是不能生活的。近年來興起的反核能運動，也有人認爲是一種新理想主義的抬頭。

在中國大陸，七十年代也許是理想主義從走向高峯而跌落深淵的時期。現在，新實用主義思潮在中國大陸泛濫了。但現實社會的物質生活不可能在短期內滿足十億人民的需求。社會主義的新的精神價值既然一時未能找到，於是要繼續抓住舊的原則，抓住文革前特別是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種種價值觀念，作爲人民的精神支柱。七九年春天以來所强調的堅持「四項原則」，和恢復優良傳統等等，都說明理想主義不容完全放棄。

五、總結過去，探索將來

回顧十年，人世間經歷了多少滄桑！國際局勢變化萬千。多少過去的朋友，成了今天的敵人；而多少過去的敵人，又成了今天的朋友！

多少信誓旦旦的原則，被棄之於東洋大海。多少深惡痛絕的錯誤，被認爲是現實可行的途徑。多少冠冕堂皇的豪言，被殘酷的現實所粉碎。多少平淡無奇的言行，逐漸顯現出光輝。

多少國家在前進，多少國家在倒退，多少國家在原地踏步，多少國家在兜了一個大圈子之後，又回到原來的出發點上來。

多少民族在向外擴張，多少民族在保衛着自己的國土，多少民族在取得獨立之後，却開始了一個帶來更大災難的自我挫傷的過程。

多少人從信仰，到懷疑，到失望，到消極！

多少人拋棄個人利益，去追求縹緲的理想，却被一片響雷轟回到地面上來！

多少人爲了人羣的長遠的目標，而白白虛耗了十年的生命，今天帶着新添的白髮，回到十年前就應該可以開始的事業上來。

多少人在現實中感到孤獨，感到無根，伸手抓向一堆繽紛的理想化的東西，到頭來却發現自己抱着一堆肥皂泡。

十年的變遷實在太大，十年的歷史實在太難評估。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所寫的：「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這種各走極端的評估，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並不適用。這是一個交义滲透的年代，瑕瑜互見的年代，正確與錯誤混雜的年代，希望與失望交替的年代，既好又壞的年代，政治現實和價值標準走向多元化的年代。

單從理想主義或單從現實主義去評估這十年的得與失，也許是不公正的。人類歷史走到了七十年代，這十年是一個大轉折。它給予我們什麼東西，帶來怎樣的經驗，受到什麼教訓，讓我們從理性方面去加以總結。積極的人生態度永不會去細數已成過去的具體的一得一失，活在滿足於過去的「得」或抱怨於過去的「失」之中，虛度以後的歲月。人類歷史的列車在軋軋前進，它催

促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去好好地總結過去，探索將來。

八十年代應是一個深刻反省和探索的時代。一大堆社會科學的理論問題，等待人們去研究——過去爲什麼成功?爲什麼失敗?爲什麼動機與效果相去如此之遠?未來的道路應怎麼走?等等，等等。

等待着我們的，也許是較諸七十年代更爲重要的十年。

（原載《七十年代》一九八〇年一月號）

怎樣的言論對中國有利？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七十年代》月刊和其他一些香港刊物，在中共當局的同意下，曾被准許寄進或帶進中國大陸。到一九七九年四月間，中共當局沒收寄進中國大陸的包括《七十年代》在內的五本香港刊物，並向收件人致一條子說明理由：「有害安定團結」。《七十年代》月刊於七九年七、八、九三個月，連續發表三篇社論，對中共的做法提出批評。這是本人執筆的八月號的社論。）

怎樣的言論對中國有利？

這個問題相信是中共當局所關心的，是台北當局所關心的，是海內外中國人和華裔所關心的，也是一切留意中國現狀與前途的外籍人士所關心的。

然而，是不是所有關心的人，都認眞地去思考過這個問題呢？有沒有得出什麼結論呢？經常地，當我們聽到有人說哪一篇文章、哪一份報刊的言論對中國有利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過，那樣的言論是不是眞的對中國有利呢？

—

直白說，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想得不多，談得也不多。直至這兩三年來，隨着中國局勢的急劇變化和發展，本刊的編輯人員，以及作者、讀者們，就較多地在私下談論這個問題了。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對有關的名詞作一個界定。即：什麼是「中國」？怎樣才算「有利」？

我們所說的中國，包括大陸和台灣的遼闊的土地，美麗的山河，悠久的文化，九億七千萬善良的人民；我們說到中國，尤其會想起數千年來祖先們的耕耘，現代人民的奮鬥，還有子子孫孫的未來。

我們所說的對中國有利，是指包括上述概念的國家的利益，尤其是指祖輩父輩所期待、今天的人民所爭取、未來的一代所應享有的幸福和快樂。

狹隘的黨派立場對中國不利

由於我們說到中國，首先不是指政權和黨派，因此，我們認爲，從狹隘的黨派利益出發的言論是對中國不利的。

狹隘的黨派立場的言論很簡單，就是要完全符合該黨的眼前政策和眼前利益。報刊言論的本身，是全無獨立性可言的。拿國民黨來說，中共劉少奇在位時，稱之爲「劉酋」，下台後則稱之爲「劉少奇」；江青當權時稱之爲「毛婆」，現在則稱之爲「江青」；鄧小平被批判時稱之爲

「鄧小平」，現在則稱之爲「矮鄧」。共產黨在稱呼上雖文明一點，但由於這十幾二十年來中共政局的變化太大、太多，於是黨報黨刊自打嘴巴和不時地來個「急轉彎」的次數之頻繁，也可以說創下世界紀錄了。

任何政黨，原都是基於某種共同信仰、或爲實現某種共同理想，而組織的。黨報、黨刊宣傳其信仰，也無可厚非。不論是三民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其理論的出發點原都是爲了人民的利益。問題是中國政黨的封建主義色彩太濃，黨領導人的意見之重要性往往超過了黨的最高理想和信仰綱領。國民黨報紙宣傳蔣經國壓制民主運動的政策時，罔顧三民主義的原則。中共報刊過去十多年來的宣傳，也把馬列哲學的核心——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拋棄得差不多了。黨報黨刊的任務與一般報刊不同，它們要做的是宣傳，而不是報道。中共報刊受中宣部領導，目的是宣傳領導人的意圖、中央的決策，而不是報道事實、反映人民意願或是作爲政黨與人民之間意見溝通的橋樑，甚至不是宣傳黨的信仰綱領。儘管打倒四人幫之後，中共報章也刊出不少羣衆來信，反映了一些人民意願，但是還有禁區不能闖進去。

在海外，某些報刊言論和某些知名人士的言論，其黨派立場也十分明顯。這些言論中或許有不少是以愛國立場爲出發點的，但因爲長期以來習慣了愛國即愛黨，愛黨即擁護特定政黨的當前政策，並順着這些政策做文章。人民的利益和意願、個人的理想甚至道德觀念，儘管在不少人的心中仍然不至於泯滅，但却不能公開表現出來。這對不少人來說是痛苦的。當然也有完全不感到

痛苦而且十分適應這種做法的人。

海外言論中，有些報刊雖非黨報、有些人雖無參加任何政黨，而其黨派立場也十分明顯。這是因爲這些報刊、這些人强烈仇視和憎恨一個特定的黨派，因此其言論就一面倒地偏向另一個對立的黨派立場了。

從狹隘的黨派利益出發的言論，只服從黨派的一時的決定，不論是非，不管眞假，不辨黑白，不顧人民的利益，只是一味黨同伐異。這樣的言論短期而言或許尚能符合政黨的利益，長期而言則使政黨不能取信於民，違反了政黨的長遠利益，當然更是絕對地於中國不利。

狹隘的民族立場對中國不利

近百年來，中國積弱太久，被外人欺凌太多。有相當長的一段期間，中國人民失去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變成崇洋媚外，本身則無所作爲。在海外，廣大華僑也因爲母國之積弱不振，而飽受輕蔑與欺侮。

中共建國後最初的一段時期，內政的奮發，外交的堅强，大大振奮了人民的自尊心。在海外，華僑也因中共的漸漸强大而感到顏面有光，甚至得到了較好的處境。

從民族觀念出發，需要把中國的進步向人民宣揚以提高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擺脫萎靡不振的精神。這是對中國有利的言論。

然而，狹隘的民族立場却往往表現爲對中國、特別是對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政權的偏袒。許多人喜歡聽到講中國的好話，不喜歡聽到壞話；聽到中共的宣傳就高興，聽到中國出了什麼亂子就千方百計爲之辯護解釋。濃厚的民族主義感情往往如霧中看花，一切都被美化。再大的缺點和問題都能說成是好事。

民族主義觀念有文化的背景，有理性的認識，而更多的是感情的因素。正如愛上一個人就很少看到她的缺點一樣，許多人愛上祖國就會看不到她的缺點，或者從感情出發爲她的缺點遮掩、解釋。

在這裏，我們必須承認，本刊過去也刊過一些這樣的言論、文章。有人認爲，我們也曾經相信，這樣的文章有助於增進海外華人的團結及向心力。然而，多年的經歷使我們認識到，不反映全面事實眞相的言論，無論對中國還是對海外華人的認識和團結，都是不利的。今天，我們對本刊曾發表過這一類文章而感到不安和抱歉。

看風使悝的言論對中國不利

從狹隘的黨派立場出發的言論，論者至少是相信（或誤信）他的言論是對特定政黨有利的；從狹隘的民族立場出發的言論，論者也至少相信（或誤信）他的言論符合民族的利益。最令人作嘔的是一種爲迎合當權者的看風使悝的風氣，或是瞎捧的風氣，每逢國內出現一件事物，他自己

還未弄清楚或不十分了解，就以賭徒的性格和心理，張開了鼻孔辨氣味，看風向，看準了就猛押賭注。這種言論以對得勢者、特別是剛剛得勢或重新得勢者的吹捧阿諛、投其所好為特點。風向偏左，他就還得左三分；風向偏右，他就要更右三分。一九七〇年中共提出要在二〇〇一年實現共產主義，有人在演說中表示還可以打七折，即在一九九一年就可實現。一九七六年中共開始「批鄧」時，起初還是按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有的言論則已高喊「打倒鄧小平」。四人幫講了一次「按既定方針辦」，有人寫文章就講十次「按既定方針辦」。中共報刊提出學習南斯拉夫的經驗，於是也有言論為南斯拉夫的脫衣舞、色情刊物辯護，認為這是東西文化對性觀念的看法不同，總之南斯拉夫是沒什麼缺點可以批評的。中共近年提出要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也有的言論表示可以提前實現（其實，只要拿個計算機算一下總產值和增長率，就知道根本不可能）。中共提出糾正毛澤東和文革的一些具體錯誤，有的言論就立刻來個全盤否定，而不作具體分析。

看風使帆者也有兩種：多數人缺少獨立思考，對過去所宣傳的中共永遠正確的觀念生了根，或從「好心」出發，把中共報刊的意見加油添醋地宣揚。另一種人則是沒有理想的，為了個人利益可以做一切的事，罔顧新聞道德，甚至不惜揑造事實。不管是哪一種情形，誇大的言論都只能使無知者受欺瞞，而為識者所恥笑。短期內，可能滿足部分人的宣傳的心態，長遠來看則毋寧說是散播愚昧。

報道內幕對中國有利

本刊一向不喜作蜚短流長的報道，不着重小道消息和內幕新聞，然而，冷靜地考慮，則認爲報道內幕是對中國有利的。只不過，這種內幕報道應限於有意義的話題，揭人陰私究竟是不道德的事。

所謂有意義的話題，是指領導層的思想鬥爭、政治鬥爭以至權力鬥爭，是指一些高層人士的談話。在這些方面，西方國家的報道是比較公開的。在任何國家的政治領導層，鬥爭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如不斷地有所報道，一方面可以使暗鬥變爲明爭，可有限度地防止在表面平靜中醞釀成激變；另方面，人民對這些鬥爭有心理準備，不會因事發突然而吃驚。

中國一則由於封建意識中的「家醜不可外揚」的心理在作祟，二則在中共幹部中有不少人仍然是三十年代搞白區工作的那種着重機密、隱秘的心態，因此對領導層的會議、爭論以至重要的談話一向是封鎖的。新華社發表的中共領導人的公開講話，若不是大型會議或國慶宴會之類的演說，就是與外賓會見時互相問好的客套話。在平時，人民不能知道不同的領導人對同一問題或不同問題的種種見解和主張。領導人之間爭論問題，在未有統一意見之前也不會讓人民知道。北京民間刊物《四五論壇》主張人民的權利中應有「知情權」，因爲不知道領導人在幹些什麼，對人民關心的問題有什麼主張，人民就無法行使民主的權利。

我們認爲，中共最好讓人民有「知情權」。一切不屬於國防機密的事，都應該讓人民知道。領導人之間的不同意見，彼此的一些爭論，特別是領導人的一些政策性的、指導性的談話，不必把人民分成十等來加以傳達，索性通過公開的傳播媒介讓人民知道。人民知情，對當權者可以起監督作用，當權者也可以較廣泛地聽到人民的意見，可大量減輕羣衆來信的浪費與負担。政爭公開化，人民可以作評價，也可避免使矛盾尖銳化，以致不時發生使人捏着一把汗的政權不穩局面。

或者有人說，你這是假定領導層一定會發生鬥爭，但現在領導層十分團結，根本沒有分歧，你大談權力鬥爭豈不是反而有害安定團結？

然而，會有完全不存在分歧和鬥爭的領導層嗎？如果領導層眞是完全沒有分歧的話，一些不符合事實的報道又怎會影響這種緊密團結呢？如果領導層沒有分歧，那就說明社會上的不同思潮沒有反映到領導層中，領導層的思想也就趨於凝固和僵化了。

分歧和鬥爭是不可能不存在的。公開報道，不會有害安定團結，相反地是有利於安定團結。這種公開報道，最好由中共當局自己去作。但中共當局既然不作，海外一些報刊作內幕報道仍然是對中國有利，對人民有利的。至少可使海外的中國人了解中國的眞實情況，不致於像過去十多年那樣，在不斷强調團結中不斷地發生駭人的突變，使人們對中共政局以致中國前途越來越失去信心。

四人幫粉碎前一兩年，一些西方報章對中共的權力鬥爭就不斷報道，使海外許多人心理稍有

準備；四人幫粉碎後，一些香港報章所作的內幕報道，也大大有助於人們了解事態的眞相，甚至了解粉碎四人幫的意義。中共是應給這些報道記功的。

當然，大部分海外報刊的內幕報道，目的都是爲了吸引讀者，追求銷數。這沒有什麼不好。只不過，內幕報道必須力求可靠。這是新聞從業員的起碼道德。有的報刊以唯恐中國不亂的心態，抓住小小的不可靠的內幕新聞，就無限誇大，甚至憑空揑造一些內幕，胡亂渲染，這當然對中國沒有好處。但總的來說，從十多年的實踐來看，可靠的內幕報道是對中國有利的。

不同的利弊觀

根據過去所發生的種種事實來看，特別是從香港五份刊物被中共當局沒收的事實來看，我們認識到：對於「怎樣的言論對中國有利？」這個問題，我們和中共當局不少人的看法是迥異的。

大致而言，上面列出的幾種言論，我們認爲對中國有利的，中共某些官方人士則認爲不利；我們認爲不利的，他們則認爲有利。

以報道內幕而言，由於封建意識的影響，中共幹部習慣把領導人的談話視爲「聖旨」，不輕易傳達，不輕易見報，見報時更不能有一字的錯漏（即使是無關重要的字），甚至領導人寫錯了字也不能改。對領導層的分歧，黨報更是不敢提了。於是發生了這樣的事：海外一些民辦報紙報道了中共領導層鬥爭的內幕；黨報加以否認；最後是黨報報道了同一的情況。由此而使黨報失去

不少讀者。

一般來說，中共某些官方人士對海外言論的利弊觀很簡單：凡是順應中共當前施政的，則被認爲有利；提出反對或不同意見的，則認爲有害。順與逆，只以短期政策、態度爲依據。中共的缺點和錯誤，如果是屬於過去的，特別是文革期間的，中共報刊自己已經揭露了的話，海外言論跟着批評一下是可以的，這是順者；如果屬於現在的錯誤，而且中共報刊沒有碰過的，海外言論去批評，去碰它，那就是逆者。天安門事件平反後，你寫文章批評那時如何沒有法制，是可以的；至於現在，按情節遠不如天安門事件時嚴重的魏京生、傅月華事件，就碰不得了。大陸上大批人組織偷渡來香港的事，香港親中共的報紙原來一字不提；待到《南方日報》有文章批評偷渡，香港這些報紙就也提了。

前述幾種類型的言論，除掉「黨派立場」的不算之外，中共某些人士最歡迎的是民族主義立場的言論，這種言論總是感情比較純眞，較有說服力，而又爲中共說好話，能達到爲中共在海外爭取人心的目的。其次是政治投機的言論，據說「投共產黨的機好過投國民黨的機」，尤其是吹捧阿諛，善把當權者的意見秉承發揮，是很討人喜歡的。當然，最使中共某些人士感興趣的是「右派轉向」人物的言論，從「任務觀點」來看，有人「轉向」就說明中共的工作做得好，是某些人的「工作成績」。

我們不同意順者友而逆者敵的觀點。我們經過相當長時期的觀察、反省與反覆討論之後，深

切地感受到，過去被認爲是愛國的言論未必對中國有利，過去被認爲是親中共的言論未必對中共的未來有好處。因爲，考慮到中共十多年來的政績，第一，這些海外順着說的言論實際上支持了中共內部推行錯誤政策的人；中共是重視海外言論的，推行錯誤政策的人會以海外言論爲武器，打擊他們的反對者。第二，這些海外言論使中共當局滿足於已取得的成績，而任何時候，不滿足才會有進步，尤其是以目前的情形來說，中共更不應有任何滿足。第三，這些海外言論在過去雖然爲中共爭取到一些人心，但同時又對許多人起了誤導的作用，使人們對中國大陸過於理想化，待到與中國的現實有所接觸，就感到理想破滅，因失望而悲觀、消沉，人心得而復失。第四，宣傳的不斷自打嘴巴，就會使人們厭棄宣傳，最後是宣傳的破產，以後的宣傳即使講了眞話也很少有人相信了。由此看來，一面倒的、歌功頌德的言論，對中國不利，對中共本身也沒有好處。

應提倡怎樣的言論？

在海外，究竟怎樣的言論才對中國有利呢？

我們認爲，首先，應把中國的長遠利益放在首位，而不要只着重短期的宣傳效果。什麼是中國的長遠利益呢？就是逐步走向民主化和現代化。從意識形態方面來說，重要的是肅清專制主義的思想意識。什麼是短期的宣傳效果呢？就是當權者當前的一些策略性做法。這些策略性做法是會改變的。如果策略性的做法不符合眞實的情況，決不應爲遷就眼前而犧牲眞理。

其次，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黨派利益、報刊利益、個人利益之上。執政黨做得對的，當然應該予以肯定和鼓勵；但如果做錯了，人民吃了苦頭，你却爲黨派唱贊歌，甚至不惜吹捧阿諛當權者，投其所好，以博取報刊以至個人的利益。這樣的言論豈是對中國有利？

其三，必須尊重事實。以事實爲主，而不是以辯解的技巧爲主。任何事實、矛盾、問題，只要是大事情而不是婆婆媽媽的事，只要對讀者了解中國的眞實情況有幫助的，就不妨攤開來講。有人說，揭開瘡疤，會使親者痛仇者快。我們認爲，只要是事實，親痛仇快也不妨。若眞是親者，痛定之後，就會盡自己的力量幫助母親癒合瘡疤。仇者雖有一時之快，但瘡疤癒合之後他就不快了。親痛仇快，總比大家胡塗好些，總比活在謊言中仇痛親快好些。

其四，認眞地研討中國問題，須熱誠而不是嘲弄，理智而不是情緒發洩。我們主張光明磊落地把問題講講清楚，反對對一些問題（如毛澤東和文革）捂住不許討論，却不時地在一些文章中放冷槍。我們認爲，一個執政黨，做得好是應該的，不需要人民去感謝；做得不好則要有勇氣承担責任，不能把過錯都推在幾個人頭上。把大家關心的問題提出來，把材料攤開，讓人們議論，相信眞理越辯越明，大家把話說穿了，心情才會舒暢。

最後，以上所提的這幾點，如果在中國大陸還做不到的話，海外報刊應可利用我們的自由園地，大胆提出各種不同意見，並希望能把這股民主之風，種種活躍的思想，吹向中國大地。

這一兩年來，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正是循着這樣的方向邁步。我們談到的問題還不多，我

們還沒有開始深入探討中共的體制問題，我們只是剛剛邁了小小的一步，就受到了中共當局的禁制。我們不禁爲中國的民主化感到担憂：海外的不同意見的言論都容不得，怎能期望中國國內會有與當權者不同意見的言論出現呢？

然而，我們堅信；只有批評才能進步；中共領導人今天所需要的是逆耳之言，而不是讚美詩。我們會繼續循着我們認爲是對中國有利的言論方向努力。不管中共當局會不會改變箝制言論的態度，不管他們是否聽得進我們的話，我們是不會放棄言論工具應盡的責任的。

中國的文學創作將促進民主化和現代化

——在愛荷華「中國文學創作的前途」討論會上的發言

儘管我的寫作生涯是從寫詩、寫小說和寫文藝批評開始的，但這十年來，我更注意的是中國的政治問題。因此，當我今天參加討論「中國文學創作的前途」，我的看法也會偏於政治化。更準確地說，我認爲一個民族的文學前途，是和這個民族的政治環境、政治前途分不開的。

當前，中國的政治前途，不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都是要爭取民主化和現代化。民主化的目的是使人民有權，現代化的目的是物質文明的進步，在人民有權的情況下，這種物質文明的進步就會導致人民生活的改善。

人民對民主化和現代化的要求，在大陸和台灣，都是十分强烈的。

在台灣，現代化已開始了一定的進程，並取得一些成果。這種進步雖是在特殊的條件下由於人民的努力而取得的，但同時也以犧牲了人民的一些民主權利作爲代價。台灣的戒嚴法和獎勵外資條例，使台灣工人沒有罷工的權利，而且成爲外國資本榨取廉價勞力和輸出公害的場所。在這

樣的情況下，迫害作家和新聞工作者，禁制書籍刊物，這一類的事情也頻頻發生。

在大陸，自從一九五七年以來，一直受到「左」傾路線的支配，經濟的發展不斷受到挫折。人民的生活不但得不到改善，甚至可以說是每況愈下。人民不但沒有民主權利，甚至缺乏人身自由和生存權利。人民在生活上困苦和在政治上受壓抑的時間實在太長了。因此，在今天開始有權利談論民主和有權利談論改善生活的時候，對於民主化和現代化的渴求也就更爲强烈。

然而，我們又看到，儘管人民有這麼强烈的要求，但無論是在大陸和台灣，統治階層中還有不少人，爲了本身的既得利益，仍然漠視、壓制以至打擊這種要求。

面對這樣的時代，一切有良知的、關心人民的、忠於藝術和現實的、有時代使命感的作家、文藝工作者和新聞出版工作者們，都不應該在人民的重負、苦難、犧牲、無權的面前閉上眼睛，而應該拋開個人的利害得失，努力去做人民的代言人，爲他們發出呼喊，爲他們爭取權益。我相信，如果作家們在蘸着墨水如同蘸着自己的血肉那樣痛心疾首地表現人民的苦樂，反映人民的民主化和現代化的要求，那就一定可以在未來產生劃時代的文學作品。

有史以來的文學創作者，都是現實社會中敏感的份子。他們能夠而且應該透過文學作品，反映社會現實。現實社會中的動態、傾向和問題，應當是統治階層最關心的事情。讓文學創作者盡量反映出當今社會中的實際情況，不論統治階層對這些看法同意與否，這該是多麼有益而珍貴的資料！讓文學創作者自由地發揮意見，正可以爲整個民族指出明確而富希望的政治前途。關鍵就

在於當政者能不能認清楚這兩方面相輔相成的關係。制定教條規則，限制言論，硬性地用政治領導文藝，其結果是自掩耳目，堵塞言路，整個社會在束縛中日漸萎縮。

我個人對中外文學史認識不多，但有一個未經研究和統計的印象：我覺得在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民康樂的盛世中，不會有茂盛的劃時代的文學創作；而在專制、强權統治的黑暗時代裏，也不會有茂盛的劃時代的文學創作；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在內，文學的繁盛時期，若不產生在一個繁榮盛世開始走向沒落的時期，就多產生於黑暗時代將要過去、光明時代將要到來的時候，多產生於專制統治開始鬆弛或不得不對人民的自由呼聲有所放鬆的時候，多產生於人民的沉重苦難開始減輕、人們可以吁一口氣的時候。

而中國的今天，似乎就處在這樣的時候。

在台灣，近十年來由於內外的處境，對輿論的壓制不得不有所放鬆。在石縫中茁長的台灣文藝的草木，就顯得特別精壯，它在文藝方面的成就勝過了大陸三十年的文壇。

在大陸，三十年來的文藝創作基本上都籠罩在「左」傾教條主義的陰影下。這種教條就是：文藝作品只能寫工農兵，對「社會主義」的現實只能歌頌不能暴露，文藝只能服從於當前的政治任務。這些教條其後更演變成只能突出描寫主要的正面的英雄人物的所謂「三突出」論，以及嚴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然而今天，在經過長時期的破壞之後，面對人民的苦難，一批暴露社會陰暗面的「傷痕文學」已經出現，一種新的文藝理論——反對歌功頌德、反對只能寫工農兵題

材、要求作家鞭笞那個把無罪的人殘害致死的社會環境——已經出現並逐漸佔了主導地位。儘管「傷痕文學」的藝術水平尚有待提高，文藝界仍有許多束縛着作家的思想框框，但當前的中國大陸的社會，正是處於一個可望有繁榮的、劃時代的作品產生的時期。

而中國文學創作的繁榮的前景，將是促進我們大家所更應關心的中國的民主化和現代化的積極因素。

（一九七九年九月）

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的興起

從一九七九年春開始，大約有一年的時間，中國大陸出現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文藝作品和文藝理論文章。這些創作和這些理論，對社會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力，引起廣泛的震動和討論。中共當局也對這一股直接干預生活的文藝潮流作出了反應。

這一股文藝潮流，筆者姑名之爲「新寫實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文藝界經歷過戰爭的災難，面對社會的種種困難和不合理現象，曾經興起過一股尖銳地反映社會矛盾的文藝潮流，在內容和技巧上都取得了優異的成績。這股文藝潮流被稱爲「新寫實主義」。今天中國大陸的情形，也是經歷了一場災難之後面對着複雜矛盾的社會問題。於是，尖銳地反映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文藝，也在中國興起了。

一、新寫實主義興起的背景

談到這股文藝潮流興起的原因，我想趁此機會回答一些朋友對一九七九年秋天我在愛荷華「中國週末」中發言的兩點意見。

一九七九年九月，筆者到美國愛荷華參加「中國文學創作的前途」討論會，並應邀發言。在我動身前往美國之前，我還沒有看到多少新寫實主義的作品和理論，我只是根據個人對中國社會現實狀況的發展，提出了我對中國文藝前途的估計。

從美國回香港以後，我的這篇發言稿也刊登了。其後我聽到了兩點不同的意見。意見之一是針對我在發言中所說的「一個未經研究和統計的印象」，即認為在太平盛世或黑暗時代中，都不會有劃時代的文學作品，而文學的繁盛期，總是產生在繁榮盛世開始走向沒落，或者黑暗時代將要過去的時期。由於講話的時間所限，我當時不能舉出什麼例子。在私下的談話中，我和朋友們都舉出了一些例子來討論。一位美國朋友表示，戰後美國經濟繁榮，却沒有劃時代的文學作品。一位德國朋友指出，在希特勒統治的時期甚至到了戰後一段期間，德國都沒有好的文學。因此，他同意極端專制的法西斯統治的社會，的確不能容納需要有個人創作天地的文學出現。但他又說，十九世紀德國的社會繁榮時期，却是有好文學的。我也提出在講到那一段話的時候，所想到的一些例子：唐代大量優秀詩人出現的時候，不是貞觀之治的繁榮盛世，而是唐玄宗腐朽誤國，出現安史之亂，唐帝國開始由盛到衰之後的事，那時才是唐代詩歌的蓬勃發展的時期；清代著名小說《紅樓夢》，正是通過一個大家庭的沒落，反映了清社會走向沒落；五四以後，中國黑暗社會出

現了自由主義的曙光，於是帶來了二、三十年代文藝的繁榮；俄國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蓬勃期也產生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國廢除農奴制度之後。儘管我可以舉出例子，但我仍然認爲這只是「一個未經研究和統計的印象」，它並非必然，社會環境也不是文學繁榮的唯一條件。但我仍然相信，在社會的轉折期中，會帶給作家們特別活躍的思想。

第二個意見是一些朋友不同意我在發言中對台灣和大陸文藝的估價，即不同意我認爲台灣「在文藝方面的成就勝過了大陸三十年的文壇」。這些朋友指出大陸三十年來的一些長篇小說的創作，如《紅旗譜》、《李自成》等的成就，而台灣三十年來並沒有這樣的「巨著」。不錯。但我想，即使單從數量上來比較也不能離開人口的比例。更重要的是，我認爲文藝成就主要表現在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映，對社會矛盾的尖銳揭露，對社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和衝擊力。從這些方面去比較大陸和台灣三十年來在文藝方面的成績，我不能不得出上述的結論。

自從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以來，我們看到中共報刊自我揭露了許多在政治、經濟、法制、文化、道德中的嚴重問題。這些嚴重問題幾乎涵蓋了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且許多問題已經存在了二十多年了。然而，這些社會矛盾和嚴重問題，有沒有在中國大陸的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呢？舉例來說，三十年來，中國大陸出現了不少反映農村面貌的文藝作品，這些作品有的至今還受到海外的推崇。在這些作品中，我們看到貧下中農如何熱心於走集體化的道路，地主富農如何破壞，某些幹部如何右傾保守，然後轉業軍人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幹部又如何依靠貧農，團

結中農，看管地主富農及其子女，「堵資本主義道路」，「闖社會主義道路」。歷史的眞實圖景是否如此呢？也許在搞互助組和合作化的一九五六年以前，這些作品是有一定眞實性的。然而，三十年來，中國大陸農村的問題却主要地是大躍進以來經濟上和生活上的嚴重困難，是中共農村政策的錯誤，幹部的土皇帝作風，各級領導農村工作的人不顧農民死活，以及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低落。這些現象能夠在中國大陸反映農村的文藝作品中見到嗎？若從文藝作品來看，中共的農村政策根本從未發生過問題，封建枷鎖早已在農村打碎，農民既有民主權利，生活又天天改善。這樣，我們就很難理解這兩年來中共當局爲什麼要不斷調整農村政策了。直至一九七九年，作家茹志鵑寫了一篇小說《剪輯錯了的故事》，劉眞寫了一篇小說《黑旗》，都是描寫大躍進期間給農民帶來的災難的。另一篇張弦寫的小說《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更反映了大陸農村三十年來沒有進步的現實。是這些作品所描繪的農村面貌接近眞實呢？還是一九七八年以前的農村題材的作品接近眞實呢？答案是很淸楚的。既然如此，我們應該怎樣估計三十年來中共文藝作品的成績呢？

正如劉賓雁在去年《上海文學》三月號的一篇文章中所說：「實際情況是出現了這樣的怪事：文學和生活在兩條互不相干的軌道上行駛。書裏寫的是一回事，實際生活是另一回事——兩個很不相同的世界。」按照我的意見，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文學作品，不僅與實際生活是兩回事，而且起了一種粉飾太平的作用，使高高在上的國家領導人看了這些作品以爲政策正確，萬事大吉，於是繼續推行左傾路線。虛假的文學創作和新聞報道，與上層的錯誤政策，造成了使文學創作越

來越有氣無力和上層政策越來越左的惡性循環。

回答別人提出的這兩點意見，目的不是爲自己作辯護，而是想把在一次簡短發言中未能充分表達的見解說得更清楚一些，並藉此說明新寫實主義興起的原因。重複一下我的主要意見就是：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文藝界在左傾教條主義的窒礙之下，失去了對社會的衝擊力，現正重新要求恢復文藝反映社會現實這個職能；在最黑暗的時期剛剛過去的歷史轉折時期，必然帶給作家們無數的感慨和洶湧的創作衝動，在當局逐漸減少對文藝的種種束縛的情勢下，文藝創作就能邁出健康有力的自由步伐，產生一些對社會有眞正衝擊力的作品。

二、新寫實主義的文藝理論

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共三中全會以後，由於當局號召解放思想、發揚民主、廣開言路，特別是爲大批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平反，從而把中國大陸的文藝界帶進了一個三十年來所未有的繁盛期。如果說，一九五七年反右前的鳴放期間，出現過眞正反映社會矛盾的、對社會有衝擊力的作品，因而是新寫實主義的第一次發軔的話；那麼一九七九年就是新寫實主義以更加深刻、更加尖銳和更加廣泛的規模出現。不僅文藝刊物的數量前所未有，而且作品在揭露社會矛盾、干預生活、鞭撻罪惡等方面的大膽程度也前所未有，作品中流露出來的作家對生活所產生的深刻的、嚴肅的、扣人心弦的哲學思想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介紹新寫實主義文藝創作之前，也許可以先談談有關的文藝理論。

文學流派中，從反映社會現實這個範疇來看，有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新寫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等提法。自然主義着重描寫現實生活的個別現象和瑣碎細節，忽視對生活現實的思考、分析和概括。寫實主義即等於現實主義，是現實主義（realism）的舊譯。現實主義提倡客觀地觀察現實生活，忠實地反映現實世界，細緻而精確地刻劃現實，表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批判現實主義是指歐洲十九世紀以揭露、批判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爲主的一種現實主義。這種批判現實主義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佔了文藝界的主導地位，並對歐洲社會的發展與變革起了促進作用。二十世紀開始，西方盛行各種流派的現代主義。現實主義文藝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廢墟上，有過引人注目的發展。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自從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一九三二年，在斯大林的參與下，蘇聯一些作家在高爾基的寓所裏提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一九三四年這一口號以定義的形式正式寫入蘇聯作家協會的章程，從而成爲社會主義國家的文藝創作的教條。列入蘇聯作家協會章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是：「藝術描寫的眞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這一句長長的話，也有人加以簡單的概括，就是「用社會主義精神教育人民」。就是這一條被列入蘇聯作家協會章程中的「法律」，窒礙了幾十年來社會主義社會中作家的創作力，以至產生不出優秀的作品。蘇聯文藝界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庸俗社會學的傾向是十分明顯的。在

文藝價值方面，完全不可以同十九世紀俄國的光輝的文藝作品相比，可說倒退了一大步。蘇聯作家西蒙諾夫曾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提出過異議，但他的觀點在蘇聯受到了批判。

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蘇聯文學是被當作無產階級文學的典範介紹到中國來的。在中共革命時期，這些蘇聯作品確實起着推進中共革命文學的作用。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長期以來被中共文藝界奉爲經典的《講話》，更進一步爲文藝創作確立了一些「準則」：工農兵方向；文藝服從於黨在一定革命時期所定的政治任務；在人民內部，特別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要以「寫光明爲主」，工作中的缺點和反面人物「只能成爲整個光明的陪襯」。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他所發表的抗日戰爭的年代裏，也確實對抗日戰爭和接着到來的中共的革命戰爭起過促進的作用。但在中共建國後，斯大林時期定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毛澤東的文藝教條，對蘇聯文學（包含着嚴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庸俗社會學的傾向）的「借鑑與學習」，乃使中國大陸的文藝創作越來越乏味，越來越教條，越來越不敢接觸社會現實的矛盾，只是一味歌功頌德、粉飾太平。

一九五六——五七年的鳴放期間，秦兆陽、周勃、鍾惦棐、陳涌、劉紹棠等人，提出了一系列文藝理論問題的探討，力圖從理論上說明文藝的特殊規律，要求文藝恢復反映現實矛盾的職能。其中以秦兆陽用「何直」的筆名所寫的文章：《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最具代表性。在這篇

文章中，秦兆陽提出了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旣成定義的懷疑，反對「對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釋」。接着，出現了一批揭露生活陰暗面和干預生活的作品。但是，隨着反右運動，這些理論和這些作品都被大棍子打下去了。於是文藝界又回到了萬馬齊瘖、粉飾太平的時期。

直至一九七九年春天，在經歷了長期的浩劫之後，面對着滿目瘡痍，有良知的、有時代使命感的作家再也不甘於去寫「通體光明」的作品了，要求肯定「揭露陰暗面」和「干預生活」的創作方向的文藝理論也出現了。

一九七九年初，剛剛獲得平反和恢復工作的作家劉賓雁，在《上海文學》三月號發表了一篇「關於『寫陰暗面』和『干預生活』」的論文，駁斥一九五七年批判「寫陰暗面」和「干預生活」的理論，認爲是「一次貽患無窮的顚倒」。「批判家以『光明面』與『陰暗面』在我們社會中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比例關係爲據，反對正視和揭露『陰暗面』並同它展開不調和的鬥爭，而生活却向這些批判家們證明必須學習辯證法。在有些地區和領域，無情的生活之手竟使這個九比一的關係最終變爲一比九！」他引述列寧曾指出社會主義可能遇到三種主要危險，一是「自稱爲共產主義者」而鑽進黨內的野心家、冒險家和騙子手，二是「官僚主義莠草」，三是無產階級自己的錯誤。「這三者，都曾在我國出現，並造成歷史上罕見的損失」。文藝工作者要針對這三種危險而寫出揭露陰暗面和干預生活的作品，才能發揮文藝的戰鬥作用。

七九年五月，上海文藝出版社把一九五六——五七年被打成「毒草」的揭露陰暗面和干預生活的作品，重新滙集出版，書名是《重放的鮮花》，反映了上海文藝界一些人重新肯定了揭露陰暗面和干預生活的文藝方向。

七九年九月號的《上海文學》又刊出了一篇彭韵清、楊志杰寫的文章，題目是《反對官僚主義是社會主義文學的重要使命》，正面提出了當前文藝工作的一個口號。文章說：「今天的官僚主義者，比起二十餘年前的『同僚』來，已經有了『新』的『長進』了，這種『長進』並不表現在覺悟的提高，而是更加一意孤行，更加肆無忌憚。他們身上的官僚主義常常和特權思想、走後門等結成一體，成爲社會上一股障礙實現四化的不正之風的『風源』」。「這種現象如果任其泛濫，九億人民的血汗將被這些人一天天『撈』光，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厦也有被『吃』空和『推』倒的危險。」文章號召：「我們是革命的文藝工作者，決不能粉飾現實，應該勇敢地拿起筆，向官僚主義作鬥爭！這是社會主義文學的重要使命。」

至此，新寫實主義文藝的理論已有了雛型：一、總結過去的歷史經驗，證明迴避現實社會的矛盾和粉飾太平無助於社會的進步；二、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主要危險在於混進黨內的野心家、官僚主義者和「無產階級自己的錯誤」，也就是說，主要的矛盾和危險來自領導層，即毛澤東生前所告誡過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因此第三，文藝工作應把反對官僚主義者和特權思想作爲重要的使命。

在建立新寫實主義文藝理論的過程中，又穿插了圍繞《「歌德」與「缺德」》一文的爭論，關於「向前看」還是「向後看」文學的爭論，關於指責揭露社會陰暗面爲「陰謀文藝」的爭論。通過這些爭論，以及去年第四次文代會上白樺、劉賓雁、劉紹棠等的發言，要求作家不能迴避深刻的社會矛盾，要求作家傾聽和反映人民的呼聲，要求從毛澤東的文藝框框中突破，已逐漸成爲中國大陸文藝界的思想主流了。

根據以上的介紹和分析，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到，中國新寫實主義文學的特點，其實就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批判現實主義。它不同於十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那是以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作爲批判對象的；它也不同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那已經被定義爲只能以寫光明面爲主、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人民的文學。新寫實主義文學係指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它的特點不是歌頌而是暴露，不是粉飾太平而是揭示缺點和矛盾，以喚起人們的注意和療救，它針對列寧曾指出的社會主義的三種主要危險——野心家、官僚主義者和「無產階級自己的錯誤」，爲了捍衛和發展眞正的（而不是虛假的）、科學的（而不是愚昧的）社會主義，而通過文藝實踐同這三種主要危險作鬥爭。

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人，在革命時期是站在勞苦大衆一邊的。他們支持和讚揚揭露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的文藝。然而，當共產黨人當權以後，他們的地位發生了變化。這時候，揭露社會矛盾、鞭撻罪惡就等於把矛頭指向掌權的共產黨人的身上了。在社會主義時期，文藝作品

的功能是什麼？新寫實主義文藝的回答是：作家們對社會的現實矛盾和問題的敏感的揭露，正有助於當政者和人民正視矛盾，以便解決矛盾，爲整個民族指出明確而富希望的政治前途。掌權的共產黨人，是繼續以人民的利益爲重，支持和讚揚批判現實主義的文藝呢，還是從維護當權者的利益出發，對批判現實主義文藝採取與革命勝利前不同的標準呢？這是新寫實主義文藝能否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問題。

三、新寫實主義的創作實踐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後，中國大陸的文藝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一、從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七年底，是仍然擺脫不掉「教條主義」舊框框的階段，和文革期間不同的只是，多了一些歌頌老一輩革命家（如毛、周、朱等）的詩文罷了；二、從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號的《人民文學》發表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開始，是「傷痕文學」階段，這時期的文藝作品大部分描寫革命幹部和知識分子家庭在文革期間的悲慘遭遇及留下來的傷痕。三、從一九七九年春開始，是「新寫實主義文學」興起的階段，這一階段的發軔，以《喬廠長上任記》、《將軍，不能這樣做》，特別是《人妖之間》這三篇作品最具重要性。這三篇作品，在揭露社會矛盾，反映生活的複雜性和大膽批評不合理現象以至不合理制度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可以說是以具體的創作成果，結束了以圖解中共方針政策爲固定模式的文藝創作的時代。三篇作品出現後，在中國大陸引起了相當大

的爭論。《喬廠長上任記》的作者蔣子龍所在的天津，一連由《天津日報》發表了四篇對這篇小說的否定性的批評文章，甚至議論到作者的「政治面目和思想傾向」，頗有「打棍子」的氣味。《將軍，不能這樣做》發表後，不斷有人追問作者「到底寫的誰」。其後作者自述這段過程時說：「本來，我是不願回答這類十分可笑的問題的。但是，當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也要求知道我『到底寫的誰』時，我感到迷惘了。一開始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繼而是無言的痛苦攫住了我的心。」《人妖之間》發表後，據知北京也有許多私底下的否定議論，例如說這篇特寫「反對四項堅持」啦，「醜化共產黨」啦，「劉賓雁這種人不可信任」啦，等等。只不過這些議論沒有發表出來。然而，我們也沒有看到中共報刊對這篇出色的作品給予應該得到的評介。

《喬廠長上任記》終於在中央的報紙上獲得了肯定，而《將軍，不能這樣做》和《人妖之間》也沒有受到公開的批評。於是，鼓勵了大批中年、青年的作家，大膽地干預生活。而中共文藝刊物的編輯們，在互相影響下，也對這些揭露生活陰暗面的作品開放綠燈。

新寫實主義文藝剛剛興起時，也就是在一九七九年上半年，文藝作品中仍有相當多的作品以反映文革的黑暗時期或追溯至五七年反右以來的左傾路線為主題。與一九七八年的「傷痕文學」，有很大不同的是：第一，作者們已不滿足於反映黑暗時代的創傷，而是要進一步剖析，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創傷，應該怎樣總結歷史的教訓，它給今天帶來怎樣的問題，等等。作家們的這些思考，不是訴諸理論的，而是訴諸生活的，它飽含着熾熱的感情，通過生動的形象和感人的情節，

而使讀者直接感受到發人深省的問題，並聯繫到自己的處境，激起深思。和一九七八年大部分的「傷痕文學」相比，顯然是深刻得多了。第二，是大批一九五七年被劃成右派的中年作家在文壇上的活躍，他們的寫作技巧的圓熟、精湛，也是大部分「傷痕文學」不能比擬的。

例如有一篇小說是金河寫的《重逢》（《上海文學》七九年第四期），寫一個在文革期間的造反派葉輝，為了保護領導人朱春信而參加了武鬥，並打死了人。葉輝為此受到審判。但在審判桌上却坐着早已解放了的朱春信。這一個偶合啟發人們去深思：武鬥致死是誰之罪？在歷史舞台上，朱春信和葉輝不過是演員吧了，那麼導演呢？

再舉另一篇小說，是高曉聲寫的《李順大造屋》，李順大是一個貧農，他在土改後分得了土地，但沒有房子，他一直指望能憑着勤勞苦幹、節衣縮食，積一點錢造三間屋子。然而，大躍進，大煉鋼鐵，文化大革命，不斷粉碎他一個又一個的夢境。直到四人幫倒台後，他才又有了造屋的機會，只不過在關節眼上也還得送一兩條香烟，才能買到建築材料。在這篇短短的作品中，作者以一個憨厚的典型中國農民的半生經歷，反映了中國農村三十年的面貌，作品包羅生活的深度和廣度，彷彿是一篇濃縮了的史詩。

七九年下半年，作家們的筆觸已大量地從歷史的悲劇轉入現實的矛盾中，作品中揭露、抨擊或者是批評、規勸的對象，已從黨內的野心家、陰謀家，轉為黨所犯的嚴重錯誤，官僚主義者和特權階層，以至制度的問題等等了。

生活中的徇私、包庇、走後門等現象，幹部搞特權以至欺壓人民的現象，大量地成爲作家筆下的題材。而含有更深意味的却是茹志鵑的小說《草原上的小路》（《收穫》七九年第三期）和王蒙的小說《悠悠寸草心》（《上海文學》七九年第九期）。

《草原上的小路》通過三個出身不同的青年，寫出中國社會的等級關係在青年人中間所造成的思想感情上的差異。筆觸細緻而發人深省。小說結尾更意味深長：一個在文革時受到迫害的老幹部石一峯，在對他落實了政策以後，他接到一個右派分子的女兒楊蔭爲父親所寫的申訴材料，這個右派分子是一九五七年在石一峯主持下被錯劃成右派的。石一峯走上了新的征途，而楊蔭寫的申訴材料却被他撕碎於住處。一個剛剛站出來的老幹部，他的靈魂已顯示出灰暗：對自己一手造成的錯案無動於衷。

《悠悠寸草心》通過一個理髮工人的觀察和交往，描寫了地委書記唐久遠及其夫人自文革以來的生活變遷。唐久遠夫婦在文革時歷盡艱辛，在四人幫倒台前，他們的骨頭已經開始變軟了。四人幫倒台後，唐久遠得到平反，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又當起領導來。地位變了，環境變了，手上的權力，使唐久遠夫婦面對無數張奉承的嘴臉，以及可以隨心所欲地得到種種特權。唐久遠從剛恢復工作時的充滿銳氣而漸見消蝕。作者對唐久遠的批評是溫和的，但是社會上確實存在着無數官僚主義和特殊化的泥坑，使一個不壞的人在得到了權力之後，也不自覺地要陷入這個泥坑中。作者對官僚主義者個人的溫和的批評竟成爲了對官僚制度的深刻和嚴峻的批判。

以上談的一些作品，包括《喬廠長上任記》、《將軍，不能這樣做》、《人妖之間》等在內，儘管發表時頗有些反對的議論，但大體上中共對這些揭露社會矛盾的作品是還可以容忍的。經過長期以來實行錯誤政策給人民帶來災難之後，經過文革以來箝制言論的法西斯專政之後，中共對言論的尺度有所放鬆。現在，再不讓人講話顯然是不行的了。

然而，由於過去的苦難太深重，而現實社會的官僚主義和幹部特權問題又成爲人民每天都接觸到的矛盾。文學創作者是社會中的敏感的分子。隨着中共當局對言論的容忍度的放寬，文學家的筆也就越來越大膽地刺向人民頭上的特權階層了。

四、超越了當局的容忍度

七九年八月，上海人民藝術劇院排演了話劇《假如我是眞的》。雖然演出是不公開的，這個劇本也沒有在公開發行的報刊上發表，但劇本已經印出來，並且在大陸流傳了。劇本批判了特權，而且把它作爲社會的普遍現象、而不是個別例子加以鞭撻。就這一點來說，劇作者是相當大膽的。

十月號的《電影創作》刊登了電影文學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裏》（作者：王靖）。這個劇本反映了一男一女兩個青年從文革開始到一九七一年，由於現實生活對他們的精神和肉體的打擊，逐步走向犯罪道路的經過。男青年王海南多次企圖偷越國境，準備參加一個外國共產黨的游擊隊，但都不逞。最後，他在街頭與流氓發生鬥毆，因而傷斃。女青年李麗芳，文革後參軍，在軍醫院

被「首長」和他的兒子先後强姦，其後又由父親作主嫁給一個比她年紀大得多的醫生，醫生思想保守，不能原諒妻子婚前失貞，終於導致婚姻破裂，李麗芳在精神和肉體飽受摧殘的情況下淪爲女流氓。她因犯事被捕後，公安人員尙琪追查她犯罪的原因，一步步揭露出推使她犯罪的種種不幸遭遇。當最後，李麗芳被迫交代出被「首長」父子强姦的事情後，尙琪宣告把她逮捕，同時不得不把牽涉到「首長」的審訊記錄銷毀。他說，「這些材料的命運只有被銷毀。不過，任何罪行都寫在社會的檔案裏，登記在受害者的心裏，這是誰也銷毀不了的！」接着，是一個更加震撼人心的結局：由於尙琪的追查牽涉到「首長」，他也被捕了。

十一月號的《電影創作》又刊登了另一個電影文學劇本《女賊》（作者：李克威）。這個劇本寫一個在文革開始時由於家庭變故而變成無人撫養、流落街頭的女孩子，在飢餓中不得不從求乞、到偸竊，到成爲一個手段高强的女賊的故事。劇本細緻地描繪女賊及其同伙的犯案經過，他們的粗野下流的言行，但對女賊的淪落則寄以同情。結尾時，女賊在被捕後，經過教育，而走向新生。

《十月》文藝叢刊去年第三期刊登的中篇小說《飛天》，是另一個女孩子被迫害的故事。故事開始於文革前，六十年代初。軍區謝政委一句話，把美麗的姑娘飛天帶到部隊去參軍了。謝政委迷姦了她，又跟她過了一段不正常的生活，以致毀滅了飛天與一個青年畫家的純潔的愛情，並毀了她的一生。故事結束時文革的風暴興起，飛天被批判作風不正，「勾引軍區政委」，飛天不

堪打擊而變瘋了。她的身旁駛過一輛轎車，車上坐着新任省革委負責人的謝政委，另一個嬌艷的姑娘偎依在謝政委身邊，姑娘指着街上的蓬頭垢面的飛天，說：「看，瘋子！」

《假如我是眞的》、《在社會的檔案裏》、《女賊》、《飛天》等劇本和小說，雖然沒有前面提到的如《人妖之間》、《悠悠寸草心》這些作品那麼深刻，但却有更大的聳動性。尤其是，如果劇本上演或拍成電影以後，社會的影響就大得多。內容又是以行騙、偷竊、強姦等爲題材，在大陸的社會裏，當能吸引觀衆和讀者的興趣，相信是有票房紀錄的。

然而，就其對陰暗面的赤裸裸、血淋淋的揭露來說，却超越了中共當局的容忍度。去年十一月中共召開第四次文代會。會議似乎並沒有對上述作品作充分討論。但從作家們的發言來看，顯然有接近中共官方的意見和活躍於文壇的中、青年作家的意見。兩者的意見似乎並不一致。接近官方的意見認爲文藝應「向前看」，以反映四化鬥爭爲主要方向，要「互諒互助」、「同舟共濟」，作家要考慮作品的社會效果和道德責任。去年以來活躍於文壇的、創作豐盛的作家，則傾向於要揭露社會矛盾、干預生活，拿出勇氣來面對我們所處的時代。

五、中共當局的對策

八〇年一月十六日，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有相當長的一段談到言論自由以及文藝政策的問題。這段話主要是在闡述「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個前提的時候談

到的。這段話的要點是：「要安定團結，也要生動活潑。」「如果在某些時候、某些問題上生動活潑和安定團結發生了矛盾怎麼辦？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礙安定團結的條件下實現生動活潑。」絕不允許宣傳什麼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內的言論出版自由」，對「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破壞分子的活動……現在應該從重，不是從輕。」「要使我們黨的報刊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報刊、廣播、電視都要把促進安定團結，提高青年的社會主義覺悟，作為自己的一項經常性的、基本的任務」。「文藝界剛開了文代會，我們講，對寫什麼，怎樣寫，不要橫加干涉，這就加重了文藝工作者的責任和對自己工作的要求。我們堅持雙百方針和三不主義，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爲這個口號容易成爲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發展利少害多。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任何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不能不考慮作品的社會影響，不考慮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黨的利益。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就是政治。社會主義新人當然要努力去實現人民的利益，捍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榮譽，爲社會主義祖國的前途而英勇獻身。文藝工作對人民特別是青年的思想傾向有很大影響，對社會的安定團結有很大的影響。我們衷心地希望，文藝界所有的同志，以及從事教育、新聞、理論工作和其他意識形態工作的同志，都經常地、自覺地以大局爲重，爲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會主義覺悟奮鬥不懈。」

一月二十三日到二月十三日，北京召開了劇本創作座談會，就《假如我是眞的》、《在社會的

檔案裏》、《女賊》等作品，展開了討論。二月二十五日，新華社報道了討論的過程，《人民日報》評論員發表了文章《黨領導文藝的良好方法》，事實上是就這次討論作了結論。一九八〇年第四期《文藝報》，詳細刊登了《劇本創作座談會情況簡述》。三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陳涌的文章和杜高、陳剛的文章，是根據他們在劇本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稿整理的。這兩篇文章其實就代表了中共官方所推許的意見。

鄧小平的講話應視爲當前的中共文藝政策。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文藝工作者應以安定團結的大局爲重。細緻地說，就是中共黨不打算像過去那樣向文藝施加政治壓力，干涉創作自由；但是，意識形態對社會的安定團結是有很大影響的，因此不是「强迫」、而是「希望」文藝工作者以大局爲重。

這個講話的精神，其實也是中共召開劇本創作座談會的精神。座談會在鄧小平講話不久之後召開，胡耀邦參加並作了長篇講話。與會者當然少不了要「學習」鄧的講話了。看了鄧的講話，劇本創作座談會的報道，和《文藝報》的「簡述」，《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以及陳涌等人的文章，總之，是看了近幾個月來中共官方（或偏向官方）的文藝政策及意見之後，不免有一些感慨。

用疏導的方法代替「打棍子」

首先，我覺得中共改變過去那種對揭露陰暗面的作品動輒打棍子的做法，是一個進步。中共

報道劇本創作座談會的結論時說，對《假如我是眞的》、《在社會的檔案裏》、《女賊》等劇本，「一部分同志認爲，這些作品是符合社會實際的，是有積極意義的；有的同志則持相反的意見，他們認爲這些作品有嚴重缺陷，總的傾向是不好的，藝術上是不眞實的。會上多數同志肯定了作者們的良好願望，同時也指出作品中存在的重大缺陷。」在中共中央負責人參加討論的情況下，「會上多數同志」的意見其實就是中共官方意見，即對這些作品只肯定作者們的良好願望。我敢打賭，中共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會「希望」這些劇本不要上演或拍成電影了。就我個人讀了這三個劇本後的看法，我認爲《女賊》的確較爲庸俗，我並不欣賞這個劇本；但《假如我是眞的》和《在社會的檔案裏》則是難得的傑作，是符合社會實際的，有積極意義的。中共從維護大多數黨員幹部的利益出發，自然要反對演出和拍成電影。沒有用「禁演」和「大批判」的方法，而是用規勸、疏導、懇談的方法，已經文明得多了。希望這樣的做法能繼續下去，那麼即使言論收緊了，却至少不會給作家帶來災禍。

對兩部劇本的批評

其次，我覺得陳涌等對《假如我是眞的》和《在社會的檔案裏》的批評是相當牽强的。例如他們說《假如我是眞的》對幹部的描寫有片面性，把幾個幹部都寫成小丑，對幹部缺少善意，缺少關心和愛護；這種批評完全不顧一部諷刺喜劇的特點。諷刺喜劇就是要把諷刺的對象寫成小丑，對這些熱衷搞特權的幹部豈能再「愛護」下去？我們不能要求典型人物都代表多數，都是具有全

面性特點的人物。那不是文藝，那是調查報告。典型人物在生活中往往是少數，但却具有普遍的意義。以《假如我是眞的》來說，幹部中有一個張老，其實已經很顧及「全面」了。若從戲劇效果來說，如能在張老剛出現時，就來一個像果戈里的《欽差大臣》那樣的啞劇收場，將更爲有力。使人感到難過的是：沙皇俄國可以容忍《欽差大臣》這樣的諷刺喜劇上演，而社會主義的中國却容不得《假如我是眞的》上演。

又例如，有關文章批評《假如我是眞的》和《在社會的檔案裏》的一個重大缺點，是對這些有濃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騙子、罪犯寄予過多的同情。什麼是這些青年人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呢？批評文章却語焉不詳。也許是「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吧。如果李小璋有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話，那麼趙團長、錢處長、孫局長、吳書記就是有濃厚的資產階級思想了。扣一個「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帽子是容易的。現實生活又如何呢？有多少「無產階級」能排除個人利益的考慮？當一個人不斷地受到迫害和不公平的對待時，他（她）爲自己的利益去做一些不該做的事，是值得同情的。因爲社會對他（她）所犯的罪，遠遠多於他（她）對社會所犯的罪。當然，同情不等於同意；同情犯罪動機與同意犯罪行爲，完全是兩回事。但這種同情，正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所必須具有的情操。陳涌把這種情操說成是作者的小資產階級傾向，若不是麻木不仁，就是和吳書記、孫局長之流站在一起了。

其三，中共官方近來的文藝政策，强調文藝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也就是說，官方不向作家打棍子了，作家則應自我約束，要注意社會效果和社會影響，不要寫不利於社會安定團結和四化建設的文章。

我非常贊同作家應有社會責任感，應考慮到作品的社會影響和社會效果。但是，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應表現在對現實社會的眞實反映上，應傾聽人民的聲音，作人民的代言人，應指出社會的弊端，引起當局和人民的警覺，促使人們去進行療救，而不是掩蓋矛盾，粉飾太平，以致助長了足以影響國計民生的錯誤傾向和罪惡現象。

再說，一部作品的內容，和它的社會效果、社會影響的關係，往往不應只從表面上去評估。不同的人，讀同一部作品，有時會產生不同的思想感情的反應。我以前很愛讀俄國作家契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契訶夫的淡淡的哀愁，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生的絕望，是怎樣感染了我呢？現在回憶起來，當時我讀後的强烈感受就是：這樣的人世，眞的不能繼續下去了，應該努力使這個世界改變一下！許多人讀巴金的《家》，讀魯迅的《祝福》，都沒有因爲它的悲劇結局而感到消沉，相反地，激起了他們悲憤的感情，致力於變革社會的鬥爭。

至於社會風氣的好壞，那是多種因素造成的。文革時除了樣板戲之外就沒有其他的文藝作品，爲什麼文革以來偏偏青少年犯罪事件越來越多呢？今天，青年人看了《假如我是眞的》、《在

社會的檔案裏》，會不會行騙和罪案就因此增加了呢？在世界各大都市中，日本的東京也許是犯罪率最低的（按人口比例），但東京的鼓吹犯罪的讀物、電影却幾乎是最多的。對文藝作品以至言論的社會影響和社會效果，的確應該注意。過去的經驗是：文藝作品對現實盡量美化的時期，正是社會秩序最亂的時期；而文藝作品大膽揭露社會矛盾的一九五六、五七年，却是社會秩序最安定的時候。民主是安定的基礎之一，專制却是動亂的禍根。我了解到今天中國大陸的安定團結的重要性，唯其如此，我更不希望見到以此爲理由去勸阻作家揭露社會矛盾和陰暗面。

「識大體，顧大局」的要求

其四，中共官方又一再勸喩作家和文化工作者要識大體，顧大局，體念時艱，而所謂大局就是安定團結。《人民日報》在報道劇本創作座談會時，提到文藝作品要「有利於現代化建設，有利於安定團結，有利於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會主義覺悟」。跟着說，「那種認爲社會主義文藝只能寫光明面不能寫陰暗面的觀點，那種認爲只有揭露陰暗面才是作家職責的觀點，都是不可取的。」這段話雖認爲兩種片面性的觀點都不可取，但根據上面文意的伸展，「不可取」的重點是後一句話。在中國大陸當前的現實情況下，認爲文藝只能寫光明面不能寫陰暗面的觀點已被現實所粉碎了。近年來，中國大陸不是沒有歌頌光明的和描寫英雄人物的作品，但如果光明面不是在陰暗面的映襯下出現，如果正面人物不是處在複雜、困難的社會鬥爭中，就不符合今天中國大陸的實況，也就沒有讀者要看。因此，所謂識大體，顧大局，就是要求作家不要一味揭露陰暗面，

即使揭露，也要留有餘地，寫一點光明的事物，不要寫成一團黑，作家應該看到大局，看到全局。

作爲一個政治分析家來說，我想看到大局是十分必要的；作爲黨國領導人來說，相信更應該看到大局。但對一個作家來說，提出「識大體，顧大局」的要求則未免有點滑稽。文藝作品總是只反映局部的、具體的事物。作家在作品中可以飽含着對整個國家民族以至人世的現狀和前途的思考，也可以只反映局部的現象。對作家來說，不存在「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問題。如果一個作家見到一棵樹木已經遭了蟲害，他就在作品中指出來，看管整片樹林的人應引起警覺，前去把這棵樹鋸掉；我們不能要求作家在指出一棵樹木腐爛之前，先要從全局出發歌頌整片樹林一番。對整片樹林的評價，不一定是一個作家的職責。

關於培養社會主義新人

其五，中共官方近來的文藝政策，一方面是不鼓勵寫陰暗面，另方面則是提倡文學的政治任務是「培養社會主義新人」。三月二十五日揭曉的七九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結果，《喬廠長上任記》當選第一名。這篇小說正是有一個包龍圖式的正面人物的。第二至第五名依次是陳世旭的《小鎮上的將軍》、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方之的《內奸》、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這些作品都有正面人物形象。儘管不是像文革時所提倡的「三突出」，而是寫了社會的複雜性和正面人物的內心矛盾。但是，正面人物的「榜樣性」或「教育性」，則還是存在的。中共目前提倡的就是這一類的作品：要反映社會的矛盾，生活的複雜性，正面人物要在同種種的人爲的困難

和不合理的現象的鬥爭中，才能向前邁進，但正面人物却用他的行爲教育着讀者；又或者正面人物倒下了（如《小鎮上的將軍》），但他高貴的品質却永留人間。

從當選的這五篇作品來看，技巧上是使人滿意的。但是，我擔心提倡作品中要有正面人物的政策會帶來新的文藝框框。了解中國大陸現狀的人都知道，多幾個包公並不能眞正解決中國大陸的問題，關鍵問題應從制度上消除封建主義的痕迹。

六、結論——焦點是特權問題

新寫實主義文藝理論和創作實踐，都以尖銳的筆鋒，直指幹部的特權和官僚主義。我們看到一九七九年的最成功的作品，對社會帶來强大衝擊力的作品，都毫無例外地揭露幹部特權和官僚主義，這種文藝現象難道是偶合的嗎？我們看到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五中全會對熱衷搞特權的汪東興等人作了處理，對一些搞特殊化的高級幹部提出了批評，更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對幹部的不良作風加以限制和整頓，所有這些改革措施，難道完全同一九七九年新寫實主義文藝的揭露無關嗎？問題回到了最基本的要點上：正如共產黨人在不當權的時候支持批判現實主義文學而在當權後則改變態度一樣，曾經在一九七九年充分支持新寫實主義文藝的中共領導層幹部，在一九八〇年掌握了最高權力之後，會不會改變態度？

劇本創作座談會，充分肯定了過去三年來的文藝成就，而針對幹部特權和官僚主義問題則提

出了以下的看法：

一、承認「我們的生活中確實存在着某些領導幹部的特權思想、特殊化以及官僚主義等不正之風，通過文藝創作揭露和批判這些現象，是完全應該的。」但是，《假如我是眞的》「提出了這樣的命題：假如我是眞的，那麼就是合法的。這樣就容易使人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彷彿社會主義制度正是幹部特殊化和不正之風的保護者。這當然是不符合我們社會的實際情況的。」

二、認爲「當前我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幹部的特權思想、特殊化和官僚主義，是「舊習慣勢力」。「現在有人說我們社會有一個所謂『特權階級』或『特權階層』，這也是錯誤的。」「離開政治路綫，把一部分幹部身上的官僚主義作風和生活上的特殊化（這是應當反對的），孤立地抽出來，誇大爲主要的社會矛盾，也是不正確的。」

三、由於以上兩點——即幹部特權和官僚主義問題；不是制度的產物，不是現社會的主要矛盾——因此「作家在表現和反映這一部分消極現象時，應當充分看到同這些消極現象進行鬥爭、並不斷克服和戰勝它們的積極社會力量」。「過於感傷的筆調」，「使人看不到希望和光明，感受不到美好的事物必將戰勝醜惡的事物，增强不了人們爲美好理想而鬥爭的信念。」與此有關的是「干預生活」的提法，「實際上主要是指揭露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陰暗面和消極面」，座談會「許多同志認爲」，「它作爲文藝創作的一種職能，是可以的，但如果把它理解爲是社會主義文

藝的主要職能，甚至是唯一的職能，那就是不正確的了。這些同志提出，由於對這個口號的理解和解釋不同，容易造成混亂，主張今後不要採用。」

（以上引號內的文字，均引自《文藝報》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劇本創作座談會所得出來的這些結論性的看法，筆者殊難同意。

首先，幹部的特權思想、特殊化和官僚主義等等不正之風，甚至像林彪、四人幫這樣嚴重的事件，絕對不是個別人、某些人的問題，也不僅僅是舊習慣勢力的問題，而不折不扣地是制度上的問題。如若不信，請問那些熱衷於搞特權的官僚主義者，要是生活在制度較完善的社會，即使掌有同樣的權力，他們能不能像在中國大陸那樣搞特權呢？西方一些制度較完善的國家，不會沒有像林彪、四人幫那樣品質惡劣的人，但他們決不可能像林彪、四人幫那樣爲所欲爲。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幹部特權和官僚主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但至少是一種不完善的制度（不管是什麼制度）的產物。事實上，中共報章自己也常常承認，制度上有欠完善。那麼，文藝作品指出社會制度的不完善，是不正之風的保護者，又有什麼不妥當呢？這不是正可以促使人們注意，促使當政者致力於制度的完善化嗎？事實上，中共在一九八〇年開始不斷提出批評並致力於改革的幹部終身職、權力過份集中、內行不能當領導而導致的幹部知識水平低，以及制度化了的過份的等級觀念及其在人格上的延伸，錯誤的對領導人的神化，……所有這些，無不與制度有關。因此，筆者可以毫不含糊地說，也許社會主義制度在原則上是好的，但至今爲止所有社會主義國

家的幹部制度却是大有問題的，中共的幹部制度的確是助長和保護了不正之風，因此《假如我是眞的》這個命題當然是符合中國大陸的實際情況的。

旣然「一部分（多麼大的部分？）幹部身上的官僚主義作風和特殊化」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上的問題，那麼倘若不在制度上進行改善，這些問題就會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中表現出來。指令式的經濟，外行當領導，官僚主義作風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已在經濟領域中引起反省。官僚主義作風和特殊化在生產關係中表現出來，又怎能不會逐漸上升爲社會的主要矛盾？

面對社會上這一切問題，有良知的作家怎能不大聲疾呼？「干預生活」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要求作家對生活中一切不合理的、不正常的現象進行干預！就是要求作家放下個人的私利敢於向邪惡的勢力挑戰！當前最不合理的現象集中表現在哪些方面？當前使人民痛苦、受罪的邪惡勢力是什麼？人民痛苦的根源在哪裏？作家如果傾聽人民的聲音的話，他每天聽到的是什麼？見到的是什麼？新寫實主義的文藝作品已作出了明確的回答。讓我們再看看《將軍，不能這樣做》的作者葉文福的自述吧！他寫好了這首詩，却壓了一個多月不敢向刊物投寄，直至——

「一天，我進城偶然路過北海附近的街頭，只見一條街塵土飛揚，大型載重汽車來往穿梭。我站在路邊的揚起的塵土中，望高牆裏面大吊車忙碌不停。一排排現代化樓房替代了慈禧太后住過的後宮。我兩眼頓時模糊了。雖然在這以前，我也聽說過這一帶大興土木，花了好幾個億，但我從沒這樣眞切地注意過。現在，我分明站在這輝煌的現代化面前了！

「我終於明白黨的各級幹部中的某些人爲什麼敢那樣揮霍人民的血汗的緣由了！那一霎間，我痛楚地想起了秦二世，想起了楊廣！……莫非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革命也因爲種種歷史的局限而逃不脫腐朽的封建王朝的可悲下場麼？

「……」（原載《鴨綠江》一九七九年第十一期）

熟悉北京地理的人都知道，葉文福所寫的地方正是中南海——中共最高層領導人居住的地方。

劇本創作座談會以後，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乃由絢爛歸於平淡。中共當局儘管沒有用打棍子的辦法，但疏導、安撫及由高級領導人對某些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提出「溫和」的批評，也就形成了壓力。而根據以上的分析，劇創座談會的許多結論，是既不符合藝術規律，也脫離了生活現實的。加上一些針對《飛天》《在社會的檔案裏》的文藝批評（如一九八〇年一月出版的《時代的報告》中的「本刊評論員」的文章）用了非常粗暴的語言，把這些作品罵作「骯髒的垃圾」，頗有置作者於死地的含義。據說有不少人不同意這樣粗暴的評論，但奇怪的是沒有人去反駁。當然這與劇創座談會已由文藝界高級領導人作了結論有關。於是忠於現實的作家只好暫時緘默了。在一九八〇年上半年，我們基本上已看不到這些尖銳地干預生活的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

對這些情況，中共的一些領導人顯然是覺察到的。於是，一九八〇年七月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本報評論員」的文章，題目是：《總結歷史經驗，堅持「雙百」方針》。文中對中共建國三十年來文藝界的左傾方針作出了沉痛的檢討，提出「雙百」方針是長期性、基本性的方

針，不能因爲出現一些錯誤的東西、有爭議的東西，就把「雙百」方針收起來，文中批評「近一個時期」「『放過頭了』、『應當收了』之類的聲音又出現在某些講台上或會議桌上；好不容易打開的禁區門口又出現一閃一閃的紅燈；個別領導人甚至又掄起棍子來。」

《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無疑又想給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開放綠燈，以便沉寂、平淡下去的文壇能夠再度興旺。然而，劇創座談會的一些不恰當的結論性意見是必須加以批評的，否則，中國大陸文藝界的許多人仍會躊躇。然而，一九七九年的新寫實主義文藝已經闖開一條路，並產生有力的影響了。今後不管道路有多少曲折，少數大智大勇者一定會繼續朝着新寫實主義的方向走去！

一九八〇年四月寫
一九八〇年八月修改

文藝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國現實
——《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代序

全然不同的現實世界

從一九七九年春天開始蓬勃興起的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創作，給我們展現了一個在過去的作品中從未見到過的現實世界——經濟停滯、貧窮落後的農村，生產不前、管理混亂的工廠，矛盾重重、人際關係複雜、官僚主義盛行的行政機構，各級幹部利用特權謀取個人利益、不顧老百姓死活的醜惡嘴臉，由於受盡迫害而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年罪犯的駭人聽聞的遭遇，使一個正直的人很難維持清白、使一個決心搞好工作的人充滿了困難和掣肘的體制，老年人意志消蝕、中年人苦惱徬徨、年輕人理想破滅致使社會缺乏生機，不同等級的人、不同年齡的人所造成的難以逾越的鴻溝……。

這一切的一切，幾曾在中國大陸的文藝作品中被全面地反映過？在一九七八年以前，我們在

中國大陸的文藝作品和新聞報道中，所見到的是一個全然不同的現實世界，是一個美好的世界，理想化的世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海外不少人了解中國，正是透過中國大陸的新聞報道和文藝作品去認識的。其後，大陸的某些眞實情況逐漸藏不住了，陳若曦的小說也開始揭露了文革以來的陰暗面，然而海外還是有不少人，或從民族感情出發，或對中共早年的朝氣蓬勃和清明政治（如《西行漫記》中所反映的）已深入腦際，總是不相信或不願相信中國大陸所存在的黑暗現實，或者堅持好與壞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之比。直至四人幫倒台後，黑暗現實已逐漸被中共報刊自己揭露了。許多人雖不情願却又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於是，一個絕望和受騙的感覺在過去不少嚮往中共的海外左派中蔓延。對於關心中國命運、關心中華民族前途或者帶有一點社會主義理想的海外許多中外人士來說，這幾年的心情是沉重的，迷惘的。我們既不願意相信種種黑暗的現實，又不能在這些現實面前閉上眼睛，我們更無法在不斷出現令人灰心的現實面前找尋中國的出路和個人的精神出路。「四化」這個字眼出現時，也一度令人振奮。但種種現實已給這個曾經閃光的字眼蒙上了塵垢。

對於中國大陸的人民來說，痛苦就不僅是精神的，而且是物質的。他們曾經生活或仍然生活在我們所知道的陰暗現實中。許多不公平的、不合理的、使人無法忍受的、把人迫向犯罪厭世的道路上去的現實，過去以至現在，就在他們身邊或在他們身上發生。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然而當百分之一的痛苦發生在自己身上，往往就不易忍受。我們對「四化」

也許不那麼樂觀，但我們不必付出什麼代價。大陸人民看到實現「四化」的種種障礙，他們是要在生活中付出痛苦的代價的，陰暗的現實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們不僅有更深切的了解，而且也有切膚之痛。

對於中國大陸上有良知的作家來說，比一般人民就還要有更深一層的痛苦。陰暗的現實除了曾經是、或現在仍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之外，過去的文藝作品未能反映社會的眞實情況，使他們感到更大的不安。作家們的處境曾經很惡劣，這是許多作家值得同情以及他們其實無須歉疚的。然而，對於有時代使命感的作家來說，長期以來他們的作品不能反映社會的眞實情況畢竟是令人痛苦的事。

一九七八年底中共三中全會號召解放思想，發揚民主，促使許多有良知的、有時代使命感的作家將他們對陰暗現實的痛苦的思索，轉化爲創作的實踐，從而把中國大陸的文藝界帶進了一個三十年來所未有的繁盛期。從一九七九年五月至一九八〇年春，在各文藝刊物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了新寫實主義的好作品。這些作品爲我們展現了中國大陸現實生活的眞正的圖景，反映了今天中國人民的心聲和感受，以及作家對生活所產生的深刻的、嚴肅的、扣人心弦的哲學思想。

農村工廠的眞面貌

民以食爲天，佔中國人口最多的農民吃的是什麼，也許最能說明問題。在反映農村生活的作

品《管飯》中，我們看到「在報紙上宣傳連續十幾年大豐收的大好形勢下」，在一個「以穩產高產貢獻大的著名的公社裏」，農民吃的還是二十幾年前一樣的粗糧，一個貧農家庭「連續幾年，餓了肚皮」，經常「困難得揭不開鍋」。在生活方面同二十幾年前有了什麼改變呢？如果有的話，就是：那時候的中共幹部到農民家中吃同樣的伙食，而今天同一個農民仍以自己所吃的招待到他家中來「同吃」的領導幹部，却遭到了這個幹部在日後的打擊報復。

再看看農村「住」的情形。《李順大造屋》寫一個憨厚的農民，土改後一直指望能克勤克儉造三間屋子，以擺脫住船棚、住草棚、住豬舍的命運。一九五七年底，他積了幾年的錢買了造屋的建築材料，不料五八年大煉鋼鐵一來，把他的建材都拿去造煉鐵爐和推土車了；文革時他被專政機關請去，「交了厄運」；放出來要造屋又買不到建材。二十幾年李順大空喊造屋沒有造成，但他看到別人造屋也有問題。他兒媳的娘家原蓋了兩間新屋，偏遇上當權者「要把山河重安排」，化幾萬個勞動日開一條筆直的樣板河，從而要拆除蓋在樣板河未來的河床上的他親家的新屋。又有一個大隊，要把許多滿好的民房拆了，合併到一個地方，造一列建材不足、質量低劣的新樓房，名曰「新農村」。中國大陸農村幾十年的現實是：農民辛苦勤懇，但力氣都花在「大煉鋼鐵」、「重新安排山河」以及「建造新農村」這些滿足領導人的好大喜功的「事業」上了。小說中的一個人物說：「貧下中農吃了二十多年苦造了點房子，一聲拆就得拆，還管羣衆死活嗎。可是公社不仍舊是公社」！

《喬廠長上任記》和《喬廠長後傳》，反映了工廠的現實。從管理上來說，一個電機廠九千多名職工，却人浮於事，光是四個大門守門口的就有幾十個人。正式職工因爲「幹不幹，一個樣」，所以懶懶散散，不能依靠他們生產。於是，工廠又僱請了一千多名臨時工。臨時工每日計工資，比正式職工收入還多，生產任務就大部分落在臨時工身上。喬廠長上任後，辭退了臨時工，正式職工進行考核，以鐵腕着手整頓，把開支節省了六十萬元，全年生產任務却提前完成了。然而，由於文革後遺症所造成的人際關係複雜，和內部的種種矛盾，喬廠長的精力是「百分之四十用在廠內正事上，百分之五十用去應付扯皮，百分之十應付挨罵、挨批。」在《喬廠長後傳》中，喬廠長的主要困擾却不是在廠內，而是來自上級的官僚主義、橫加干涉，把他的得力手下拔掉，以致使這個有剛强意志的人，被困難的巨石壓得頗爲氣餒。

《喬廠長後傳》還涉及中國的外貿狀況，反映出中國出口商品不能依期交貨和缺乏競爭能力的種種背景。

「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形象化

幾乎所有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都以幹部特權和官僚主義作爲故事衝突的焦點，讀了這些反映生活眞實的作品，任何不帶偏見、敢於面對現實的人都不得不承認：中共各級幹部的官僚主義和特權問題，已成爲中國大陸社會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毛澤東晚年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

念，在新寫實主義作品中被形象化了。

即使在上面談到的以反映農村和工廠的面貌爲主的作品中，幹部特權和官僚主義問題也在輕描淡寫中顯得十分突出。

至於矛頭直指貪汚、腐化、墮落的各級領導幹部的文藝作品，在我們眼前所展現的事實就更加驚心動魄，而且幾乎使人不能置信了。

短篇小說《清水衙門》寫一個自來水公司革委會主任莊啓民藉水荒而歛財的故事。在水源正常的情形下，他工作不負責任；有困難時托病住進療養院；而在缺水的時候，他回機關來了，還親自担任供水辦公室主任，以「機動用水」來搞交易，拉關係，不擇手段地謀求私利，而且將這種做法視爲天經地義。

《將軍，不能這樣做》（詩）的矛頭指向一個高級將領，指責他在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後，竟下令拆掉幼兒園，爲自己蓋樓房，全部現代化設備，耗用了幾十萬元外滙。

中篇小說《飛天》藉一個少女的遭遇，控訴了六十年代初一個軍區政委玩弄女性的墮落腐化的罪行。謝政委在決定迷姦少女飛天的時候，一點犯罪的感覺都沒有。「如果不是打出個新中國，像飛天這樣的俊俏姑娘那還不是任人擺佈……現在謝政委愛她的嬌艷和美麗，這能算得了什麼，只不過是生活小節上的錯誤，難道誰會因爲這樣的『小節』，來否定他爲黨爲人民立下的功勛嗎？……」

電影文學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裏》，同樣控訴了一個「首長」和他的兒子，强姦了美麗的少女李麗芳以致把她推向犯罪墮落的深淵。這個「首長」被作者寫成是林彪幫派體系的人物，但整個劇本所寫的社會背景，顯然並非具有林彪當權時期的特質。故事的背景雖是文革開始至七一年，但其現實意義應該是至今還存在的。儘管，軍人玩弄、汚辱女性的事情，以文革開始後的軍管時期最爲頻繁而且嚴重。這已是中國大陸幾乎人所共知的事實了。

中篇小說《調動》，以一個被分配到貴州工作的上海知識青年李喬林要求調回江南的故事，大胆揭露一批中層幹部的搞特權、謀私利的種種醜態。李喬林爲了能夠調回江南，也用盡了各種各樣的卑鄙手段，其中包括陪人事局長的老婆睡覺。中層幹部之間的赤裸裸的物慾關係，純粹以個人利益的考慮來處事的工作作風，是這樣的令人作嘔和觸目驚心。讀完了這篇小說，你簡直不敢相信這就是號稱「社會主義」的社會，也不敢相信裏面的人物就是多少年來號稱「爲人民服務」的中共幹部。如果小說中的現實是存在的話（即使不帶普遍性），我們也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三十年來的幹部制度和行政領導體制，的確存在極大的問題。

《飛天》、《在社會的檔案裏》、《調動》，還有話劇《假如我是眞的》，由於內容的聳動性，都是寫得很吸引人的。然而，把中共幹部描寫得太醜惡，也就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中共報刊的批評。但看來大部分作家是支持應該讓這樣的作品刊出的。《文藝報》曾召集部分在北京的作家、評論家舉行座談會，在談到《飛天》、《在社會的檔案裏》等作品時，不少作家儘管認爲這些作品有

缺點，但却承認作品所接觸的問題是生活中存在的。因此，「千萬不要輕易把它們定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否則革命現實主義的文學就會夭折，文學將重新變爲吟風弄月的甜甜蜜蜜的文學。」（《文藝報》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官僚主義的溫床

《飛天》、《在社會的檔案裏》、《調動》等作品所描寫的現實，儘管不一定是中國大陸的普遍現象，但相信也決不是偶然現象。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中都不約而同地寫到幹部的官僚主義與特權問題，那麼就更說明幹部問題的普遍嚴重性了。

在許多作品中，並不像《飛天》、《調動》等作品那樣，把一些領導幹部描寫得那麼醜惡。一些作家對於熱中搞特權和有官僚主義作風的幹部的批評是比較溫和的，如《悠悠寸草心》、《草原上的小路》、《兒女情》、《未來在召喚》、《人到中年》等等，但惟其對個人批評的溫和，就更顯出幹部問題帶有制度方面的致命弱點。《悠悠寸草心》中的唐久遠，《草原上的小路》中的石一峯，《未來在召喚》中的于冠羣，《人到中年》中的秦波，還有《兒女情》中的田井，他們本質上都不是壞人，甚至有的還是在主觀願望上要盡忠於無產階級事業的人。然而，生活的規律却不能不使他們的靈魂帶上某種灰暗。

復職後的市委書記唐久遠和他的老婆，面對着種種自動送上來的特權，甘之如飴；面對着千

頭萬緒急待解決的問題，他無法應付，不得不東推西搪。

石一峯被平反了，走上新的工作崗位，但對於一九五七年在他主持下把一個正直無辜的人打成右派的錯案却無動於衷，甚至看也不看有關的申訴材料就撕毀了。他爲什麼會這樣？因爲他總不能一上任就處理這樣的事，因爲他也作不了主，因爲當年寃枉受害者的那個人還在台上……。生活的複雜性就在這裏，我們儘管對石一峯的這種態度很不滿，但甚至也很難怪他。

《未來在召喚》中的于冠羣，是四人幫橫行的時候出來參加「三結合」的老幹部。正如他的老戰友所說，如果那時「所有的老同志都不出來工作，那麼請問，從中央到地方各部門的大權將會落到一羣什麼樣的人手裏？」然而，因爲他已習慣了文革以來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習慣了本本主義，思想僵化，不能接受實事求是的政治路綫和經濟政策，成了擋住社會前進道路的人。

《人到中年》中的秦波，一位高幹夫人，則是「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她滿嘴的政治術語，而且在不同的場合能夠運用自如。丈夫患眼疾要開刀，她要求醫院「對革命負責，對黨負責」；去看望一個患嚴重心肌梗塞症的眼科醫生，則勸告病人「對待疾病嘛，既來之，則安之，……」。她使用特權，謀取自己的利益，都搬出一套「革命」的大道理。我們看到這位老太太所說的話及所做的事，表面上似乎樣樣合拍，實質上却蘊藏有不少矛盾的因素。與中共幹部有過接觸的人，對這一切會覺得似曾相識，而且似乎與中國大陸的社會很能適應。社會現實中蘊藏不露的深刻悲劇性也正在這裏。

《兒女情》寫一個有光榮革命歷史的中層幹部，對兒子溺愛，苦心爲他安排，却反而造成了兩代的鴻溝。作者在小說中寫下的一段話，很能反映一些革命老幹部的心態：「兒女，它是什麼時候出現在我們生活當中的呢？它又是在什麼時候，佔領了革命制高點的呢？……好像是他（她）們一出世，就佔了優勢。不知道別人怎麼樣，田井是說過，兒子一生下來，就和自己掛上了不解之鈎。兒子，是她的快樂、痛苦，是她的生活目的，也是她的動力。不知道別人怎麼樣，田井是說過，她唯一的心事，就是把兒子安排安排好。革命呢？她說：『革命已經坐穩江山了。』……」

上述這幾篇作品，所接觸到的幹部問題，儘管不像《飛天》、《調動》等等那樣富於聳動性，儘管作家沒有把最醜惡的現實作爲典型，但是，作品反映的問題却更加深刻和帶普遍意義。官僚主義和特權問題並不一定要發生强姦、殺人、殘害等等血淋淋的事實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它們存在於生活的每一個小節中，在人們呼吸的空氣中，在你幾乎觸摸不到的思想交流中。作家把它們細緻地描劃了出來，我們也許不會震驚，但却不得不掩卷深思：整個制度是否存在着產生官僚主義的溫床？

從這樣的思想角度來看，或者從藝術技巧的角度來看，無疑地，《草原上的小路》、《兒女情》、《悠悠寸草心》、《人到中年》，還有已經震動了海內外的《人妖之間》，比之《飛天》、《在社會檔案裏》、《調動》等等，更加成熟，更有深度，而且富有更多的人生的體味，飽含發人深省的哲理。

不同類型幹部的狀況

假如我們細心分析一下所有這些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的批判對象，那麼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作品所要批判揭露的搞特權和有嚴重官僚主義作風的人物，絕大部分是老幹部。

四人幫倒台後，這幾年來陸陸續續地許多老幹部都已官復原職，甚至由於部分年老病逝而使不少老幹部官升一級。然而，大量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現實，不僅是「官復原職」，而且是「官復原樣」。他們不再記取文革中所受到的衝擊，所曾經作過的對自己的官僚作風及特權思想的深刻檢討，而是隨着對文革的實際上的翻案而覺得自己過去（文革前）所做的全部正確，包括特權思想和官僚作風在內。因為這是革命幾十年的功勞所應該得到的賞賜，因為過去十年已吃盡苦頭，故應該得到補償，因為自己時日無多，與其顧及未來不如享受現成的一切。正是處於顯赫地位的各地老幹部的這一類的心態，使特權階層的思想作風在四人幫倒台後非但得不到抑止，甚且在更大的範圍內泛濫。不是沒有剛正的、一心撲向工作的實幹的老幹部。在《管飯》、《李順大造屋》、《喬廠長上任記》、《未來在召喚》、《人到中年》等等，甚至在《調動》中，都可以見到這樣的人物。但這樣的人太少，他們在官僚主義的汪洋大海和錯綜複雜的人事關係中，邁前一步都有許多困難和掣肘，甚至還有大大小小的泥淖。要繞過這些泥淖極不容易，要有高度的處世技巧，如果硬踩過去則會滿身汚泥，弄不好還得摔一大跤。

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把四人幫的幫派體系作爲批判對象的已極少。那些在文革中憑着造反而被結合到各領導層中的人物已幾乎被全部淸洗了。留下來的人大部分是一度受騙的。隨着文革的被否定，這些人反而有歉咎的感覺，在有所覺醒之後往往產生一種爲未來奮鬥的勁頭。因爲他們大部分還年輕，他們必須爭取中國社會有一個好的未來。《喬廠長上任記》中的郗望北，話劇《報春花》中的韓衞東，就是這一類人物。

受到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最嚴厲鞭撻的，是文革開始不久就「賣身投靠」的老幹部和中年幹部中的「變色龍」，以及我們其實應該稱之爲「軍閥」的人物。後者如《飛天》中的謝政委，《在社會的檔案裏》的「首長」；前者如《淸水衙門》中的莊啓民，《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冀申，《「向前看」的故事》中的郭大勇和尙賢，還有《調動》中的牛朝杰、謝禮民一伙。莊啓民在四人幫時期戴黃軍帽，在四人幫倒台後戴黑呢帽，這個投機分子的所作所爲，不外是保住自己的官位，並伺機謀點私利而已。冀申、郭大勇、尙賢、牛朝杰、謝禮民等等，則是一羣損公肥私、打擊異己、上諂下驕、胡作胡爲、面目猙獰的社會蛀蟲。他們在文革前就是中層幹部，在文革期間他們不是受騙者，也不是委曲求全的幹部，而是乘機向上爬的變色龍。他們的眼中完全沒有人民的利益，沒有國家的前途，而只有一己的私利。由於「有權就有一切」的人生哲學在中國泛濫了十多年，因此被爭權奪利的思想長期腐蝕，而變成各類蛀蟲的中層幹部是爲數不少的。

中層幹部中更多的也許是像《未來在召喚》中的于冠羣那樣的人。他們本質並不壞，但他們

從十幾年工作經驗中所得出來的教訓，最重要的不是做好工作，而是不犯錯誤。「一個從來不犯錯誤的幹部，他一定是個好幹部。大家都這麼說……」對於中共高層明智之士所提出的實事求是，落實政策，按經濟規律辦事等等意見和措施，由於與「本本」不符，相當數當的中層幹部是有所抗拒的，他們的說法是「慢一點，穩一點」。有着這樣的一大批中層幹部，中共向「四化」邁進的步伐就只好「慢一點」了。至於「慢一點」是否即等於「穩一點」，恐怕連說這種話的人自己也不敢肯定吧。

正面人物是普通老百姓

如果說，在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中，批判的對象是各級官僚主義幹部，那麼在這些作品中被歌頌和肯定的，就是許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自四十年代以來，無論是延安時期還是中共建國以後，中共統治地區的文藝作品中的正面形象，絕大部分都是中共黨員、幹部或軍人。即使被正面肯定和歌頌的人物是普通老百姓，這個老百姓也必是靠近黨的，或被爭取入黨入團的，實在並不普通。於是我們看到的中共文藝作品中，幾乎千篇一律地重複一個公式：遇到困難或敵人破壞或走錯了路——大部分老百姓分不清是非——黨委書記或工人農民中的先進黨員率領人民與困難、與敵人、與錯誤傾向鬥爭——勝利結局。作爲正面人物的黨委書記或者先進黨員，他們的頭上都像有了光環一樣，看上去像神不像人。許多

作品寫其他人物很不錯，一寫到黨委書記就失敗。演員最怕演黨委書記。觀衆見到黨委書記出場也就要打瞌睡了。毛澤東一直說人民羣衆是眞正的英雄，但在他領導時期的文藝作品，人民羣衆成了阿斗，英雄都是黨員幹部。

在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被正面肯定或歌頌的黨委書記或黨員 幹部，如《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光樸和石敢，《未來在召喚》中的梁言明，《管飯》中的陳隊長，《李順大造屋》中的劉清，甚至《在社會的檔案裏》還有一個尙琪，在《調動》中還有一個陳亮權。然而，在這些黨員幹部中，除了梁言明之外，其他再也沒有一個是頭上有光環的、沒有缺點和矛盾的、遇到困難能立即迎刄而解的人物了，甚至於他的下場也再不都是「勝利完成任務」了。喬光樸的粗綫條，莽撞，遇到困難時需要妻子的慰藉；陳亮權終於收取李喬林送給他的糧票和保溫杯；尙琪因查出「首長」强姦少女的罪行而他自己立即被捕。這些描述使被正面肯定的黨員幹部顯得有血有肉。

在大部分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中，被正面肯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正是這些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英雄人物的光榮業蹟，使我們看到了中國大陸一般人生活的眞實面貌 。《李順大造屋》中的李順大，《管飯》中的李三田和三媽，《「向前看」的故事》中的孫靜，《草原上的小路》中的楊蔭、蕭苔，《悠悠寸草心》中的呂師傅，《人到中年》中的陸文婷，都是普通的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他們都不是黨員，他們爲人正直，與在同一作品中出現的黨員幹部相

比，他們具有高得多的道德水準。他們過着苦日子，却並不怎麼抱怨，甚至接受着無理地加在他們身上的橫逆，以及橫逆過後的黨的解釋。在他們身上，顯示出勤勞、樸素、善良的中國人民的特有品質。

在這些正面人物中，大都是過去以至現在一直受壓抑的人，而且往往越受壓抑就越顯出他們的可敬的品格。《草原上的小路》中的楊蔭，和《人到中年》中的陸文婷，她們的思想行爲使人讀了以後不禁鼻酸。尤其是《人到中年》，細緻地描寫了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她的工作，她的家務事，她在工作中接觸到的各種各樣的人，她的丈夫、孩子，等等。這篇小說使我們深入了解到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過的是怎樣的日子，也使我想起了一些已經回國服務的留學生。

新產生的差別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原是消滅階級差別，使人得到解放，成爲社會的主人，成爲「眞正的人」，「自由的人」。

然而，在現存的許多號稱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由於自上而下地分配權力的幹部制度，就使社會在消除了因私人擁有生產資料而造成的差別之後，又因權力的分配而產生了新的差別。

這種差別在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中，顯得十分突出。

《草原上的小路》寫三個青年來到草原上當採油工。一個是大幹部的兒子石均，他父親文革以來就被以特務嫌疑的罪名關着，家人則被趕到草原上來；一個是沒權沒錢的營業員的女兒蕭苔，在農村插隊三年被部隊推荐到油田來當工人；另一個是「右派」的女兒楊蔭，她在農村插隊八年才上調當工人。他們見面的時候，互相談起爲什麼來到草原。高幹子弟石均說他是「發配來的」；營業員的女兒蕭苔說，「我是中了狀元才調到這裏來的。」這就顯出了他們之間的强烈差別。蕭苔說起這些高幹子弟，「他們覺得苦的事兒，在我們老百姓來說，都是平常事兒。插隊，種田，燒飯，洗被子，吃窩窩頭，不就是這些嗎？」然而，由於「過去生活道路的不同，所以現在同樣的生活，却比別人吃苦得多。」這篇小說寫三個青年因爲出身的差別，在工作、生活方面的表現也不同。在石均的父親被關着的時候、得到了要被解放的信號的時候、以及終於解放並且官復原職之後，石均的表現都不同，三個青年彼此交往的態度也有了差異，甚至萌芽中的愛情也受到這種差別所影響。

這種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新產生的人的差別，在《悠悠寸草心》中也表現了出來。一個理髮工人，在地委書記唐久遠被打倒的時候，以及唐得到平反並恢復官職之後，彼此的交情就起了變化。這篇小說和其他的幾篇作品（如《調動》、《未來在召喚》）中，還描繪了同樣的人，對上級與對下級，對領導幹部和對老百姓的截然不同的嘴臉。

中共幹部在建國初期同老百姓同甘共苦，經過了二十多年以後却成爲壓迫人民的官僚，這種

差別也在新寫實主義作品（如《管飯》、《剪輯錯了的故事》）中表現出來。

還有一種很值得注意的差別，就是年輕人和中、老年人的思想鴻溝。在《悠悠寸草心》中，呂師傅對中共領導幹部的過去的作風還有良好印象，因此他還有那份心去向官僚化的市委書記進行規勸，但他的兒子則對父親的這份熱心表現冷淡、懷疑，對恢復官職的市委書記帶着敵意。顯然，年輕人沒有經歷過中共領導幹部保有良好作風的時代，他們見到的是「有權就有一切」的生活現實，因而感受就與長一輩的全然不同。

在《兒女情》中，兩代人的差別就表現得更爲明顯了。一個有革命歷史的媽媽總是「望子成龍」，她兒子說：「她一會兒要我學提琴，一會兒又要我學數理化，只有折騰我的本領。我可不行了，二十八歲了，我成不了龍，我也不是龍的料。不是龍我也不去稱龍，我只希望好好地生活。」兒子喜歡一個愛打扮的女孩子，媽媽駡她是「妖精」，然而那女孩子說：「人活勒世界浪，勿是爲了吃點，穿點？阿拉又勿去做壞事體。」（上海話）

兩代人的差別，甚至從新寫實主義文藝的作者中也可以看得出來。老一輩的作家不必說了。這一年來敢於揭露社會陰暗面的作家，如果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中年作家，則對中共黨員幹部的批評多是溫和的，他們的着重點是分析現實中種種弊端的形成原因，喚醒人們對社會的病態進行療效；而二、三十歲較年輕的作家，對黑暗現實的鞭撻會尖銳、無情得多。中共黨的光榮的過去，領導幹部曾經有過的優良作風，對年輕人來說是歷史教科書中的概念；甚至舊時代的黑暗，被列

强瓜分、凌辱的中國，對年輕人來說也是歷史的概念。這些概念更由於重複叙述過多而使他們厭倦了。他們不具有曾經在舊時代生活過的人通常會有的國家民族的觀念。他們對中共黨的感性認識，幾乎完全在中共特權階層開始形成、特別是文革開始以後的時代。又由於這些人年紀輕，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圈子也就更接近底層，他們見到的黑暗現實也就比較生活條件好一些的中年作家要多。年輕人又是更具勇氣的，於是產生了如《飛天》、《在社會的檔案裏》、《假如我是眞的》、《調動》、《女賊》這一類的作品。

結論

在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中，我們見到的是與過去的文藝作品中所反映的截然不同的現實圖景，我們看到在艱辛地、痛苦地生活着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我們看到各級官僚主義者和特權階層的醜惡嘴臉，我們從感性上認識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幹部的背景和心態，我們看到原以消除差別爲目的的社會主義怎樣製造出新的差別……。這種種現實是那樣地令人痛心，令人思之黯然。但是，我們是寧可快快樂樂地活在謊言中呢，還是痛心疾首地去面對現實呢？

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有的在藝術上比較完美，而有的則是比較粗糙的。然而，這些作品所包羅的生活的深度與廣度，它們在發揮文藝反映現實的職能上，在反映人民的聲音，喚醒人們正視現實的瘡疤，號召人們放下自己的私利去參與療效這些積極作用方面，使這些作品取得了罕見的

倘不受到制約，新寫實主義文學還會向更深、更廣的現實生活推進。將來人們撰寫文學史，必會把這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學現象，列爲重要的一章。

一九八〇年六月

建立新的精神支柱

自從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以來，中共報刊一直處於理論問題的矛盾當中。前兩三年，矛盾的焦點是過去的思想路線的是非。一九七八年五月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有關過去的思想路線的是非已逐步澄淸。有關毛的功過問題，目前當然還得避避諱，但其實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是怎麼回事了。

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但是，爲什麼直到今天，幹部和人民的積極性還沒有表現出來？爲什麼整個國家還是顯得混亂和沒有朝氣？爲什麼大部分幹部對促進四化還是缺乏事業心和責任感？

因爲比較起過去的路線是非，人們更關心的是現狀和未來。就現狀而言，中共這兩三年在經濟上儘管有不少錯亂，但比之四人幫時代總算穩步向前發展了；人民的生活也可以說是逐年稍有

改善。就未來而言，中共提出要在二十一世紀以前實現四個現代化，也可說是有一個目標。爲什麼人民還是不滿意，還是有那麼多人牢騷滿腹，整個國家還是沒有蓬勃建設的勁頭呢？

答案是面對現在和未來，整個國家似乎缺少了一樣最基本的東西——新的精神支柱。

資本主義社會鼓勵人們爲個人的利益而奮鬥。這種利己主義哲學儘管帶來了許多問題，但不可否認它是人們的精神動力。過去中共鼓吹「大公無私」、「繼續革命」，這種脫離實際的精神支柱已爲現實所粉碎。隨着中共的對外開放和向西方先進經驗學習的政策，利己主義哲學也就在中國大陸大行其道。「向錢看」、「上下交征利」，是近年海外人士對中國大陸的普遍看法。

「向錢看」，向西方發展生產的先進經驗學習，甚至提出向亞洲的「五隻小老虎」的經驗借鑑，以及中共對自己過去一段歷史的實際上的否定，大大動搖了人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另一方面，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進步，又還遠遠未能滿足人民的需求。隨着對外開放帶來的將中國大陸與外國的比較，更增加了人民對可以得到的物質需求的不滿。於是，對中共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道路和馬列主義的懷疑傾向，就在中國大陸泛濫起來了。

針對着四項懷疑的思潮，中共當局在七九年春天提出了「四項堅持」，表示對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道路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必須堅持。但是，爲什麼必須堅持？怎樣以結合實際的理論來說明必須堅持？這一年來中共的解釋是不足以說服人的。「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對解決過去的路線是非無異是有力的。但這種提法的確有輕視理論的傾向。而且，對

解決現在和未來的問題，建立新的精神支柱，是無幫助的。人們若以這二十年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作一比較，比較南北朝鮮，比較東德西德，比較中國大陸和台灣，比較蘇聯與美國，比較東歐與西歐，以檢驗哪一種制度更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並以此作爲檢驗制度優劣的標準，相信立即可以得到一個不是中共當局願意見到的結論。

「實踐標準」討論和「長官意志」

關於眞理標準的討論，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否定了一切以毛澤東的言論作爲眞理的標準。從而初步打破了「本本主義」、「思想僵化」的局面。但是，這一討論實際上並沒有在理論上深入，而只是由於上層的壓倒性的優勢，使凡是派噤若寒蟬，而各層的領導幹部觀風辨向，紛紛表態，於是，「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意見宣告勝利。其實，這一個命題所牽涉到的不少理論問題，並沒有解決，例如，如果說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那麼，邏輯驗證的作用應該怎樣估計？歷史是過去的現實，應該是已被實踐檢驗過的了，但許多歷史問題的眞理性爲什麼還有待證明？還有，一些科學的假說，如天體的形成，是人的實踐無法證明的，它的眞理性怎樣判斷？至於中共所堅持的社會主義道路，共產主義理想，是否一定要經過實踐檢驗才能確知是眞理，因此才能加以堅持呢？這些重大的理論問題根本就沒有討論，實踐派即以壓倒性的聲音，各層領導的表態，結束了這場所謂「論戰」。

由於在理論上沒有深入，因此出現了兩種情況，其一是「當公開反對實踐標準已經不可能的時候，就把這場很有生命力的討論，變成一個時髦的套話。在口頭上、文件上、文章上、報告上、簡報上、標語上，都加上一句『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至於實際工作呢，那是另一回事：一切如舊。什麼羣衆呼聲，什麼實踐證明，根本不予理睬，說歸說，做歸做。要反對一種新的事物、一種眞理，最厲害莫過於這一着了。這也就是魯迅所說的，一些人習慣於搞的那種手法，叫做『同化』。接過去的是美麗的外殼，而內瓤却完全是舊的。」（《光明日報》八〇年五月十一日）

另一種情況是，由於理論上沒有深入，而各層領導忙於表態，於是當「四項堅持」提出來以後，特別是反對無政府主義、加強黨的領導、維護安定團結及一連串在言論上、文字上收緊的意見出現之後，反對實踐標準的另一種形式又表現出來了。例如反對批「長官意志」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什麼是當今的「長官」，現實生活中的「長官」就是中共的各層領導幹部。在「加強黨的領導」聲中，有的領導幹部就說：「難道長官沒有意志行嗎？」「批『長官意志』會出現無政府主義。」「某一個省的省委負責同志公然在一次會上說：現在有人批長官意志了，哪個長官沒有意志？以後不准批長官意志！」（《光明日報》八〇年五月十一日）

「長官意志」的提法，原出於列寧的著作。他認爲把「長官意志」稱作「政府意志」、「社會意志」都一樣，就是不從社會客觀規律出發而按個人主觀意志（或以「政府意志」形式出現）

辦事。在中國大陸，批「長官意志」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就是反對過去那種不民主、不聽羣衆意見、不作調查研究、只憑上級意圖辦事的作風。這種按「長官意志」辦事的「傳統」在中國大陸實在太深遠了，而造成的損害也太大了，因此才有批「長官意志」的意見隨着實踐標準的討論而提出來。但在這方面，由於也沒有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因此在「四項堅持」特別是「加强黨的領導」提出來以後，又出現了反對的意見。

政策反覆，說明理論矛盾有待解決

回顧四人幫倒台以來，中共在理論上最主要的成果是「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提出。然而，如上所述，由於沒有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由於高層對這個爭論一開始就由實踐派取得了壓倒優勢，反對派的意見並沒有被公開反映出來；更由於實踐派的勝利其實是各層領導按照「長官意志」辦事而取得的，因此，在實踐派取得勝利的同時，按「長官意志」辦事的作風其實更加發展了。換句話說，實踐派的勝利，恰恰不是通過實踐檢驗而取得，而是通過「上級意見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而取得的。這不能不說是一大諷刺。當風向一轉，儘管「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套話照說不誤，但現實矛盾也就視而不見，或不敢提出，只是按長官意志大談安定團結，大談四個堅持，大談黨的領導，大談四個現代化，大談空洞的社會主義的優越和片面的資本主義的醜惡。

許多理論問題在討論實踐標準時提出來，使人們的思想活躍。但這些問題未加討論，就由於中共領導的表態而窒息了。例如關於「興無滅資」的討論。這個口號提得恰不恰當，其實還可以由人民、由理論界來爭論一番，但中共高層却急於表態，說過去毛、周、朱、劉都贊成「興無滅資」的提法，現在華也贊成，故係正確的云云。也許由人民去爭論的結果，仍然認爲「興無滅資」的提法正確，但現在的做法却是按長官意志辦事。

長期以來中共幹部觀風辨向的作風，顯然並沒有在實踐標準的討論中改善，相反倒是有所發展了。因此許多反反覆覆、莫名其妙的事就在這兩年裏不斷發生。例如廣東省的一位省委書記，兩年前曾在一個公開的集會中提出要活躍人民的文化生活，要爲「打麻將平反」。這提法已經夠怪了。但事隔不到兩年，廣州又宣稱要禁打麻將了。因此，有人說：「千規律，萬規律，領導人的話是鐵規律。」（《光明日報》八〇年五月十二日）

偏偏這兩三年來，領導人的話又是變來變去的。一時說，貼大字報是憲法上規定的公民權利，政府無權干涉；一時又說要提議取消「四大」。一時說，要有言論自由，不能夠思想入罪；一時又說把言論散發已不是言論而是行爲，故判重罪。報上一時對友好的資本主義國家盡量美化；一時又刻意醜化。這種無定向風，說明中共在理論上的矛盾始終未能解決，人們沒有好壞標準，沒有能夠使上下都信服的較一致的價値觀念，沒有能夠促使社會進步的精神動力。

過去的嚴重錯誤爲什麼會發生？

要建立新的精神支柱，筆者認爲中共必須從理論上解答兩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過去爲什麼會發生那麼嚴重的災難？

第二，未來的目標是什麼？要奔往怎樣的前方？

對第一個問題，中共起先是把罪過都推在林彪、四人幫身上，繼而承認文革是一場浩劫，然後又承認黨犯過嚴重的錯誤，最後以含蓄的方式實際上也承認了毛的錯誤。

但人民還是不滿足。現在人民不是要追究具體事件的個人責任或黨的責任，而是要了解出現這麼嚴重的浩劫的社會根源。有人提出封建主義的遺毒，有人提出小生產方式的影響，有人提出經濟、文化的落後。但所有這些提法，都不能解決一個憂慮，於是，怎能保證以後再也不會出現林彪、四人幫或者毛澤東搞一言堂這樣的事？假如現在的一個有力的領導人，拉住一個新林彪和新四人幫，既掌握軍隊又掌握輿論，並推行專制的、極左的路線的話，誰能阻止他們？如果說中共黨有勇氣和能力去承認和改正過去那麼嚴重的過錯，因此是「偉大的黨」的話，人們仍然不免要担心，會不會再犯另一次嚴重的過錯，然後再有一次改正，以表現黨的偉大？

筆者認爲，對於過去二十多年所犯的嚴重錯誤，中共不能再只是抽象地承認有錯，更不能把這種含含糊糊的認錯視爲「偉大」啦。在潛意識中，在非正式的談話裏，也不能把過錯往毛澤東

身上一推了事啦。應正視歷史的根源，認眞研究社會的因素，研究制度上的問題。好好比較中國和蘇聯的政治制度，認眞考慮一下大陸民刊所批評的「等級授職制」、「一黨專政」、「所有言論都要無條件宣傳黨的政策」等等一貫做法，是不是造成過去的嚴重錯誤的禍根？是不是產生現在和未來的新的嚴重錯誤的溫床？

「四化」不能成為精神支柱

對第二個問題，即未來的目標是什麼，中共當局的回答似乎是毫不含糊的：實現四個現代化！

但是，什麼是四個現代化呢？它的具體目標是怎樣的？對這個問題，中共的回答在這兩三年內也變了幾次。一九七七年中共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是：要求在本世紀末，使中國的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接近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大部分項目接近，小部分超過。一九七八年底提出要作經濟調整，搞中國式的現代化。一九八〇年一月，鄧小平在報告中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目標是平均每人每年收入一千美元。這數字遠低於目前世界先進國家的水平，甚至低於目前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更不用說要與二十年後的世界相比了。一九八〇年三月，中國經濟專家許滌新在香港說，中國式的現代化，根據中國的人口多和底子薄的實際情況，重點應放在「機械化」上，而不是當前世界先進國家的「機械人化」（「電腦化」）的時代。那就是說，四個現代化不是要

求接近本世紀末的世界先進水平，而只是接近世界六十年代的水平。

除了經濟目標不明確和變來變去之外，中共常說的要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究竟「中國式」是怎樣一個模式，至今未明確。中共又常說，要「在中國的條件下建設四個現代化」，這「中國的條件」又是怎樣的條件，仍然是不清楚。中國的土地情況、礦產資源、水文狀況、人力物力財力等等，似乎遠遠未摸清，因此才會一再訂出一些不切實際的規劃，以致要修訂方案，調整經濟。

以四個現代化作爲全國人民奮鬥的目標，很明顯地，這目標是不夠清晰的，無法在本世紀末達到的（指達到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而言）。更重要的問題恐怕是：究竟應不應該以四個現代化作爲人民的奮鬥目標？

王希哲的意見值得重視

《李一哲大字報》的主要執筆者、青年理論家王希哲在民刊發表的《民主的方向》一文中，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原理，提出了現代化不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目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目的是人的解放，使人類成爲「眞正的人」、「自由的人」。生產力的發展是爲達到這一目的的必要的手段。要使人得到解放，要使人從必然走向自由，沒有物質基礎是不行的；但物質的進步只是達到人的解放的手段，而決不是目的。社會主義創造條件不斷使人民擁有越來越多的民

主權利，使人民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中得到越來越多的滿足感，這才是社會主義的目的。

王希哲的文章是這樣地富於啓發性，他使我們在混亂的局面中重新看到中國應該走的方向：根據被長期湮沒的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以發展生產力爲手段，建立一個比西方民主制度更加民主的社會制度。

這就是奮鬥的目標，這就是應該建立的精神支柱！

回想在抗戰期間，許多愛國的青年爲什麼從白區奔向延安？是因爲延安比重慶更現代化？物質水平更高？不是。是因爲延安比重慶有更多的民主，是因爲人們在那裏可以更自由地發揮自己的力量，實實在在地從事有效的抗戰工作。中共建國初期，爲什麼不少人從海外回歸大陸（升學就業）？是因爲大陸的物質生活比香港好嗎？非也。是因爲回去的人們相信那裏有一個比香港合理的、人民眞正有權的社會制度，是因爲他們相信在大陸可以發揮自己所長，可以在一個讓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下實實在在地建設自己的國家。共產主義的理想，小部分人是有的，大部分人則還不那麼清晰。但他們相信整個社會是逐漸通往共產主義的，社會每前進一步，都會給人民帶來更大的民主和自由。抗戰時的延安，生活很苦，中共建國初期的大陸，也還是相當窮，但民主的方向成爲社會上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中共要解決這幾年的理論矛盾，要改變政策反反覆覆的狀況，應該認眞考慮一下王希哲的意見：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民主的方向。

不要再抽象地議論民主和集中的相互關係了。政治民主化是四人幫事件後人民的强烈要求。中共應該研究具體的民主問題：中國的民主生活實際上是怎樣一種狀況？存在着怎樣的問題？應該怎樣從理論上加以明確？怎樣從制度上盡可能將不民主的因素消滅？怎樣使人民有權干預領導幹部濫用特權？怎樣使人民有越來越多的表達意見和當家作主的權利？只有社會不斷朝着這個方向前進，人民和幹部才會激發出積極性，才覺得有奔頭，才會有事業心和責任感去從事建設，促進物質文明的進步，並在不斷增厚的物質基礎上，越來越接近於成爲「眞正的人」和「自由的人」。

一九八〇年七月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在美東國是研討營上的談話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一日，筆者參加了在美國新澤西洲 Fairview Lake 舉行的國是研討營。參加研討營的，大部分是十年前活躍於保釣運動而目前居住在美國東部的知識分子，約六十人左右。本文是根據筆者當晚的發言稿整理寫成的。）

很高興能參加這次的研討營。雖然我只能在這兒停留一晚，但在這短短的幾個小時內，可以和許多老朋友會面，並就國是問題交換意見，是相當難得的。

我離開香港已經一個多月了。有一個月的時間在愛荷華，那裏不像香港，並沒有那麼多的有關中國問題的資料報刊可供閱讀。而正巧在這段期間，中共召開了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決定。所以，今天由我來談國是問題，具體而微的討論可能有點脫節了，就談一點感想吧。

今天，在座的許多人，都是從一九七〇年底就參加保釣運動的熱忱、愛國、有理想的朋友。

保釣運動至今已十周年了。正如在中國大陸，許多人在各次政治運動中歷遍滄桑而自嘲地把自己稱爲「運動健將」一樣，在座的許多「運動健將」也可說是歷盡滄桑。不少人作出了許多個人的犧牲，最後又回到曾經被自己否定過的人生道路上來。更有許多在保釣運動前列的朋友，由於明顯的理由，不再願意參加這一類的國是討論，甚至沒有接到學辦這次研討營的通知，這是很令人惋惜的事。

運動已經死亡了

我不是一個直接參與在北美的保釣運動的人。但在香港的公開發行的刊物中，《七十年代》最早報道和支持一九七〇年末興起的保釣運動。我們的刊物那時正處於開創的時期，可謂應「運」（動）而生。作爲《七十年代》的編輯，我從反映保釣運動開始，觀察和體驗了這十年來海外愛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現在正值保釣運動十周年的時候，如果我們問一下：「釣魚台今天怎樣了？」誰願意回答這個問題？誰能夠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正視現實的話，那麼讓我們拿出勇氣來承認，從釣運到統運，這個海外愛國知識分子的運動早已分裂，並且死亡了。我很佩服今天還有這樣的熱忱去學辦這次活動的朋友，但爲什麼在你們的邀請函中，還要把邀請對象定爲「與運動有關人士」，以及定明「不邀請與運動無關人士」呢？也許你們有很好的理由，但在我看來，運動是已經死亡了。我不是放悲觀論調，不是潑冷水，而是認爲我們應該正視事實。承認運動已

經死亡，也許我們可以找到某一種新的開始。

運動是怎麼死亡的？大家比我了解得更清楚。一位曾經在釣運早期起過積極作用而沒有來參加這次研討營的朋友尖刻地對我說：「運動因國民黨而興起，因共產黨而沉寂。」我想，在座各位即使不完全同意這句話，至少也可以了解這位朋友爲什麼會這麼說。釣運的主力，是台灣出來的留學生，由於國民黨政府在對日交涉中所表現的軟弱態度，令留學生失望，因而興起了保釣運動；繼而，由於中共在國際上的地位，中美關係的突破，世界性的中國熱，西方反越戰運動及左翼運動的影響，以及中共對文革的宣傳，使許多人從國民黨的反感而轉向對中共的認同。釣運和統運，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由於國民黨的政策錯誤而激發的。至於運動的沉寂，則不容否認是由於中共內部的路綫反覆和令人失望的政績所導致，其中還包括了中共某些駐外人員對運動進行了脫離實際的干預和領導，使運動產生分裂。因此，運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因中共的錯誤而沉寂。

今天，我相信國共兩黨都在調整它們的內外政策。而我們這些經歷過保釣運動的朋友，在運動十周年的時候，是否能夠擺脫或憤懣、或落寞的心情，對過去、現在和將來作一番冷靜的思考呢？

在這裏，我願意以一個非直接參與運動的在香港的知識分子，試提出一點意見，供大家討論和批評。

重新檢討認同運動

我認爲由保釣運動而引發的對中共的認同，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回顧過去的認同，基本上是一種感情的投入，其中狹隘的民族主義感情佔了相當大的因素。海外的華人要尋根，要認同，這種認同首先是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在對中華民族的一個政權失望之餘，即以感情投向另一政權。這過程的確較爲缺乏理智認識的基礎。這種認同有多少類似認親戚，認父母子女，是血緣關係的，無法選擇的。產生這種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前面說過的對一個政權的失望，是國民黨反共宣傳的失敗；二是正巧碰上當時的國際形勢和西方左翼思潮的影響；三是當時中共內部的問題和人民的不滿還沒有演至後來那麼複雜和激烈；四是中共接待海外華人的刻意安排、以至弄虛作假的參觀而產生的誤導作用；五是不少人在隔絕了幾十年之後回國重見親人，出來後講話、寫文章不得不考慮親人的處境；六是有些人還可能牽涉到一些實際利益……。這多方面的原因，使認同運動從一開始就帶有不理智的成份。我們當中不少人把祖國、母親、人民、土地、河山、民族、連同政權、政黨、當權者、領袖以及政策混和在一起，作爲一個整體去認同了。我們對這一整體中的各個成份沒有區分，對各個成份中的是非、眞僞、優劣也缺少辨別。即以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來說，它的弱點就很少人去分析和論說。總的來說，如果我們檢討認同運動的話，我們不能否認我們當中許多人的認同是缺乏深入的、理智的認識作基礎的。

今天，許多在過去積極認同的人覺得受騙了。我們開始對當年認同的對象——中共政權提出了不少批評。批評當然是有助於進步的。但是，有不少人對中共的批評仍然沒有以深入的理智的認識作基礎，而往往只是流於感情化的發牢騷。了解到過去我們當中不少人所作的犧牲，了解到過去不少人付出了感情所受到的愚弄，應該說，發發牢騷自然是無可厚非的。但如果我們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放在發牢騷上面，那就是很大的浪費。我自己也有不少牢騷，也發過許多牢騷，但後來，我覺得我應該抽出部分發牢騷的精力和時間，去嘗試重新認識中國。

我想，我們今天，應該是從認同走向重新認識中國的階段。

重新認識中國

重新認識中國，仍然需要感情的投入，要不然，我們爲什麼不提出重新認識以色列、土耳其或者烏干達呢？當然，我們也需要認識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尤其是我們目前所居住的國家，但那是僅僅屬於知識範圍的事，而我們提出的重新認識中國，是在檢討過去感情認同的基礎上的理性認識，是有可能在深入認識之後有所行動的，甚至有可能達至健康的、合理的新的認同的。

從檢討過去認同的缺點出發，我們對中國的重新認識，必須排除狹隘的民族主義，因爲這樣對中國和對我們自己都沒有好處。

重新認識中國，尤其應該强調理性的認識。我們要有否定自己過去的錯誤的勇氣，要袪除家

醜不可外揚的心理，不怕自己作爲一個中國人而面目無光。

重新認識中國，不能像過去那樣，把祖國、民族、母親、人民、土地、山河、政權、政黨、領袖、主義等等混和起來，而應該在這許多概念中找出一個主體，這個主體就是中國的人民。我覺得我們應該以關心中國人民的命運出發，以事實爲主，去認眞探討與中國人民的命運有關的各項問題。我們祖國的河山誠然壯麗，但可耕地太少，於民生不利。即使在祖國河山這個較少爭議的問題上，我們也應以人民爲主體去重新認識。

從感情上說，去認識清楚中國存在的事實，是不大好過的。中國今天的龐大的人口，低落的生產力，由於長期以來的體制問題所造成的人的惰性，民心的渙散，從黨政機構到各個經濟單位的官僚主義作風、行政效率低落、管理的因循苟且，等等。對這種種事實認識得越清楚，就越使人洩氣，甚至有人產生無可救藥之感。有些事實說來眞是令人非常痛心。比如我有一個朋友，是幾年前從大陸偸渡到香港來的，今天，他沒有做反對中國的事，甚至在感情上還是相當關心中國的進步的。但有一天，他對我說及他當年偸渡到香港的心情，當他翻山越嶺歷盡艱苦還沒有跑到邊界的時候，他萌生了一種其後使他想起來都不免自責的念頭，他當時想：爲什麼當年滿清政府不更腐敗一些，把更多的土地割給英國呢？這樣他不是可以更早逃到邊界嗎？今天我講到這種想法，自然可被認作是「漢奸言論」。但設身處地的想一想，他當時有這種想法又是很自然的。試把這種使人痛心的想法引伸一下，魯迅先生當年寫了許多針砭時弊的文章，除了他的硬骨頭之外，

我們也不能否認一個事實，就是他的那些文章多是在上海的租界裏寫的。再引伸到我們自己，我們今天在這裏討論國是問題是一個方向，如果我們的討論是在北京或者台北學行，我們的討論就是不同的方向了，我們不能不謹愼得多了。我再引伸一下我所辦的刊物《七十年代》，今天這份刊物能夠對海峽兩岸的政權作一些批評，盡一點言責，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這份刊物是在英國人統治的香港辦的。如果現在要我把這份刊物搬到北京或台北去辦，我很懷疑自己有沒有劉賓雁、王希哲、王拓這些人那樣的道德勇氣。

再擧一個令人痛心的例子。這是中國作家王蒙先生當作笑話告訴我的。他說另一位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高曉聲，被迫在農村過了二十年艱苦的歲月，完全沒有機會發表自己的作品。當他前年得到平反，復出寫作時，有一次在一個座談會上他不知講了一句什麼話，有人取笑他說的那句話是「阿Q精神」，這位受壓了二十年的作家突然情緒激動地說：「二十年來，我要是沒有一點阿Q精神，能活到今天嗎？」王蒙先生說着這個笑話，我却笑不出來。我記得在十年前，保釣運動開始前，哈佛的一羣留學生最先發起對魯迅的討論，因而帶來留學生運動的覺醒。當時他們重點批評的，就是阿Q精神。這個討論曾發表在早期的《七十年代》月刊上。想不到六十年前魯迅批判的這種民族劣根性，十年前留學生通過批判而帶來覺醒的這種民族劣根性，在某種時空中（也許就在十年前留學生討論魯迅的同一個時間），竟成爲能夠支持一個人活下去的正面因素。

這些痛心的事，都是事實。我們痛苦地承認它們好呢，還是自欺欺人地無視它們好呢？我們要重新認識中國，我們還是承認它們吧。

中國未來的可塑性

重新認識中國，不是現在才開始的，其實我們當中許多人已在這麼做了。沒有參加這次研討營的不少朋友也在這麼做了。有的朋友從關心中國的現狀與前途出發，對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歐洲共產主義、蘇聯模式的經濟結構、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中國專制主義的傳統，以至更爲具體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問題和科學發展問題、教育問題，作了相當深入細緻的研究。爲什麼這些關心國是的朋友願意花這麼多時間從事這樣的研究呢？一個還沒有被公開宣示出來的理由，就是要重新認識中國。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並不成功，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也沒有什麼顯著成功的例子。照中共宣傳機構的講法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爲什麼社會主義還在開創的階級，優越性就沒有發揮出來，而某種劣根性和致命傷却暴露出來了呢？我們知道，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現，總是最先顯出它的生命力和優越性的，而到了老化的階段，才顯出它的腐朽性。世界上許多國家、過去的各種社會制度，以至一家普通的企業，大都經歷着新生——成熟——腐化這樣的演變過程。新生事物有弱點，但總是生機勃發，不會有老衰腐敗的迹象的。唯獨社會主義却在它開創時期的這幾十年就顯出了它的腐敗迹象。這是在重新認識中國

的時候首先要面臨的問題。我們看到，這種對社會主義重新認識的活動，在中國大陸也開始蓬勃了。在中國大陸的學術刊物中，大量地討論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新任總理的趙紫陽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原則只有兩條，一是以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作主體（並不排除作爲補充形式的個體經濟），二是按勞分配。在最近召開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又提出了「民主管理」這一條作爲社會主義經濟應有（而不是已具有）的特點。過去什麼「抓革命，促生產」，「以階級鬥爭爲綱」、「割私有制尾巴」、「一大二公」、甚至「向公有制過渡」、「共產主義風格」都不提了。就政制方面而言，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也批評了現存的經濟管理體制和幹部體制，批評了政府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作風，中共幹部對政制中的嚴重問題在公開和私下的談話中都毫不隱諱。從學術的角度吳大焜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是東方專制主義的根源這個命題，以檢討中國官僚政治的歷史因素。王希哲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復興運動，要求全面繼承馬克思主義的合理部分，作家劉賓雁則以具體的文學作品對社會進行了嚴肅而深刻的解剖。此外，甚至也有人提出對列寧的建黨學說需要重新認識。

在中國大陸，對中國重新認識的活動基本上未能脫離馬列主義的框架。儘管其中有部分議論是假馬列之名而行非馬列之實的。但是，如果我們細察一下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們會發現在他們的卷帙浩繁的文集中，主要的貢獻是在對當時資本主義的解剖方面；至於社會主義的理論，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以後的政經模式，馬克思、恩格斯只在四、五本著作中提到，而且

並不完全。在馬、恩生活的時代裏，他們怎可能預知未來社會的種種細節呢？但是，列寧和斯大林出於政權的需要，就偏偏取用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這一個不成熟的環節。正面的解釋，可以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與蘇俄革命實踐的結合，如果從反面作解釋，我們也可以說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採取了取其所需的態度。同樣地，對毛澤東思想也可以作這樣的正面和反面的解釋。

海內外對中國的這種重新認識，或者是對社會主義的重新檢討，不管是否脫離馬列主義的框架，但至少已大量地脫離過去幾十年來對馬列主義的欽定解釋的框架了。無論如何，這種探討是十分有益的。在飽經憂患之後，中國的未來有幅度甚大的可塑性。對中國的重新認識，如果沒有受到官僚政治的干預，是很有機會在目前這個使人憂慮的局面中探索出一個有希望的前途的。

保持審慎的、持久的認識

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包括在座中的許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過去向中國認同的過程中，不可否認曾受到某種程度的中共官僚政治的影響。今天，這種干預和影響已經減少了，這正是海外愛國知識分子發揮良知與獨立思考的好時機，在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中，只要我們以關心中國人民的命運爲主體，勇於否定自己過去認識的偏頗，肯在某種程度上拋開個人的利害得失，認眞研究一些問題，以在座諸位的學歷、見識、智慧，是應該可以說些中肯的話，做些該做而又可以做

的事的。如果不是重新認識中國，我們說的話、做的事，也許會使中共某些人喜歡，但對中國人民來說，說不定是幫了倒忙。例如《七十年代》過去刊登過的一些文章，使中共的某些領導人高興，但也爲當時力圖粉飾文革亂象的四人幫控制下的中共宣傳機構所利用。今天，我痛心地面對自己的過去，是因爲我更關心中國人民的命運與前途。又例如，如果不是重新認識中國，不知道中國科學的實況，也許會向中國提出一些不切急需的科技計劃，而這計劃不幸又被缺乏知識、好大喜功的某位中共領導人採用了，那就會造成對中國人民辛苦積聚的大量資財的耗費。又例如，如果不是重新認識中國，不明白中國的社會實況和文藝實況，也許會提出一些什麼永恆性、純藝術、表現美好和善良等等看似有理的理論，扭轉了前些時候一些作家急切要求反映人民的眞正處境的路向，實際上幫助了仍要粉飾太平的文藝黨官的意見，打擊了一些正直和有勇氣的作家。

總之，海外愛國知識分子，只要重新認識中國，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當然，我們的年歲增長了，吸取過去的經驗，我們應該抱較爲審愼的態度。立足於中國還要經歷多番曲折的認識基礎上，不要寄太大的希望。這樣或許我們對中國的感情，繼續認識的願望，可以持久些。

不久前召開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的確較之中共建國以來的歷次會議都有進步。會議顯示中共開始走向黨政分離，有改革政經體制和克服官僚主義的願望，國務院和人大常委的和平而重要的權力轉移顯露了人事制度變革的曙光，經濟結構進行改革和提出較爲實際的、以照顧民生爲目的的低成長的經濟指標，還有人大代表質詢國務院的部長以及將代表們的意見刊登在報章上，這

些向現代化和民主化邁進的做法，是值得高興的。然而，一位剛從北京回來的朋友却對我說，老百姓對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普遍表現出一種冷漠的態度，不像預期中那麼興奮。如果我們把這次的變化，與四年前粉碎四人幫的變化比較，四年前的變化雖然使人震驚，但對社會、對政經體制的影響，却比不上這一次那麼巨大和深刻。然而，四年前四人幫倒台時人民表現出由衷的高興，而這次的政經體制的改變却引不起中國大陸人民的普遍的關心，這是什麼原故呢？

我想，其中一個因素是天安門事件表達了人民的願望，人民樂於見到人民民主的力量促成了變革。至於這次的改革，儘管步驟很快，儘管也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意願。但是，變革是自上而下的。在變革過程中並沒有看到民主的力量在起作用。

其次，我想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對各級領導幹部，都有不同程度的不信任之感。幹部問題確實是嚴重的。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華國鋒代表國務院所作的報告，五個要點中有四個要點是針對幹部問題的。要求從體制、作風、人事上進行改革。

然而，儘管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方案，但並沒有提出能保證方案得以推行的具體措施和步驟，對幹部「特殊化」問題也過份强調道德約束，而沒有鐵腕式的法制約束的具體規定。依靠沒有制衡——至少是制衡力量微不足道——的官僚體制，去進行幹部問題的改革，實在很難「大見成效」。《七十年代》十月號刊登的王希哲《就劉青審判案給五屆人大代表同志們的信》①，就可以使我們看到在中國，民主法治的道路還有多麼長。

如果我們冷靜地重新認識中國，我們還是承認這些現實吧，承認中國的民主與法治的道路還很長吧，承認目前提出的種種政經改革從提出來到成爲事實還有許多曲折吧。不要再爲了顧全中國人的面子而講假話了。也不要寄太大希望了。只有在重新認識中國的基礎上，我們或許才能夠盡點滴的力量，以幫助中國人民改善他們的處境，以推動中國的進步。不要說因爲我們沒有參與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我們就不能提出批評和建議。我們身在海外，儘管力量微薄，但也有我們的有利條件。我們是可以比發牢騷多做一些事的。

我們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們每一個人也只能在自己工作的範圍內，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幫助中國進步的過程中，即使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和職業範圍內，我們做不到的事也遠比我們做得到的事情多。這一點，我們也承認了吧。

我的講話顯然沒有給大家帶來興奮。如果有人認爲我太低調了，那麼就批評吧。我今天的想法是，寧可調子低一點，或許可以細水長流，使我們在重新認識中國的道路上走得長一點，尚存的一點信心也可以持續得久一些。我亟希望，經過重新認識，達到眞正的認同——理智、樂觀、積極、自信的認同。但我不知道在哪一天。

注①：《七十年代》八〇年十月號發表了中國民主運動理論家王希哲的一封公開信，揭露民刊《四五論壇》的編輯劉青，自一九七九年底被捕後，未經法庭審訊而被公安局判處了三年「勞動教養」，嚴重違反中共公佈未久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

愛國主義的呼喚

近月來（指一九八一年三、四月間），中共不斷向人民發出愛國主義的呼喚，試圖振奮起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掃除較爲普遍存在的消極情緒，從而提高人民的工作積極性。但另一方面，在行動上，對一些眞正關心中國的命運與前途的青年民主派則大施鎮壓，文藝政策顯著收緊，白樺、王若望、沙葉新先後受到批評，而以王希哲的被捕和《解放軍報》批評白樺所用的粗暴的語言尤其引起海內外的關注。言論上的愛國團結的呼籲，與行爲上的黨同伐異的做法，不能不使人感到寒心。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的《人民日報》聲稱：「一個新的愛國主義熱潮正在興起。」但與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民有所接觸的人士都會感到，事實上今天的中國，愛國主義精神正在失落，正急待重振。中共當局近月來關於愛國主義的呼籲，正是這種精神趨於失落和需要重振的表現。可惜的是，中共的言論與行爲出現了差距。而行爲本身，恰恰是對於在人民中間趨於失落的愛國主

義精神，作進一步的打擊。這是一個令人感到憂慮的局勢。

理智地認識愛國主義

在中共報章上，這一兩個月來，對愛國主義的宣傳可謂不遺餘力。三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的長篇文章《愛國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精神力量》。「五四」前後，又通過領導人的講話，各報的評論文章，呼籲「發揚愛國傳統，立志振興中華」。此外，還有不少文章，歌頌祖國的美好，記述一些出國留學的人去而復回，稱讚個別出國搞研究的科學家毫不猶豫地放棄在外國的地位和生活條件，如期回國。廣東省的領導人則號召這幾年外流的知識分子回歸，再爲祖國服務。

對於中共提倡愛國主義精神，筆者是十分贊同的。過去老是强調共產主義精神，要中國老百姓去「爲全人類服務」，已被歷史證明完全脫離了實際。正如《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所說的，一個連自己的祖國都不懂得敬愛的人，難道眞的能夠「爲全人類服務」嗎？當前，大陸上許多青年人都感到理想破滅，感到失落傍徨，或者只是一味追求物質生活的時候，提出「發揚愛國傳統，立志振興中華」畢竟是有意義的事。從血緣出發，從鄉土出發，從文化傳統出發，愛國是所有中國人都可以找到的共同點。

然而，愛國主義精神，不應只是作感情的投入，而且應强調理性的認識。近來中共報刊談祖

國的文章，有的爲了激發起讀者的愛國感情，甚至達到不理智的程度。例如引用「好也罷，壞也罷，她是我的親娘……」這句話，並加以肯定和歌頌，就不是一種理智的態度。在宣傳中國的土地山河、歷史文化、傑出人物這些方面，也是感情用事的成份居多，較少出於對中國的物產地貌、傳統文化和歷史人物的眞正了解認識。例如上述的《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列舉中國歷代的傑出人物，連成吉思汗這樣的人物也當成了中國的光榮，就實在大可不必。成吉思汗時代，蒙古尚未歸入中國版圖，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成吉思汗是一個外來的侵略者。即使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成吉思汗這樣的侵略者也不是民族的光榮。難道德國人應把希特勒作爲德國民族的光榮嗎？再說，把成吉思汗和抗元的文天祥並列，都當作中華民族的光榮，這是否有點滑稽呢？

眞正的愛國主義，應以淸醒的現實主義爲基礎，這樣才能發揚民族中好的方面，也能針對各種弊端。魯迅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同時又是最能夠無情地揭發中國民族的劣根性的作家。他指斥當時的國粹主義者，把凡是中國特有的東西都當作寶貝。他比喩說，好比一個人臉上長了個瘡，這可以說是與別不同，是他臉上的「粹」了。但究竟是希望把瘡治好，沒有了這個「粹」，變得與別人一樣好呢，還是硬要歌頌這個瘡「紅腫之處，艷若桃李，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好呢？

因此，只有感情的投入，陶醉於一些虛假的光榮，不是眞正的愛國主義者。出於一時政策的需要，非理智地宣揚狹隘的民族主義，好比是一些功夫電影中把日本人、西德人拿來拳打腳踢一

番似的，以此來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決不是健康的現象。必須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有理性的認識，對中國的土地、人民和文化有眞正的了解，愛護和發揚中國的長處，也正視她的短處，才能促使中國進步，才能致力於中國的現在和未來，也才是眞正的愛國主義者。「好也罷，壞也罷」的態度，固然熱情充沛，但對中國是沒有好處的。至於無視三十一年來令大多數人民不滿的政績，硬說是巨大成就，更不是國家之福。前幾個月，中共的宣傳機構比較實事求是，多次談到了對人民「欠賬」的問題，才是正視現實，有助於解決問題和促使中國進步的態度。

正視愛國主義失落的現實

在今天的中國，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不是靠一味稱頌祖國的偉大，硬說「一個新的愛國主義熱潮正在興起」就可以達到的。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必須正視這些年來愛國主義精神趨於失落的現實。

《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也多少接觸到人民中間存在着的愛國主義的幾個思想問題，例如：「社會主義還能不能救中國？」「祖國落後，有什麼可愛？」「要向外國學習，還要不要民族自尊心？」「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但可惜，對這幾個現實思想問題的回答，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却沒有多少說服力，主要的問題是，這篇文章在迴避現實，沒有設身處地的爲有這些疑問的人們去想一想。於是，問題是提出來了，答案却是蒼白無力的，其效果可能是

使人們對中共這種不能實事求是的作風更爲不滿。

在這幾個問題中，最使人思想受到震撼的就是：「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這是針對白樺在他的劇本《苦戀》中的一句對話而提出來的批評。《苦戀》寫一個從國外回歸的愛國畫家，文革時受到種種悲慘的對待，其後他的女兒愛上了一個華僑，要隨這個華僑離開中國；這位畫家出於愛國的感情，力圖阻止女兒出國，這時他的女兒對他說：「爸爸，您愛我們這個國家，苦苦留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就是這句話，先引來了《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批評，繼而四月二十日的《解放軍報》更以頭條發表特約評論員的文章，粗暴指責這個劇本「不僅僅是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甚至到了實際上否定愛國主義的程度。」

《苦戀》中的這句話是否定愛國主義嗎？不。這句話正是從愛國主義出發，正視當前爲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所必須注意的思想問題。

「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這種想法，相信是相當多的人通過切身遭遇所得到的痛苦的結論。是當前中共當局必須正視和加以實事求是地回答的問題。

《苦戀》中的凌晨光的體驗決不是個別的、偶然的。上一期《七十年代》所刊出的《愛國主義者王造時》①，讀後就更使人泫然深思。王造時一生正直愛國，嶔奇磊落，而只是因爲在歷史上做了一件與中共黨的政策步調不那麼一致的事，就被中共排斥，建國後坐上了冷板櫈，五七年更被打成右派，文革時含寃莫白地慘死獄中。說到愛國主義者，王造時可爲表率，但中共怎樣對

待這樣的愛國主義者呢?現實告訴我們的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王造時和不少類似的愛國者的遭遇,向中共當局提出了一個有待回答的問題:你們是怎樣對待愛國主義者的?中共領導人中倘有良心血性的,在這個問題上應如何地反躬自問,內心譴責!怎能冷冷地回答《苦戀》中這個問題是「偏激情緒,錯誤觀點」,甚至說是「否定愛國主義」呢?

這裏,我還可以談談我所見到的一些例子。一九五四年我在香港中學畢業後,同班中約有一半以上的同學都回國升學。當時大家的愛國熱情很高漲,不少人決心為祖國貢獻自己的青春與生命。然而,事隔四分一世紀之後,這些回國升學的同學絕大部分帶着失望、落寞、甚至悲戚的心情,回到香港來了。有一次筆者與這些老同學聚首一堂,聽他們述說這些年的遭遇,共同的結論就是:「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在回國的同學當中,越有才華的遭遇就越難堪。其中他們談到中學時一個資質甚高的同學,在文革中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槍斃了。雖然現在已予平反,但能補救什麼呢?另外一個同學,他與我的關係很深,甚至可以說,在中學時代,是他引導我閱讀社會科學的理論的。一九五四年回國升大學以後,他一直是品學兼優的學生,直至一九五七年在反右運動時,他因為主持一次討論會,把當時報上發表的所謂「右派言論」提出來給同學們分析討論,結果就莫名其妙地把他打成右派,大學畢業後下放農村二十多年。他的父親在美國開洗衣店,早在十多年前已為他辦好了移民美國的手續,但是,他為了愛國,耐心地等待政策的落實,總希望有一天能以他在大學中所學到的知識教育中國的下一代。到四人幫被打倒了,他又滿懷希

望地等了兩年，然而政策還是沒有落實到他身上。於是他申請出國了。而在這時候——一九七九年初，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這時他還想爭取最後一次機會，在得到了出國證以後，他又再試探能否給他一個在中學教書的工作，以便他能實現以自己所長爲祖國人民服務的志願。然而，仍舊不得要領。終於他帶着滿頭的白髮，虛度了二十五年的人生最好的歲月，滿懷身心的創傷，離開了中國。今天，他在紐約唐人街的餐館從事力不能勝的勞動，不懂英語，與美國社會隔離。也許他還在懷念着祖國，然而，大約已到「哀莫大於心死」的程度了。

懷有「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這種情緒的，當然不僅是從國外回歸的知識分子。老一輩的、曾經爲建立民主新中國出過不少力、甚至作出不少犧牲的愛國者，如王造時這一類人；五十年代在中國大陸完成學業投身於新生祖國的事業中的今天的中年人；六十年代投身於文化大革命的熱潮中，其後響應號召到農村的廣闊天地期待着大有作爲的知識青年；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有上述情緒。

甚至在海外，許多從事愛國運動的人，或者從事了幾十年愛國工作的人，也會在一些事情上體會到「兔死狗烹」的味道。

不能否認，「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這種情緒，並不是健康的。眞正的愛國主義者，爲尋求祖國的進步，可以作出各種各樣的犧牲，難道還需要祖國給我們什麼酬報我才去愛國嗎？然而，又必須承認，這種情緒是客觀存在的，而且相當普遍地存在。中共應該從實際出發，

承認許多人有這種情緒是可以理解的；然後通過實際的行動，而不是教訓式的文字，去着手消除這種不健康情緒。至少不要繼續做一些徒然加深這種情緒的事情。

愛國和愛黨

爲什麼許多人有「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這種情緒？這就要從對「祖國」這個概念的認識說起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號《七十年代》的「社論」說：「我們所說的中國，包括大陸和台灣的遼闊的土地，美麗的山河，悠久的文化，九億七千萬善良的人民；我們說到中國，尤其會想起數千年來祖先們的耕耘，現代人民的奮鬥，還有子子孫孫的未來。我們所說的對中國有利，是指祖輩父輩所期待，今天的人民所爭取，未來的一代所應享有的幸福和快樂。」

如果我們所說的祖國是基於上述的理解，那麼就只有我愛不愛祖國的問題，而沒有祖國愛不愛我的問題。因爲正如徐復觀教授所說：「黨有功有過，國無功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②

出現「祖國愛不愛我」的問題，是因爲中共長期以來把黨放在國家之上。所謂愛國，就是指愛執政黨所領導的國家機器。那麼，王造時，《苦戀》中的凌晨光，我的許多回國升學的老同學，

還有中國大陸的許多知識分子、老百姓，他們曾經如此熱烈地去愛中共建立的國家機器，擁護新中國政權，却受到了悲慘的待遇。於是，他們才會有「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這種慨嘆。

直至現在，中共一方面宣傳愛國主義，一方面也同時繼續强調愛國與愛黨不可分，把是否擁護現政權的一切做法看成是否愛國的標準。五月四日，《中國青年報》爲紀念五四運動六十二周年所發表的社論，題目就是《牢記兩個偉大的歷史結論》，是哪兩個「歷史結論」呢？一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們事業的勝利保證」，二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是不是共產黨的領導、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就能帶來國家富强、人民康樂、國民經濟水平和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呢？過去三十年的政績已作出了事實的回答，其實是無需爭持的了。如果過去的國家機器是使人民不斷得到幸福和康樂的話，那麼也不需要長篇大論地去反駁「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這種思想了。

現在我們來看看《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是怎樣回答「社會主義還能不能救中國」和「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這兩個問題吧。

「『社會主義還能不能救中國？』有一些人有懷疑。由於錯誤和挫折所造成的困難和問題一時看來是如此之多，因而一時有懷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眞理只有一個。歷史的客觀眞理是：只有社會主義能救中國。中國人民從一百多年來特別是五四運動六十年來的切身經驗中，得出了這樣

一條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建國以來的巨大成就，難道不是已經初步地但又是有力地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嗎！誠然，我們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和弊端，有待我們有步驟地加以改革；但是必須指出，它們並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恰恰相反，它們是由於種種違反社會主義本性的因素，給社會主義帶來歪曲和破壞所造成的。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作爲最先進階級的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證我們能夠用自己的力量來糾正自己的錯誤。這也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現。……」

「『不是我不愛祖國，是祖國不愛我。』這是一種偏激情緒，錯誤觀點。這裏首先必須區別舊時代的反動的國家機器和社會主義時代的人民的國家機器。……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掌握在人民手裏，它是屬於人民和保護人民的，並且是人民在革命中用鮮血和生命贏得的最主要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熱愛祖國，就包括熱愛人民自己的國家機器，並且爲它的不斷完善而努力奮鬥。當然，必須承認，在我們國家走過的曲折歷史道路上，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嚴重罪行，曾經使人民遭到了不應有的嚴重損害。但是同時必須看到，這場災難，是在一種非常情況下發生的，並且是由我們黨和國家各級機關的廣大幹部（特別是各級領導骨幹即所謂『當權派』），同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一起承受的。公道地說，在這場災難中遭受最沉重打擊和付出最大犧牲的，首先是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骨幹。……」

在這兩段回答中，有不少可以討論的地方。

首先，作爲「只有一個」的「眞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其實是未經實踐充分檢驗的。在中共建國前，社會主義只是一種理想，尚未有實行，因此它是否能救中國尚待驗證。在中共建國後，制度上又出現了許多明顯的弊端，以至帶來嚴重的人爲的災難。現在說這些弊端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而恰恰是歪曲和破壞了社會主義制度所造成的，那麼未被歪曲和破壞的社會主義制度究竟是怎樣的呢？難道中共建國後所實行的制度不是基本上一脈相承的嗎？難道造成毛澤東的專斷獨裁，造成林彪、四人幫的跋扈，只是歷史的偶然，而不是制度不健全才產生的嗎？《人民日報》四月廿四日發表的另一篇特約評論員的文章說：「社會主義是個新生事物，沒有一個完美的模式，需要我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在實踐中去創造。我們在實踐中有過成功的經驗，也有過失敗的經驗。」既然社會主義沒有一個完美的模式，怎麼能把一切做得好的都算作社會主義，而一切做得壞的都說成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和破壞呢？

其次，中共建國初期，接管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糾正國民黨所犯下的大錯誤，可以說是表現出了政權的生命力。但其後自己犯了瀰天大錯，現在說「用自己的力量來糾正自己的錯誤」，這也算是什麼强大的生命力嗎？自己摔了跤自己爬起來，對成年人來說是沒有什麼可驕傲的。在人民的苦難面前，中共應更加深刻地承認、檢討自己犯錯誤的原因，檢討社會主義制度在實現過程中的重大問題，而不必急於去自我誇耀還在進行中的未完成的糾正錯誤的能力。

其三，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應該是屬於人民和保護人民的；然而，從實踐上來

說，過去三十一年來，中共所執掌的國家機器，怎樣體現它是屬於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呢？對於千千萬萬的王造時、凌晨光這一類的知識分子，過去的國家機器是怎樣保護他們的？對於被强迫搞大躍進，搞公社化，搞移山造田，搞大煉鋼鐵，被强迫「割私有制尾巴」的農民來說，國家機器是怎樣代表他們和保護他們的？對於許多在五十年代時把熱愛國家機器包括在熱愛祖國這個概念中的人們，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倘仍要他們熱愛這個國家機器，那就只能通過事實而不是通過任何雄辯。否則，他們就只有不愛祖國了。

其四，公道地說，在文革期間，各級領導骨幹（「當權派」）所受的打擊誠然比一般老百姓更沉重；然而更公道地說，這些「當權派」所受打擊的時間遠較一般老百姓所受的災害爲短。老百姓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就長期處於貧困、苦難的境地，而現在他們的處境也沒有太大的改善；「當權派」不過是文革期間受到打擊，文革前和文革後，他們都處於比老百姓優裕得多的地位。如果是一個眞正屬於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國家機器，在國家經過一段長時期的苦難以後，它的當權者應該首先對人民的遭遇和處境更加關切和痛心，而不是念念不忘自己所受的打擊，更不應該爲過去一段時間自己所受的打擊尋求物質的補償。

其五，黃克誠在評價毛澤東的文章中說，「如果把建國以來我們黨所曾犯的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他一個人承担責任，這樣做不符合歷史事實。小平同志講得對，包括他自己在內，我們這些老同志對許多錯誤都是有責任的。……在中央來說，只要是開中央全會舉手通過決議的事

情，如果錯了，中央都應該來承担責任。」這也就是說，三十一年來所經歷的苦難，中共黨和各級領導幹部是有責任的，而老百姓是沒有責任的。怎能因爲這些領導幹部在文革期間吃了苦頭，就爲他們開脫責任，甚至把他們的苦難强調得比老百姓的苦難還重呢？

改變「黨同伐異」的基本態度

從上面引述的文章來看，中共今天雖然一再强調黨政分離，强調要改變黨的一元化領導，呼籲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但它的基本態度，仍然是把黨放在國之上，黨的利益、黨性(或叫黨派性)仍然高於國家的利益和愛國主義精神。當然，在理論上，中共會說黨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根據過去的經驗，黨的決策在許多時候並不符合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在這種情形出現的時候，中共各級的領導人，多以黨的一時的政策、決定爲是非的取捨標準。判斷一個人的是否愛國，不是以這個人的基本態度爲依據，而是以他的一時一事是否符合中共黨的方針、政策、步驟爲依據。王造時在中國人民浴血抗戰時，起草了一封信對斯大林簽訂蘇日友好條約表示「遺憾」，就因爲這違反了當時中共的親蘇政策，於是中共建國後王造時一直受到冷遇。但若不從愛黨的角度、只從愛國的角度去看，王造時對蘇日友好條約表示「遺憾」就完全是愛國的行動。白樺寫的《苦戀》，我讀完整個劇本後，不能不被劇中主人公的愛國主義感情所打動，但因爲劇中有懷疑黨的領導的傾向，對文革的「造神」運動的諷刺妨碍了當前要强調毛澤東

功大於過黨的政策，於是被攻擊爲「否定愛國主義」。五月十三日，中國新聞社鑑於海外對白樺事件的反應太强烈，特從武漢發出一個訪問白樺的專電，其中直接引述白樺的談話共有三段，第一段是否認他被開除黨籍、軍籍和被打成右派的謠傳，其餘兩段是：「我非常感激黨組織對我的關心和愛護。」以及說到他又寫成了兩個劇本，「這都是與黨組織對我的關心、愛護分不開的。」一位作家從事寫作，需要一再感激黨組織的愛護、關心，讀後眞是使人感到不是滋味。是不是表示黨組織終於高抬貴手，沒有把這位寫作調子與黨不大合拍的作家開除黨籍、軍籍和打成右派呢？在中新社報道的白樺的談話中，已可以見到黨組織的君臨一切的威勢了。

英國廣播公司拍攝的電視片集《中國的大衆媒介》中出現的中國青年人，都是一副無所事事、失望頹唐、表情呆滯的面孔；海外人士接觸到的從中國出來的留學生、研究生和其他年輕人，不少都是關心超級市場多於關心圖書館的；海外華僑回國所接觸到的親友中的年輕人，不少是除了物質生活不再想其他的事；潘曉的信和有關討論③，反映了多少青年人的理想破滅、對過去的信仰產生懷疑、對人生「看透」的悲哀。根據人口統計，由於五十年代初的出生高峯，今天中國人口中百分之六十三點四是二十九歲以下的年輕人。中國的未來是屬於這些人的。從現實接觸中所見到的青年人的精神面貌，能不使人對中國的前途感到憂慮嗎？

然後，我們讀到了王希哲、胡平④這些人的文章。尤其是王希哲的文章，給海外千千萬萬心向中國的朋友帶來了希望。不錯，王希哲的一些意見與中共官方輿論不同。但是，從王希哲的文章，

可以看到中國是有前途的，社會主義也是有前途的，他的一些意見逐漸被中共當權者所接受，也就使海外華人對中國重新燃起信心。

然而，今天，王希哲被捕了。現實政治的發展，似乎重又回到歷史的痛苦軌跡。

中共向人民發出愛國主義的呼喚。大陸人民怎樣回應，尚有待觀察。至於在海外，在愛國運動中受到挫折的人，對中國的現實越來越灰心的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共黨內的改革派身上的人，由於王希哲的文章而使他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重燃信心的人，在我們能夠接受中共的愛國主義的呼喚之前，讓我們也對今天中共的當權者發出一次愛國主義的呼喚吧：

請你們把國家放在黨之上，請你們以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爲重，請你們放棄黨同伐異的作風，請你們珍視和愛護、至少不要打擊那些暫時在某些問題上與你們見解不同的愛國者，請你們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做一個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愛國主義者！

中華民族的兒女有愛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今天許多人不得不做外國人或者出現了所謂「香港人」的心態，是有客觀原因的。中共當權者如能實事求是地深入總結這個歷史原因，那麼，「發揚愛國傳統，立志振興中華」的口號必然會響澈海內外，並爲中國開拓一個朝氣蓬勃的未來！

注：

①：王造時是早年留學美國的學者，二十年代回中國後，即成爲靠近中國共產黨的民主人士。抗戰時在重慶，因當時蘇聯與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起草了一封給斯大林的信「表示遺憾」。

②：徐復觀是前香港新亞研究院教授，著名政論家。上引一段話，是他在接受本人訪問時說的，刊登在《七十年代》八一年五月號。徐先生已於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不幸逝世。

③：一九八〇年五月，北京的《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了一位二十三歲的女工潘曉的來信：《人生的道路啊，怎麼越走越窄……》，這封信觸動了青年人的心弦，引起全國四萬多個青年的回應。

④：胡平，北京大學研究生，一九八〇年自己報名參加北京淀海區人民代表的競選，並發表長篇論文《論這論自由》。

一九八一年六月

王希哲文章爲什麼能引起共鳴？

《李一哲大字報》的主要執筆者王希哲，在一九七八年底平反後，於七九、八〇兩年，以他憑自學而得到的深厚的理論基礎，嘗試全面地、實事求是地、「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地，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進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寫下一篇篇擲地有聲的文章，展示中國可以走而且應該走的社會主義民主的道路。一九八〇年底，他寫了一篇長文：《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八一年一月號轉載後，備受注意。其後《七十年代》八一年四月號又發表了一篇文章《評〈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對王希哲的意見提出了一些批評。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王希哲在廣州被捕。香港大專學生，於一九八一年五月就王希哲被捕事尋訪廣州，並於六月八日，由香港大學學生會、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香港理工學院學生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國是委員會主辦了一次「公開論壇」，題目是「從民運人士被捕看中國的民主與法制」。以下是筆者應邀在這次「公開論壇」上所作的演講。

主席，各位同學，各位朋友：

來參加今天的論壇，討論這樣的題目，眞是有點「於我心有戚戚然」之感。對我來說，王希哲的被捕，比之以前魏京生、傅月華的事件，比之其他民運人士的被捕，無疑更使我震驚。不僅僅是因爲我所編的刊物多次轉載了他的文章——我不知道這會不會成爲他被捕的理由之一，也不是因爲我與他有什麼關係——我從來沒有見過他，而是因爲他的被捕使我增加了對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前景的憂慮。

王希哲不同於蘇聯的「不同政見者」和中國的其他民運人士，那些人多半傾向於西方的自由主義，而王希哲則是一位精研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從《李一哲大字報》開始，以至近年所發表的各篇理論文章，王希哲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來檢討從蘇聯到中共的幾十年政治。對西方的自由主義，他是基本否定的，並一直批判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以此爲出發點，他並不反對、而且提出要實現眞正的「四項原則」，只是對「四項原則」的解釋，特別是對中共的「四項原則」的實踐，他有不同看法。他的每一篇文章，都顯示出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深厚，行文邏輯謹嚴，既從中國的現實出發，又懷有遠大的理想，一股愛國愛民的感情洋溢筆底，引起廣大知識分子的共鳴。

我個人對王希哲的才華和勇氣是佩服的，但我並不是全部同意他的文章的所有觀點。例如他近來最受注意的論文《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就有不少論點是我不能同意的。他把作爲人來說

是相當複雜的毛澤東加以簡單化了。《七十年代》四月號發表一篇畢博先生的文章：《評〈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我比較同意畢博先生的看法。

畢博先生對王希哲的第一點批評意見，是他不同意王希哲否定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只是一個「空前絕後的農民領袖」這種說法。畢博認爲，毛澤東誠然不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也不只是一個農民領袖，一個像朱元璋、李自成或者比他們還要偉大一點的農民起義軍統帥。畢博先生結合時代背景和歷史的發展，雄辯地說明，毛澤東是一個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並在相當程度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農業社會主義義者，只不過，他更多地是從一個農民知識分子的角度來接受和理解馬克思主義吧了。

翻一下毛澤東早年的著作，回顧一下二、三十年代的社會思潮，我們應該承認畢博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二、三十年代，正是十月革命後不久，當時不僅在中國、而且在西方國家，知識分子受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是十分普遍的現象。魯迅在那個年代裏曾寫過大意是這樣的話：現在世界上的知識分子，即使是坐在資產階級的沙龍裏清談的文學家藝術家，極少人是完全不帶點朦朧的社會主義意識的，沒有人會公開說贊成資本家剝削工人，人與人之間不應該有平等，這一類的話。也就是說，在二、三十年代，當社會主義剛剛從理想變爲一個國家（蘇聯）的現實的時候，社會主義對人們、尤其對知識分子是很有吸引力的。經歷過那個年代，或對那個年代有認識的人，即使後來變成頑固地反對社會主義吧，也不能不承認在那時曾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

那麼，社會主義爲什麼吸引人？因爲它强調要把人從封建主義專制和資本主義剝削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因爲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消除人與人的差別，要消除異化，要實現眞正的平等。什麼叫異化？異化就是異己化，就是人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反過來成爲支配人的力量。人創造了貨幣，而人成了金錢的奴隸。人創造了資本，資本反過來壓迫人。人創造了國家機器，而國家機器反過來成爲統治人民的工具。人爲了保護共同利益而組成了社會，但社會却成了人的異己力量；儘管人類在自然科學的領域已經有長足進步，但人類的社會却遠遠未能臻於和諧，人還未能成爲眞正的人，自由的人。社會主義强調要消除這些異化，要重視人的價値，使由人的活動所構成的社會不再成爲束縛人的力量。使人們不須互相爭奪、傾軋、防範，使人們能自然、和諧、平等地生活，成爲眞正的人，自由的人。英國作家菲列克斯．洛林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二年到中國後所發表的觀感文章，題目就是《有自由成爲一個眞正的人》。楊振寧於一九七一年第一次重回中國後，談他的印象，提出最値得中國人自豪的一點就是「精神」。現在我們知道，在那個時期到中國去參觀的外來訪客，他們的節目大都被刻意安排，不能說對他們的觀感沒有誤導作用。但是，從互相競爭、互相傾軋的資本主義社會，到了一個强調「爲人民服務」、强調人的「精神」力量、强調「人的因素」的社會，不能不使一些有基本的平等思想的人感到中國社會對人的價値的重視，而不像西方社會中，人成了金錢的奴隸。

回顧過去，我們許多人那時候爲什麼對中共認同？應該說是同這種社會主義精神有關的。爲

什麼我們相信大寨精神？因爲我們以爲大寨人顯示出「人定勝天」的勇氣和智慧，這是人的價值的表現。爲什麼我們贊同教育革命？因爲我們看到的事例是以啓發式的、聯繫實際的教育方法代替了注入式的、脫離實際的教育方法，因爲我們覺得這是能讓每一個學生充分發展他的智力的辦法，也是重視人的價值的表現。爲什麼我們贊同文革，贊同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因爲我們相信文革的目的是反對官僚特權，是爲了實現眞正的平等，因爲我們相信在每一個人都能不受束縛地發揮他的獨立思考的情形下，多數人是可以信賴的，眞理將在「四大」中越辯越明。爲什麼我們贊成提倡大公無私的精神？因爲我們看到提倡自我中心的、互相傾軋、互相防範的社會把人的本性扭歪了。

誠然，今天已沒有人再相信上面那一套文革的宣傳了。因爲現在已證明在那一套宣傳的背後，是一系列虛假的揑造。但我們仍然不能不承認，在推行那一套東西的時候，不但是用了社會主義的名義，而且就其所追求的目標來說，也不能說它違背社會主義精神的。只不過物極必反，什麼事情推到極端就會變成荒謬。大寨開始時，它所代表的精神是好的，後來要全國各地學大寨，而不顧各地的地理條件之不同，以及爲表現「大寨精神」而不顧實際地搞「西水東調」工程，甚至弄虛作假，就變成荒謬了。大民主的精神是好的，但當多數人受壓制的時候，當權者利用大民主，欺騙和蠱惑羣衆，使羣衆變成了羣氓，於是就走向反面了。「爲人民服務」和「爲公」的精神也是好的，但發展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程度，就變成荒謬了。《禮運‧大同篇》的「天下

爲公」的思想提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有「不獨」二字，即不僅把自己的兒子當兒子，也把別人的兒子當兒子。這已經很難得了。但並沒有說要毫不把自己的兒子當兒子，專門把別人的兒子當兒子。如果人人不把自己的兒子當兒子，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問題留給社會去解決，這樣整個社會就變得反常和荒謬了。

爲什麼社會主義精神會從原來是好的出發點，走向反面變成荒謬呢？我們逐漸發現，從蘇聯到中共在體制方面的等級授職，傳統的專制主義的影響，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列、毛的思想的絕對化，是根本的原因。體制的問題和思想的定於一尊，使人的行爲受到束縛，使人的思想受到禁錮，終於走向社會主義精神的反面——每一個人自己的價値不被重視了，起作用的只是權勢地位和權威思想。人們不是通過民主權利的擴大，逐漸走向「眞正的人」、「自由的人」，而是實際上走向反面，使人更不自由，更受束縛。

四人幫倒台後，幾年的曲折發展，以「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爲號召，否定了過去推行的禍國殃民的政策，但是與此同時，在許多人的心中，是連社會主義精神也否定了。

然後，王希哲的文章在一九七九年再次出現。他重新肯定無產階級專政，肯定社會主義精神，肯定馬克思主義，也肯定黨的領導。只是，他並非像中共報刊某些理論文章那樣，無視現實的問題，一味硬說要堅持四項原則。他正視現實，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在開始時不得不由政黨作爲代表來實行專政，但以後的發展會有兩個方向，一個是黨的專政逐漸走向官僚化，而成爲少數既得利

益者的專政；另一個是黨的專政逐步通過擴大民主權利，提高無產階級的普遍的政治意識，使黨的專政轉向於黨只在思想上領導，而通過民主形式使無產階級全體（或大多數）掌握行政管理權，實現眞正的階級專政。他針對去年一月新華社特約評論員文章所强調的「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從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出發，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旣然是使人從種種束縛中解放出來，成爲「眞正的人」「自由的人」，那麼社會主義民主就應該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他問道，如果民主不是目的，而只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手段的話，那麼是不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可以用民主的手段，也可以用不民主的手段呢？他又提出了異化理論，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可能出現的異化傾向。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異化傾向呢？例如從人民中產生了公僕，公僕却又成爲人民的主人；從階級中產生了政黨，政黨却不代表階級的利益；從實踐中產生了理論，理論却變成教條，成了宗教迷信，束縛了人們的思想行爲。總的來說，他的理論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出發，重視人的價值，人的智慧，發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中的民主的、合理的成分。

王希哲的文章在發表時，其觀點都是與中共官方報刊不同的，但他的大多數意見其後又成爲中共官方的意見。例如一九七四年他在《李一哲大字報》中提到林彪倒台後還存在一個「林彪體系」，提到應健全「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當時被認爲大逆不道，但四人幫的被揭發終於證明了他的眞知灼見。他在一九七九年寫的《爲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而努力》，提出了應學習南斯拉夫所實行的由工人直接掌握企業管理權的辦法，八〇年提出的「民主是目的，不是手段」的意

見，都分別在半年、一年後成爲中共官方報刊的意見。他重申的異化理論，其後在《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的文章中也見到。過去的經驗，證明王希哲不愧爲大智大勇者和先知先覺者。

儘管我不完全同意王希哲的近作《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觀點，但這篇文章的基本精神——以反對獨裁和反對思想奴役作爲評毛的基點，我是同意的。我不知道他的被捕原因是否由於評毛的基調與中共官方目前所唱的不同。但事實證明，毛澤東在過去所犯的種種具體錯誤，如果不是因爲個人專斷、獨裁，如果他有民主作風，如果整個體制是健全的民主制的話，小蒼蠅似的錯誤是不會變成大象的。經濟上的左傾，階級鬥爭擴大化，黨內外不是沒有人提出批評，但毛澤東把所有的批評者都打下去，錯誤才越犯越大。

如果未來的發展不再重蹈覆轍，那麼評毛的基調必定從虛飾、遮掩中突破出來，把反對獨裁和反對定於一尊的思想作爲評毛的重點。

反對獨裁和反對定於一尊的思想枷鎖，是爲了恢復重視人的價值，是要讓十億人的大腦發揮它的功能，而不是停止活動去聽從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大腦的擺佈，是讓每一個人的內心有如燦爛的星空，而不是只有一顆寒星在照耀。

人的聰明才智，人的價值，人的精神的發揚，是促使整個社會生機勃勃的主要動力。

在不少宗教思想當中，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在西方的民主思想當中，無疑都包含有一些重視人的價值的正面因素。而在社會主義精神中，這方面的因素也是明顯的，而且更是主要的。

從各種思想中，發掘正面的因素，以啓發民智，才可以開創一個富有希望的未來。

最後，我想總結說一下：對於曾經嚮往社會主義精神的人來說，近年來在理想破滅之餘，王希哲的文章確實使我們恢復一點對社會主義的信心。王希哲的愛國精神，爲祖國的前途進行理論探索的智慧與勇氣，是使人欽佩的。從他的文章中，我看到了這一代中國青年人的優秀的一面。中國的前途，不是繫於已經或將要成爲歷史的人物身上——儘管他們中的一些人曾經或正在起着重要作用；也不是繫於大人物的下一代身上——儘管他們中也有一些人在認眞而嚴肅地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和現代化；中國的未來，主要繫於佔人口百分之六十三的全體年輕人身上，特別是起榜樣作用的那些正在嚴肅地、勇敢地探索中國未來的年輕人身上。

我很能了解安定團結對當前中國局勢的重要。但爲了一時的安定團結而再次打擊有才華的、追求理想的年輕人，將使許多受傷的心靈再次淌血，以後重建信心是更困難了。王希哲一直只是寫文章，他很少參與行動，而他的文章也基本上沒有違背「四項原則」，他的被捕較之魏京生、傅月華等帶有更明顯的「言論入罪」的色彩。退一步說，縱使王希哲的行爲眞有越軌之處，我也希望中共當局愛惜這一類青年人的志向和才華，對他們網開一面。

這是我的願望，也是我的呼籲。

九七覺醒

——十月十五日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

各位同學，各位朋友：

在今年，香港大專同學學辦的一連串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活動，邀約我來作這些活動的最後一次演講，講題又指定我談香港一九九七年的問題。這個講題，表面看來似乎與辛亥革命不相干。而且，直白地說，談一九九七年的問題，事實上就是研究一九九七年香港如何可以保持現狀、避免納入中國大陸目前所實行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之下的問題。有人可能認爲，探討這個問題的本身，就是不想香港回歸祖國，就是不愛國，就是違背了辛亥革命所倡導的民族主義精神。爲甚麼同學們還把這樣的題目放在紀念辛亥革命的講座中呢？爲甚麼我又要接受這個邀約，前來與同學們一起探討這個問題呢？

十年前，辛亥革命六十周年紀念，徐復觀教授在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史學會上講辛亥革命的意義時，指出辛亥革命的三大原則，即民族、民主、民生這三個方面，是二千多年來被一人專制的

政治所長期壓制的、在中華民族精神深處的三大要求。這三大要求是我們民族的最大的鄉愁。一九〇五年同盟會堂堂正正地提了出來，經過辛亥革命，儘管由於歷史殘滓的阻撓破壞，未能順利實現，但這三大要求一經正式提出乃成爲指導國家民族前進的三大原則，有如九曲黃河，必然會闖過九大曲折，不流歸大海不止。

今天，我們看台灣海峽兩岸的政權，都在空前隆重地紀念這個節日。一邊是「雙十國慶」，另一邊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兩邊都在「慶祝」、「紀念」而兩邊又都在罵對方沒有資格「紀念」。一邊在大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內容卻是一味比較海峽兩岸的民生；另一邊則指責對方沒有實現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已由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並且超過了。在這統戰與罵戰的混雜聲中，我們看到的彷彿是在爭奪辛亥革命的紀念權。

香港的同胞沒有受到單一輿論所左右。我們可以在這裏看到海峽兩岸的宣傳，大多數人也可以自由來去大陸與台灣，我們通過對各種有關報道的比較分析，通過與海峽兩岸的人和地的實際接觸，我們不妨把辛亥革命提出來的三大原則，與我們所了解的實況作一番衡量，看看分別可以打多少分數。我想，大多數同學都會同意，台灣在民生方面打的分數高些，但看國民黨七十年來在對外交涉方面，民族主義的分數就不一定及格；而大陸方面，中共把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了，海外華人也有光彩，民族主義的分數相當高，但民生方面，則三十二年來大陸老百姓的生活如何，恐怕這分數就不及格了。至於民主，在海峽兩岸應該打多少分數呢？遠的不說，近年來，一

邊是林義雄案件①、陳文成案件②，另一邊是劉靑案件、王希哲案件，彷彿在進行惡性競賽似的。我想，海峽兩岸的民主，該打多少分，同學們是心中有數了。

不管海峽兩岸的宣傳怎麼說，我們看到的是九曲黃河還沒有闖過九大曲折，還在翻滾騰突，遠沒有流歸大海。

辛亥革命所揭示的三大原則，仍然是我們的最大鄉愁。

那麼，這跟一九九七年問題又有甚麼相干呢？

提起一九九七年問題，不久前一位日本朋友關切地對我說：「我想你是相當矛盾。一方面，你是中國人，另方面你又居住在香港。中國人不希望讓外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佔統治地位，而香港人又不想接受大陸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

他的話，眞是點中了我心中的要害。當然，這不是甚麼了不起的見解。他的話是許多人都在講，也是許多人常常在想的。然而，每講一次，總是激起有民族感情的人心中的苦澀的滋味。

由於童年時在抗戰期間的淪陷區的一些經歷，由於戰後在北京、上海所見到的社會動亂，我想我們這一代是早經民族憂患的一代，與各位五十年代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新一代不太一樣。儘管比對我們的上一代，我們所經歷的民族憂患又似乎少一些。然而，我們和我們上一代所經歷的民族憂患，是外來的敵人的赤裸裸的入侵。這當然是直接的、能夠激發我們的深厚的民族感情的因素。我們從小就盼望着，中國有一天能成爲眞正强大的國家；至少在中國自己的國土上，「中

國人」這個詞與「狗」連在一起的侮辱性的字句是再也不容許它出現了。不過，經過多年來的觀察和閱歷，我又較深入地認識到，這只是民族主義的表面結果。一個民族，要眞正强大，不是光靠武力或者一種不屈的精神，儘管這是必需的；一個民族的眞正强大，恐怕還要辛亥革命所提出來的民權和民生，或者五四運動提出來的民主和科學，或者是魯迅當年提出來的先要有在精神上健壯的中國人，又或者是中國大陸近年來所提倡的民主化與現代化。所有這些，其實都只是一樣的意思，也就是人民要有權，經濟要穩定而持續地發展，從而在人民有權的條件下增進人民的福利。有了這些內部的基本發展作基礎，民族主義的精神就自然發揚起來了。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我們這一代和我們上一代所經歷的民族憂患儘管是直接的，然而各位這新一代所經歷的民族憂患也不見得少。身居香港，目睹世界各國和香港這三十多年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目睹民權和民生的改進，再看海峽兩岸的中國，國家的分裂，內部鬥爭的自我挫傷，人民正當權利的被忽視，特別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緩慢和多次反覆，這種間接的民族憂患仍會不時衝擊着有民族主義思想的中國人的心靈，使我們越是面對現實就越不愉快，使辛亥革命所揭示的三大原則，仍然是我們的最大鄉愁。

這就是作爲一個有民族主義思想的中國人，面對一九九七問題的複雜心情。過去，由於個人經歷的一些特殊性，我也曾想過自己回歸中國。坦白說，那時候的不回歸是因爲生活水平的差距，和對當時政策下我可能會受到的對待，產生疑慮。然而，想到香港前途，想到一九九七，我是覺

得理所當然要回歸中國的。中國人屈辱的時代過去了，中國沒有道理會在一九九七年再續約，而如果中國收回了北九龍，那麼整個香港的政治現狀也就順理成章地改變。當這個日子到來，回歸中國，做一個大國的公民，是理所當然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和制度的不適應，我相信對我來說，在民族主義的大原則下不會發生甚麼大問題。即使在今天，我的這一想法仍然沒有改變。到一九九七年，從個人來說，我已六十歲了，如果現狀改變，我就接受現實，我不會作移民外國的打算。

然而，近年來的現實，卻越來越使我感到，香港現狀的長期保持，在一九九七年以後的繼續保持，從中國的國家利益、特別是人民利益來考慮，不但是必須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可缺少的。香港在促進海峽兩岸的民主化和現代化方面，在推動辛亥革命的三大原則的實現方面，它的貢獻決不是任何地方可以代替的。因此，從一個空泛的民族主義觀念出發，一九九七年及以後香港的長期保持現狀也許是有違民族主義的精神；但從一個現實的民族主義觀念出發，那麼保持香港現狀正符合我們民族的最大利益，而現狀的不能保持則使香港失去了實現我們民族理想的條件，因而這才是恰恰有違民族主義的精神。誰要是在這個問題上被一種空泛的歷史使命感所左右，不願做歷史的罪人，那麼倒霉的是中國的老百姓。

這是近年來我在一九九七問題上的醒悟，也就是我的講題「九七覺醒」的第一個部分，即從民族主義觀念去考察這個問題。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的日子裏，我們特別會想到香港在辛亥革命前所起的作用，更促使我們必須從現實的而不是空泛的民族主義來考察這個問題。

「九七覺醒」的第二點覺醒，是從香港居民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不久前，有人向我提出了一個我以前沒有想到過的問題：

「對於香港這個地方，你最喜歡的是甚麼？最不喜歡的是甚麼？」

當時我說：「對於像我這樣長期在言論界工作的人來說，香港的最大優點是言論自由，而這是在大陸和台灣這樣的華人社會裏無法得到的；至於最大的缺點，我覺得是居住在香港的人，相當大部分有一種寄居心態，也就是把這個地方的現狀看作是暫時性的。投資者不作長線投資，專業人員有移民外地的打算，而一般勞苦大衆雖不會離開香港，但也沒有長期的計劃，常常感覺到這個地方的政治現狀有一天終會改變，於是滋生了一種『拚命賺錢，拚命用錢』的心理。我們大多數人不知道下一代會過怎樣的生活，也沒有打算爲這個地方的更好的未來貢獻自己的力量。」

其後，我也把這個題目試問過一些朋友。奇怪的是，絕大多數的朋友的回答，至少有一半是與我相同的，即多認爲最喜歡香港有「自由」，儘管不一定說是言論自由——因爲我所問的人多不在傳播界，故沒有想到言論的問題——，但「自由」幾乎是一致的答案。至於另一半，最不喜歡香港的是甚麼，卻每一個人的回答不一樣，然而也有不少人的回答是：「不穩定。」

回答了這個問題以後，我也就常常想起這個問題，並進一步去思考：我們，居住在香港這地方的人，有沒有好好地去利用香港這個華人社會中的最大優點？有沒有設法去改變這個地方的最大缺點？

至少在過去，我想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沒有這樣做。我們似乎沒有充份利用言論自由，去做一些應該做的事。大部份言論還是屈從於現實。爲甚麼沒有充份利用這一優點？我想是受香港的最大缺點所影響：既然認爲這地方是暫時的，又何必追求甚麼理想呢？還是過一天算一天吧。香港是在進步當中，但這種心理却在妨碍着香港的進步。我們似乎沒有嘗試去改變許多人把香港看成是臨時的這樣一種社會心理。也許，我們自己也有這種心理吧。

爲甚麼會有這種心理？因爲我們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政治前途，不是由居住在香港的人民所決定的。多次的政治風暴提醒我們，決定香港政治前途的，是北京和倫敦。而尤其是北京的意向在起作用。既然香港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裏，又怎能不把這地方看成是暫時的？又怎會充分利用這地方的一切優點呢？

一九九七的問題把許多人喚醒了。現實擺得十分清楚：如果在一九九七年以前，中英雙方對香港未來的政治地位沒有作甚麼新的安排，屆時英國就必須按照英國的法理規定把北九龍交還給中國；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很難想像南九龍和香港島可以維持現狀。更嚴重的問題是：根本不必到一九九七年，在這一兩年內，如果中英雙方沒有甚麼新安排，銀行對北九龍地區的樓宇按揭就會進一步把年期縮短，直接影響了地產業；長線的高技術的工業投資因爲前景的不明確而不可能發展，香港只能利用外滙的靈活性發展金融。所有這些都直接影響到香港的經濟。因此，一九九七問題其實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無須作甚麼社會調查，也可以知道，絕大部份的香港人並不願意生活在中國大陸目前的制度之下。近年來，香港人對大陸生活的不可適應性是更加明顯了，香港人之所以不得不把香港的政治現狀看作是暫時的，是因爲對香港的前途覺得無能爲力。然而，當九七年的陰影越來越近的時候，香港人終於覺得必須表達自己的意願了。香港居民作爲一個社羣，我們對自己和自己下一代的未來生活方式，應有表達意見的權利。這種對香港前途問題的關切，具體表現在對這問題已有越來越多的討論。表達自己的意願，是香港居民的正當權利。這種表達本身也可以成爲一種力量，去促使一九九七問題的解決。而有更大意義的是，這種對於與自己和下一代的命運息息相關的問題，積極提出討論，本身也是一種「覺醒」，即對於自己應有的正當權利的覺醒。從此出發，也許可以改變香港人把這個地方看成是臨時的這種心理，從而促使香港趨於健康與進步。

因此，保持現狀其實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在前景明確的情況下消除寄居心態，是爲整個社會開闢一個較長遠的路向，這樣居民才會願意投入更多的政治參與，作長線投資，確定自己在這地方居住的長遠計劃。總的來說，不僅是保持現狀，而且要比現狀更好。

「九七覺醒」除了是香港居民對自己應有的正當權利的覺醒之外，還需要認識到：儘管解決一九九七問題的權力操在北京和倫敦的當政者之手，但實際上這兩個有權解決問題的政治力量又有他們的困難。香港目前的政治狀況是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砲艦政策的產物。在今天的世界上，沒有人會認爲保留和延續殖民統治是一件光采的事，也沒有人會認爲在自己的國土上保留和延續外

國人的佔領是一件光采的事。因此，如果我們不理會我們應有的正當權利，把這個問題交給香港政府去解決，那麼香港政府就只能交給倫敦去解決，倫敦則必須尊重北京的意向，而北京又會在强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民族主義觀念中感到爲難，這個傳來傳去的球，最後似乎還是要落到與切身利益最息息相關的香港居民的脚下了。香港居民似乎已到了責無旁貸地必須表達自己意願的時候。

任何事物，越離得遠就越覺其小，越走得近就越覺其大。「一九九七」這四個數目字在我們眼中已越來越大了。事情已不由得我們不作反應。從現實的民族主義觀念出發，從我們民族的最大鄉愁出發，從我們的切身利益和整個社羣的前途出發，從解決這個棘手問題的實際作用出發，我們也已到了不能不表達自己意願的時候了。我不想隨便創造一個新名詞，但這確是一種覺醒運動，那麼我們爲甚無不可以把它叫做「九七覺醒」呢？

讓我們拿出勇氣，正視現實，正視人生，正視作爲一個社羣的人的應有權利，正視我們民族當前的問題和未來的目標，大胆地發言，坦誠地表達我們的意願。「九七覺醒」是人權的覺醒，也是民族主義的覺醒。

謝謝各位！

注：

①　林義雄案件，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台灣發生高雄暴動事件，其後當局拘捕了一些黨外人士。林義雄是被捕的主要黨外人士之一，在拘押期間，他的家庭在當局的二十四小時監視下，發生了他的母親及他的幼女被殺害事件。而向來以破案率高見著的台灣警方，却三年多一直沒有破案。海外不少人認爲林義雄的母親和女兒被殺是由於林義雄在拘押時與當局的不合作態度所引起的。

②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一位從美國匹茲堡回台灣探親的教授陳文成，被台灣的三名特工帶往警備總部保安處，第二天清晨，他的屍體出現在台灣大學校園。

這本書的出版，跟我過去所出的書不一樣，它並沒有給我帶來愉快、欣慰的感覺。手裏提着一把校稿，就是提着一團火一樣，炙手，傷痛，而且即使到了寫「自序」的這一刻還在矛盾着：究竟要不要把它付印？

這不算是一本分析中國問題的書，而是一本關於一個香港知識分子在寫中國問題的文章時的心理活動，是我對世界、對中國的一些基本認識和基本態度。

在事實不斷被謊言掩蓋的世界裏，極有限的眞話也必須要有人講出來。我珍惜在生命中有這麼兩年，憑勇氣，付出個人的代價，寫下了這十篇文章，說出了極有限的眞話。

DS
777
.55
L447
1982
c.1
EAST

ited

East Asian Library, U of T
3 1761 06491732 1
DS
777
.55
L447
1982
EAST